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天真的人类学家

小泥屋笔记 沙 重返多瓦悠兰

[英] 奈吉尔·巴利 (Nigel Barley) 著

何颖怡 译

孩童旅行总会带给我快乐与时光飞逝感。你同自己商量着假装是一个探险家。慢慢地，黑色毛毡凉鞋
你不会懂翻译家面对真实的世界会如何痛苦。彼此种种，会让你以全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
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 [英]奈吉尔·巴利



理想国译丛 001
理想国文化出版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

黄道琳

十多年前，在美国旧书店偶然买到《天真的人类学家》的英文本。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作者巴利是何许人，但从该书的内容简介看来，我陆续在收集的“异类”人类学著作又要增加一本。没过多久，我也拥有了《天真的人类学家》的续篇 *A plague of caterpillars*。

巴利于1977年至1979年间两度前往喀麦隆多瓦悠族聚落，从事仪式和信仰方面的民族志调查，这两本书记录了他将近两年的田野经验。人类学家原本就很少将他们在田野的日常生活点滴形诸文字，巴利的著作则更在这个小小的文类里头独唱异调。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学家带头助长或至少在旁默许，人们对田野经验的理解充满了浪漫、神秘、冒险等等色彩，而今，在巴利的笔下，民族志调查纵非只是徒劳一场(他确实没有消极到这个地步)，也泰半耗费在闲散、挫折、困顿的泥淖里。

可想而知，这样的告白不会得到人类学界的欢迎。果不其然，巴利遭受了不少专业上的严厉指控，包括说他在书中明言某某报导人(informant)嗜酒或性无能是违反职业伦理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巴利确有可议之处，但如果真的要落实伦理的要求，那我看所有人类学家多少都有过失。

让我提出一个较有意思的解读：巴利所以会那么冒犯人类学家，是因为他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然后进一步加上侮辱。伤害在于他用幽默带刺的笔调揭露了人类学家的窘态和尴尬，侮辱则在于他这样做却得到广大读者的喝彩。

不只喝采——根据一项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做的调查，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知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普及度越大，其作者就越会受到同行的轻蔑（米德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巴利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睞，那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在书中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宣扬人类学的崇高使命和深奥意涵，而仿佛只是把他的经历拿来当作娱人的话题。对那些以人类学为专业的学者，这怎生了得？

在此替巴利说句公道话。巴利从田野回来之后，也出版了一本中规

中矩的民族志专著（*Structo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如今读来，这本书的内容倒相当契合人类学的理论取向和分析架构，但它对多瓦悠文化的阐明，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机械式的结构和语意上的对比。若要认识有血有肉的多瓦悠人以及巴利个人的切身感受，读《天真的人类学家》会更有收获。

但愿人类学家多写几本这样的书。曾经有一位前辈鼓励我：只要做过三天田野，就可以写出一本书。这固然是夸张的话，却也道出了民族志研究的盲点。毕竟，回溯历史来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曾经是获取知识的革命性方式，只要善加运用绝对是效率很高的利器。但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对其研究方法过度自信，以为一旦做了一段时期的参与观察便得以洞识文化的奥秘，尤有甚者，有些人类学家还仗着田野调查这把尚方宝剑，对其他学科嗤之以鼻。平心而论，如果人类学家对其田野经验抱持既轻松又笃实的态度，再加上某种程度的写作工夫，那么确实可以、也应该为广大读者撰写不少兼具启示及趣味的书。起码，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不妨扮演旅游作家的角色。《天真的人类学家》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书难得一见？我相信，那是因为大部分人类学家使命感太强，致使他们不敢坦然面对或公开承认调查过程中所遭遇的顿挫、困难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少了这些成分，他们的田野报告仿佛是按照食谱规规矩矩、妥妥当当做出来的菜肴。再者，人类学界理论挂帅的风气颇为强烈，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两年田野之后，岂能放弃任何分析这个、诠释那个的机会？因此，我们在人类学家著作中碰到不少粗鲁的分析和过度的诠释。

也许，在巴利面前我不应该讲这些有点粗鲁、过度的批评言辞；因为，巴利其实并不太在乎其他人类学家的作为，他着墨较多的反而是对自己的调侃，而且笔下充满幽默和反讽。再说，这一趟田野虽然让巴利受尽种种挫折和打击，他却能够在过程之中逐渐调整心态，原先的忿忿不悦终于化解为逆来顺受。巴利跟喀麦隆政府官员及私人机构打交道时老是得到无理或无能的处置，这些描述可能也会令读者读得咬牙切齿。其实，这类遭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是人类学家很少事前设想或被告知这种情况，因此未能预先计划应付的门道。

到最后，无论巴利在多瓦悠文化的研究上是否收集到令人满意的资料，他至少对喀麦隆社会这一重要层面有了丰富的体验，并用不愠而超脱的态度跟我们分享这些。

田野工作者最大的挫折，来自他跟当地人的关系，而这正是人类学

家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说得明白一点，乐意跟调查者密切合作的原住民实在可遇不可求，大部分人在行为上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在言辞上经常难免含糊矛盾。别的人类学家或是畏于泄底、或是认为研究成果比过程重要，总是把这些情事扫进地毯下，《天真的人类学家》着重的却正在于此。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非但同意巴利赋予人类学家的“天真”形象，恐怕也可以把提供资料的当地人视为“狡猾”的化身。

多瓦悠人似乎乐于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不时颠三倒四，害得巴利不是无所事事，就是莫衷一是。

巴利把这些和盘托出，似乎对多瓦悠人颇有谴责之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很有度量地迁就——这退一步讲是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做的妥协，进一步讲则是对研究对象应有的尊重。由于巴利不怕揶揄自己，他的叙述更能让我们了解田野情境的一项要素：享有优势的人类学家对处于劣境的原住民不能有职业性的苛求，因为后者被卷入这个情境基本上不是出于自愿，而他们如果令人类学家感到失望，那也是无奈的局面。进而言之，巴利也暗示了田野情境的一个陷阱。人类学研究以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为最高判准，因此原住民的观点和所提供信息乃是最有力的依据；但是，调查者终究会发现，能够直接从原住民口中得到的东西实在不多，而且不清不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到现在还是一门相当不准确、颇有几分天真的学科。从巴利的故事我们只能达到这个结论，然而分享了他的田野经验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人类学迷人的地方。何谓人类学？或许它就是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所碰撞出来的知识。

《天真的人类学家》受到一般读者的欣赏，但它若要获得专业学术肯定，恐怕还得借助某些理论标签的提升。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983年，大约在那时候人类学里开始流行起所谓后现代、反思式的民族志，其重点在于强调田野调查的暧昧性以及调查者自身对民族志材料所施加的影响。二十年下来，原本有望为人类学注入新生机的这种取向，也已大致走入了死胡同。这类著作虽然对田野调查的可信度提出正当的质疑，但最终却过度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宰性，而使民族志知识的客观地位几乎完全沦丧。

巴利跟这些民族志作家的关怀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而他会在那个年代发表这本著作，也同样反映了人类学论述方式在当时所受到的普遍质疑。不同的是，后现代民族志难免沉溺于矫情的反思，最终成为作者自恋的呓语，巴利则采取较释怀的反讽立场，他看待问题的方式表

面上看来只是戏谑有趣，骨子里却很严肃健康地交待了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希望。

如果说巴利这本书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我想那应该是它使我们对民族志研究抱持着带有怀疑的兴趣以及附加条件的信心。巴利自己隐隐之中似乎也为这做了见证：这次田野结束时，他显然已经是个不再那么天真、而有几分疲倦畏惧的人类学家；不过，只在六个月之内，得知有重要的仪式可供研究，他又信心百倍、兴致勃勃地回到多瓦悠族人之中了。

那也是一段颇有可谈的经历。但，那是后话了。

(本文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序 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

作者/乔纳森斯多克 译者/周倩而

或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这本书。第一种可能开始于这样的场景。当我读此书时我忍不住大笑，笑歪了嘴，最后我甚至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了。真的，这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好笑的书之一。本书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拿到研究经费去研究西非冥顽强悍的多瓦悠人的割礼仪式。代之学术研究，他选择用B记式的方式，以敏锐而诚实、感性而率直幽默的笔调，记录他每日面对的多瓦悠人。摒弃了繁琐的学术书写风格，巴利将所有理应被删除的内容：如意外事件和倒霉事(足够拍成一部好莱坞喜剧)，生病初体验(足以编写成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和因异文化而产生的误解(也可以编写成电视肥皂剧)都翔实地描述于本书中。这还不包括我尚未提到的他与非洲官方人士及其他西方人士的奇遇呢！

本书有很多思考点均刺激着读者反省自我对外在的认识。

例如，我们常常浪漫地以为，非洲部落的人们比都市人爱护自然。但当多瓦悠人问起，为什么巴利不把机关枪也连同其他田野工作的必需配备一起带来，以便快速而有效地猎杀野生动物时，我们对非洲人疼惜自然的刻板印象便顿时一扫而净。从这里我们看到多瓦悠人十分自信自己做事方式的正当性，但当他们一丝不苟地坚持这才是惟一的方法时，有时不免令人感到可笑，巴利发现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其实，反过来

想，他们的顽固不也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人类共同拥有的优劣及特有的文化样貌在巴利纯熟的妙笔下像一面明镜，借着他自己，一个人类学者生活在异文化的经验，反射出种种类似的盲点与反思。作者用清新的手法及斟酌的字句让读者觉得自己亲临一个未经策划过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呈现事情发生的原因与始末。什么是人类学，而学者又是如何了解一个异文化的，无所不在地潜藏在作者的字里行间，虽然这与作者称这是一本无关人类学的声明是矛盾的。

从第二种角度来介绍，可以说我掴了自己一巴掌。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评论者说人类学像旅游写作。是的，除了学术化的注脚、参考书目和理论框架是旅游札记所没有的，评论中肯地显示民族志写作就像其他的写作，作者试着将一群鲜为人所知的人们介绍给另一群可能从未接触过他们的读者。这样对斯土斯民的侧面描述不可能是客观或科学的。相反，它是依赖着因作者的人格特质所洞察的素描，因作者偶然结识几个特定对象与之产生互动所累积的结论。举例来说，曾有一个笑话提到，澳洲和英国男性学者写道，新几内亚的男性是粗犷而专横的。反之，女性研究者与男性美国犹太学者却说他们有迷人的魅力与活力。

多么科学、客观的结论是不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作者的确需要多提供些关于他自己的资讯。到底他是如何与被他研究的人进行互动的，这样的脉络陈述得以让读者了解为何学者下如此结论。关于所有运气不佳及误会，还有田野工作发生的琐事通常不会被呈现在书中因为这些都被看做是个人的，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其实可能都与后来的研究结果息息相关——它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作者因此下了某种结论。所以，对于了解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本相当优质且易读的入门书籍。

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第一版发行于1983年，在英国人类学界，算是第一批将人类学视为一种重视人性成长觉醒的学科的人文科学及文学作品。直到现在，我们仍在探索相关论述的新发现，而这本书在现今仍然具有许多重要的意义。同理，此书的中文版也因类似的理由刺激人们对人类文化的更深层领悟。就像巴利理解到的，新的书写风格开发了潜在的新读者群。纵使作者风趣的写作风格可能失之轻率，巴利确实是很小心谨慎地在向读者传达关于人类学的几个重要问题与假设。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罕有的综合性的书：它让你瞬时被吸引并产生深刻的印象；会让你捧腹大笑但又有掷地有声的内容。不论是人类学的学生或专家，或是有经验的旅行者，或是靠读旅行札记

的卧游寰宇者，或是对于现代非洲有兴趣的读者，或是为打发无聊而找书的上班族(但小心别错过你的车站，这可是一本一拿起就很难再放下的书)，我相信你们都能在此书中得到一些收获。

(本文作者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世界音乐》书评编辑)

第一章 原因何在

“为何不去做田野调查?”一次众人带着醉意的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同事抛出以上疑问。那次我们广泛讨论人类学最新技术、大学教学与学术生涯。结论令人沮丧。就像哈巴德太太①(Miss Hubbard), 我们清点存货,却赫然发现橱柜空空如也。

我的故事十分寻常——受训于高等学府,非经刻意规划,而是机缘使然进入教书行业。英国的学术生涯莫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首先:如果你是优秀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错,书就铁定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做田野调查。上述关连统统不成立。优秀的学生有时研究成果可怕。学术表现杰出,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者,有时教起书来愚蠢乏味到让学生以脚投票,像非洲艳阳下的晨露般消失无踪。人类学行业也不乏全心奉献的田野工作者,他们的肌肤被炎热气候烤干如皮革,牙关因长年与原住民奋斗而终日紧咬,但是他们却对人类学理论殊无贡献。我们这些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文弱的“新人类学者”认为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当然,在殖民时代有过实践经验、“无意间搞起人类学”的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祭司。他们可是受尽了沼泽、丛林的磨炼与贫困,自以为是的年轻学者岂容抄捷径。

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他们对无缘踏入田野的人满怀同情。事实很简单,他们曾到过田野,他们看到了。没什么好说的。

我在人类学系教了几年学来的正统学说,殊乏学术成就,或许也该改变了。你很难判断田野工作是类似当兵这类的不悦任务,理应默默忍耐,还是这行的“额外红利”,应该欢喜承受。同事的意见帮助不大。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事实

上，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事，在田野工作者嘴中道来，如果不掺点民族志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老故事变成老友，很快地，田野经验便只留下美好回忆（除了某些奇怪岛屿的状况极度悲惨，叫人无法忘怀也无法消融于幸福感中）。譬如，某位同事宣称与和蔼原住民共度了很棒的时光，他们微笑着携带一篮篮水果、鲜花来送礼。如果按照事情发生顺序，这段叙述应当补充如下：“那是在我食物中毒后。”或者：“当时我的脚趾起水泡脓肿，虚弱到无法站立。”如此种种不免叫人怀疑：田野调查这回事是否像那些欢乐的战争回忆，叫人扼腕生不逢时，虽然理智上，你知道战争不可能美好。

或许田野经验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我的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般，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c。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段回忆。那是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地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人们无缘使用的句子。

或许就是这些怪句子，使得本质乏味的人类学冠上珍贵的怪诞脱轨气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者的公众形象实在侥幸。众所周知，社会学者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陈腐之言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者曾追随印度教圣者，看过奇特神祇与污秽仪式，大胆深入人迹未达之处，他们全身散发一股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他们本身就是英国怪诞教會的圣者。我岂能轻易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凭良心说，我也考虑了其他好处（虽然机率不大），替如田野工作可对人类知识有所奉献。乍看之下，这种可能性极低。“资料搜集”（fact-gathering，或译事实搜集）的工作殊无趣味。人类学不乏资料，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这行业有所谓的“捕蝶人”，用来形容许多辛苦收集资料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根据地域、字母或任何最新流行的分类法，不断累积资料，却没有能力解释它们。

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

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

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因为如此,当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lnowski)产的日记出版,揭露他也是有缺点的凡人时,在人类学界激起了义愤?。虽然马氏在日记中诚实说黑人令他愤怒与乏味,而且他深为欲望与孤寂所苦。学界却普遍认为马氏日记不应出版,因为它对人类学造成“伤害”、无故破坏偶像,让大众对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

此种说法透露出艺术买办者令人发指的虚伪心态,逮到机会,便当予以矫正。抱持这种想法,我开始记录自己的田野工作。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向偏重较高的抽象层次与理论思索,因为惟有在这些领域有所斩获,才可能趋近全面解释。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盯住眼前方寸之地,保证他的观点绝对无趣、偏颇。这本书或许能调整其间的不平衡,让学生与非人类学领域者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连,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能感受些许田野经验。

此时,投入田野工作的想法已经深植我心,不断滋长。我问某位同事:“我为何应做田野调查?”他摆出夸张姿势,那是他在课堂上的标准肢体语言,用来应付学生的“何谓真理”或“‘猫’要怎么写”这类提问。他的意思够明白了。

人类学者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乎其他人类的秘密,如果有人建议他到他处做研究,就好像说他可和任何人进教堂,就是不能与独特的灵魂伴侣相厮守。以上种种说法,纯属美丽虚构。以我来说,我的论文是研究古英文(印行本或手抄本)。当时我颇自命不凡地说:“我穿越时间而非空间。”这句话虽稍稍安抚考试委员的不满,他们还是觉得有义务表示异议,警告我从今而后应当致力穿越正常的地理区域。因为背景使然,我并不偏好某一特定大陆,也因为我对地理的认识还不及大学生,也不特别排拒某一特定区域。照我的想法,如果现有的民族志文献反映了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个人意象投射,那么,非洲看来是最无趣的一洲。在埃文斯-普里查德

(EdwaixlEvanEvans-Pritchard)?的伟大起头后，非洲研究便迅速走下坡，尾随伪社会学的步伐或继嗣系统的功能整体论，尖声呐喊地被拖进各式“困难领域”，如指定婚(prescriptive‘age)?与象征主义的研究，收获虽甚微，却依然保有“简单合理”的外表。非洲人类学可能属少数单调的内容会被美化成优点的研究领域。南美洲看来颇吸引人，但是同事说在那里工作需面对极恶劣的政治环境；更何况，此领域的研究者似乎都活在列维-斯特劳斯（ClmideLevi-Strauss)?与法国人类学者的阴影下。以生活条件来看，大洋洲是轻松选择，无奈所有大洋洲研究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些原住民似乎包办了魔鬼般的复杂婚姻制度。印度很棒，但是想要完成一丁点像样研究，至少必须先学五年语言，才能奢言有所贡献。远东？我应当远赴此地，看看能做些什么？

此类评估或许流于表面，但是我的许多同行与学生均照此运作。毕竟，多数研究始于对某一领域的模糊兴趣，甚少有人在提笔前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为何。

接下来几个月，我详细分析印尼地区的政治动荡与亚洲各地的暴行与破坏。最后倾向选择东帝汶。我至少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而非政治或都市社会化等议题。东帝汶看起来极为有趣，它有各种王国组织与指定联姻体系（prescriptivealliancesystem)?，也就是结婚两造必须有亲属关系。这似乎是人类学铁律，拥有此类现象的文化很容易出现清晰的象征体系。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东帝汶，开始撰写研究计划，突然间，报上全是东帝汶内战、种族灭绝、侵略等新闻。白人担心丧命，仓皇而逃，饥荒阴影浮现。东帝汶之行遂打消。

我与同行迅速会商后，他们建议我还是以非洲为目标，研究许可较易取得，政治也较稳定。我将目标转往费尔南多波岛(BubisofFernandoPoo)。对不熟悉此岛的人，我先解释一下，费尔南多波位于西非外海，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是赤道几内亚的一部分。我开始翻找文献，发现费尔南多波恶名昭彰。英国人讥笑它“黄昏时刻，仍可看到邈邈的西班牙官员身穿睡衣”，而且恶臭浊热，疾病丛生。19世纪的德国探险家批评此地原住民为“退化人种”。金斯莉（MaryKingsley)?认为此地煤矿蕴藏丰富。波顿（RichaidFrancis81?1011)(§)令众人吃惊，真的去了费尔南多波岛，且活了下来。所有文献都令人沮丧。幸好(至少当时我如此认为)，费尔南多波的独裁者开始残杀异己，而且异己定义十分宽松。我无法进入费尔南多波做研究。

就在这时，一位同事提醒我北喀麦隆有一个被忽略的异教山地民

族。我因而认识了多瓦悠 (Dmvayo)人——我日后的爱与恨，属于“我的”民族。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了多瓦悠人，开始寻找他们。

我到“国际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寻找有关多瓦悠的资料,索引里仅有几篇法国殖民官与旅人所写的东西。但是光凭这些资料,便可判断多瓦悠人十分有趣:譬如,他们有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whistle language)、木乃伊,而且素以顽强野蛮闻名。同事给我一些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传教士名字,还有几位研究多瓦悠语的语言学者,并在地图上点出它的位置。至此,一切就绪。

我开始工作,浑然忘记先前应否投入田野调查的疑虑。眼前两大障碍是:搞到研究经费与研究许可。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往后两年,我必须时时奋斗方能同时搞到钱与许可,我可能会回到“投入田野调查到底值不值得”的前提。幸好,无知是福气,我开始学习乞讨研究经费的艺术。

译注

巴德太太(Miss. Hubbaid)是英国民间传说人物,住在巨大的橱柜里。

②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出生于波兰的学者,1915年到1918年间在特罗布里恩德(或译初步兰)群岛从事研究,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派之父。他把“田野”(Geld)变成一个实验室,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成为材料收集的实验,研究者可以针对一个社区或群体的生活做密集的研究及局部的参与。他的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学理论与田野采集之间的主仆关系,在这之前,人类学者多半在书房里构思理论,资料来源是将调查表发给传教士、商人、殖民者与旅行者。马林诺夫斯基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返回英国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5年间,他是英国惟一的民族志大师。许多人认为他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始祖。详见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台北:五南图书(1992), pp.602—604。Roger Keesing 著,《当代文化人类学》,台北:巨流图书(1981), p.

830。Adam Kuper 著,《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林诺夫斯基到今天》,台北:联经出版(1988), pp.

③马林诺夫斯基身后所出版的《一本道道地地的日记》

(4 tt-ary,intheStriaSenseoftheTerm.London:

1967)曾引起轩然巨波。日记中揭露了马氏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马氏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勃然大怒,更暴露出马氏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士隔离。马氏曾告诉学生说,他视田野工作者的口记为安全阀，它疏导民族志记录者的私人忧郁和情感，使之不杂入其科学笔记中。

④埃文斯-普里查德(1902—1973)是英国继马林诺夫斯基、费雷泽James Geoi. eFrazer)之后最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对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巫术与努尔人(Nair)的鬼婚有精辟研究。详见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op.cit., p.

348; Roger Keesing, op.cit., p.

362; Adam Kuper, op.cit., pp.113—123。

⑤指定婚特指在某一特殊亲属范畴里的婚配规定，可能包含禁止与某些人成婚，或者某些人才是惟一婚配对象的规定。某人应娶某一范畴女人为妻者称之为“指定婚”，不论这个规矩是否会遭到破坏。如果只是认为某人从特定范畴娶妻是比较理想的话,称之为“优先婚”(pmferred mamageh 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p.181。

⑥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始祖。详见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op.cit., 即⑦指定联姻体系是指透过指定婚法则或多次重复的通婚，连结若干继嗣群体或亲族群体的一种体系，让这些群体彼此间保持一种跨越世代的婚姻关系。详见 Roger Keesing, op.cit., p.814。

⑧金斯莉(1862-1900)，英国探险家,挑战保守传统，进入西非与赤道非洲,也是第一个进入加蓬的欧洲人。

⑨波顿(1821-1890)，英国作家与探险家。

⑩某些民族可藉口哨声传达信息，它是“替代性语言”，用以传讯

第二章 准备

我猜想初次做田野，少不了得说服资助审查委员会：我的研究计划是有趣/创新/重要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一个缺乏经验的民族志研究者开始用上述角度对审查委员会大力推销时，或许因为经验丰富，委员不免开始怀疑该计划只是中规中矩，延续前人的研究方向而已。我强调自己的小小研究对人类学存续将产生广泛影响，却落入向素食者吹嘘烤牛肉美味的困境。我试图弥补，却越来越糟。审查截止前，我收到审查委员会来信，表示他们比较在乎多瓦悠的基本民族志资料的建构完成，也就是简单的事实搜集。我重写了申请计划书，补上白痴般简单的细节资料。这一次委员会却担心我的研究对象是从未被研究过的族群。我又写了一次计划书，这次他们放行了。我得到了研究资助，跨越了第一道障碍。

伴随钞票与时间的点滴消逝，申请研究许可变得无比重要。大约一年前，我曾写信给喀麦隆有关单位，他们答应在审查结束前一定给我回音。我再度写信给他们，他们要求我寄上详细的计划内容。我照办。我等待。当我差不多放弃希望时，终于收到申请签证的许可，可以准备前往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Yaoundé)。后来，我对熟悉非洲的老手尴尬承认，我居然天真以为这是我与官僚体系的最后接触。在我当时的想象中，喀国的行政部门是群不拘礼的家伙，以亲切、通情达理的态度处理小量、必要的行政事务。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必定遵循大英帝国的古风，以简单朴实、一对一方式处理行政。说他们人人热心协助，应当不以为过。

去喀麦隆大使馆的经历应当让我受到教训，但是我没有。

我谨守人类学优良传统，绝不妄下断论，直到铁证摆在眼前。我先打电话给大使馆，确定他们上班，才带着所有相关文件前往，一边洋洋自得效率非凡，居然准备了两张护照照片。大使馆没开门。我猛按门铃，引来一个只肯说法语的声音咆哮：明日再来。

第二天我再度前往，这一次，获准进入大厅。他们告诉我负责的人

外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有种感觉：申请喀麦隆签证一定是罕见、奇怪的事。不过，我得到一个有用信息：没有回程有效机票，不能申请签证。我于是前往航空公司。

喀麦隆航空把客人全当成讨厌的捣蛋鬼。当时，我不知道喀麦隆国营事业都是如此，还以为是语言沟通困难所致。他们不信任支票，我又没那么多现金，最后是以法国旅行支票支付。其他人用什么方法买到票，我无法想象。（田野新手守则一.永远通过英国旅行社与异国航空公司打交道。

旅行社接受任何正常的支付方法。）我向他们打听雅温得前往恩冈代雷(N'gaoundou,我往内陆的第二站)的火车。他们严峻回答：他们是航空公司，不是铁路局。不过还是告诉我，雅温得与恩冈代雷间有冷气火车，车程大约三小时。满怀胜利买好回程机票，我返回大使馆。那位先生还未回来，但是我可以先填一式三份的表格。我填了表格，却赫然发现我卖力填写的三联表格，最上面一张被弃置不用。我等了一个小时，毫无动静。大使馆里人群来去，大多说法语。

在此有必要简述喀麦隆的历史。它原本是德国属地，一次大战期间被英国与法国占领，后来独立组成联邦共和，最后成为统一的共和国。虽然理论上喀麦隆是英、法双语，但只有莽汉才会妄想凭恃英语走遍喀麦隆。终于，一个异常胖大的非洲女人走进来，以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和旁人讨论我许久。我猜想那是英语。如果你碰到英国旧属地的人，使用你无法辨认，甚至连基本音都很陌生的语言，那很可能就是英语了。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满墙的档案夹，勾起我极大兴趣，我发现里面全是黑名单人士的照片与详细资料。直到现在我仍很讶异，这么年轻的国家就能有这么多禁止入境人口。胖女士在档案里寻找我的名字，许久，一无所获，深感遗憾地将档案推到一旁。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的护照照片是两张连在一起。我怎么可以这样送来？应该先把它们剪开才对。接着他们上天入地寻找剪刀。许多人加入搜寻行列，移开家具，拿起黑名单档案夹抖动。为了表示自愿协助，我也半认真地趴在地上寻找，却又被呵斥了。这是大使馆，我不可碰触、窥视任何东西。最后，他们在地下室一位员工那儿找到剪刀，颇费唇舌地向我解释：地下室那家伙根本没资格使用剪刀，我们都得对此表示义愤填膺。接下来的问题是签证应不应收钱？我天真表示乐意付钱，殊不知这是天大地大的事，必须由部门主管决定。我又回到等候室，过了许久，一位喀麦隆男子终于现身，仔细阅读我的申请文件，要我再解释一遍申请签证的原因，从头到尾，他都很

怀疑我的动机。你很难向他解释为何英国政府要资助年轻人一大笔钱，让他前往世界荒凉一隅，研究在当地素以落后无知恶名远扬的部族？这样的研究怎么能赚钱？显然背后有阴谋。间谍活动、矿藏探测、毒品走私才是真正动机。惟一的办法是装成无害的白痴，什么都不懂。我成功了。他们终于赐我签证，上面盖着复杂的橡皮章戳记，显然是非洲胖大版的玛莉安（法国革命女英雄）图像。当我离开时，一种奇特的疲惫感袭来，混合着屈辱与难以置信。我将越来越熟悉这种感觉。

现在我还剩一个星期打理各项安排。过去几个月，我生活的一大重心是注射预防针，现在只剩黄热病预防针还没打。

不幸，它让我高烧、呕吐，大大减低离别的兴奋。我领了恐怖的一大箱药品，以及一张哪种病征应吃哪种药的单子。

这些病征我在注射预防针时几乎都得遍了。

到了寻求最后建议的时候了。我的亲人对人类学专业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疯了才想深入蛮荒丛林地，饱受蛇与狮子的威胁，运气好，或许能逃过食人族鼎镬烹煮。聊以告慰的是，当我要离开多瓦悠时，村里的酋长说他很乐意陪我回我的英国村子，但是英国总是那么冷，还有像欧洲教堂猛犬的凶残野兽，而且众所周知，英国有食人族呢。

无疑，人类学界应当出版一本《给年轻民族志学者的田野建议》。据说，著名的人类学者埃文斯-普里查德只给学生一个建议：“到佛特那梅森百货公司买个像样的篮子，然后远离当地女子。”另一个西非人透露：田野调查想要成功，一定要有一件网袋背心。我得到的建议包括：写好遗嘱（我写了）、准备一些指甲油送给当地爱美人士（我没买）、买一把好用的小刀（后来断了）。一位女学者透露伦敦某家店有一种短裤，它的口袋盖子可防蝗虫。我觉得这种奢侈派不上用场。

民族志学者如果需要车子，便面临第一个重要抉择。他可以在本国购买车子，装满生存必需品，运往田野调查地，也可以毫无负担出发，到当地再购买所需车辆用品。前者的好处是便宜，而且保证买得到想要的车款。坏处是你必须忍受与海关及其他官僚打交道的挫折，他们热爱骚扰、折磨新来者，坚持扣押你的车子、课征额外关税、要你填写琐碎的四联单送给几百英里外的官员会签，同时间，你的车子被放在户外任由雨水锈蚀、宵小偷窃。如果你懂得巧妙行贿，这些困难都可神奇消失，但是向谁行贿、行贿金额多少，这是新手极端欠缺的细腻艺术。稍不

谨慎，便可惹来严重麻烦。

到当地再买车的麻烦是极端昂贵。价钱至少是英国的两倍，车款选择有限。新来者除非运气好，很难买到便宜货。

出于天真无知,我选择第二个方法,也是没时间奢侈地充实行囊,急着想出发上路。

第三章 上山

当飞机降落在杜阿拉(Duala)的黑暗小机场,一股特殊味道飘进机舱。融合了麝香、热气、芬芳与粗野——那是西非的味道。我们步行穿越柏油路面,湿热的雨像血滴般滚落,汗湿脸庞。机场大厅里是我生平仅见的混乱场面。欧洲游客拥簇成好几群,不是面带绝望之色,便是对着非洲人尖声呐喊。非洲人也对着自己人叫嚣。一个孤独的阿拉伯人忧愁地从一个柜台游荡到另一个柜台。每个柜台前都挤满疯狂推挤的人群,我认出他们是法国人。在这里,我学到喀麦隆官僚作风第二课。我们必须准备三种文件:签证、健康证明与人境居住安排,要填无数表格,圆珠笔借来借去。当那些法国人抢着出去在雨中等行李,其他人却被海关严密检视文件。我们当中有人忘了抵达喀麦隆后的确切下榻地址,有人想不起生意往来厂商的名字。一个胖大的官员坐在柜台后看报纸,对我们视若无睹。摆够了高高在上的威风后,他以不可小觑的态度与我们一谈。看到这种场面,我胆怯了,只好随便捏造一个居住地址,许多人都如此取巧。但是往后的日子里,我都认真填写各式表格,虽然它们的下场不是被白蚁蛀食,就是被丢弃不看。我们又回到那三个柜台前,准备通关,这时好戏上演了。一个法国人的行李中被搜出气味奇特的东西。他辩称那是做法国料理酱汁的香料,海关却认定他们逮到大麻走私贩,虽然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毒品走私是将喀麦隆境内的大麻走私到国外。好戏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法国人又开始挤成一团。突然间,一个在尼斯上机、坐头等舱、体积庞然的非洲人排开众人而过,用戴满金戒的手指潇洒指点行李,行李伙连忙上前捡起。何其幸运,我的行李挡住他的行李搬运,海关挥挥手叫我快快通关,我就这样出了关,进入非洲。

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任何没有棕黑膝盖的人,一出关就会被各种人盯上。骚动中,有人一把抓走我的相机箱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热心的行李伙,但是当他一溜烟跑开,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连忙拔腿追赶,嘴里喊着各式平常用不到的法语广救命呀!小偷!”幸运的是,车阵挡住他的窜逃,我抓住他,两人一阵撕扭。结局是我的脸上挨了一拳,小偷

抛下相机箱。一个热心的计程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

第二天,我忍心挥别杜阿拉的魅力诱惑,飞往首都,沿途没有任何意外,我却染上其他旅馆的恶习,也开始以大嗓门、敌意态度对待行李伙与计程车司机。到了雅温得,我与官僚展开长时间“拔河”;公文旅行耗掉三星期,没别的事可做,只能当观光客。

我对雅温得的第一印象是乏善可陈。旱季尘土飞扬,雨季一片泥泞。主要的纪念建筑物都有公路餐馆的建筑风味。

破损的水沟盖常让粗心游客一脚踏进阴沟。初到雅温得者免不了都要扭伤脚踝。此地外国人的生活重心集中于两三家咖啡馆,在里面无聊枯坐,瞪视街上穿梭的黄色计程车,抵挡热心兜售纪念品的小贩。这些小贩是极富魅力的绅士,知道只要货品标价超高,白人都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向你推销不错的木雕以及号称“真实古董”的垃圾。买卖过程带着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

他们与疲惫的欧洲游客有着类似顾客/恩人的关系,颇乐在其中,知道自己开价越疯狂不合理,便越能制造乐趣。

最悲哀的是外交人员,他们似乎谨守不与当地人接触的政策,咖啡馆只是他们从大门深锁的办公室飞奔回别墅的暂时停歇处。后来我才知道我为当地英国侨社制造了不少麻烦。

比较有趣的是那些正在服“援助替代役”的法国年轻人,他们以海外服务替代军役。尽管身在西非洲,还是有办法以烤肉、赛车、派对等各式活动复制法国乡村生活。我很快便与一对夫妇、一个年轻女孩与两个年轻男孩交上朋友,他们都是老师,我们的交情后来证明珍贵无比。他们和外交人员不同,他们真的离开首都到乡间,熟知公路与汽车市场资讯,也和仆人以外的非洲人说过话。与喀麦隆官员交手后,我完全没料到一般非洲人非常友善和蔼;在英国时,我习于大家对西印度群岛与印度人的政治反感情绪,万万没想到在非洲看到各色人种轻松单纯相处。当然,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各种因素使然,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十分复杂。通常,与欧洲人共事的非洲人早就学会顺从,看起来就像“黑种法国人”。而定居非洲的欧洲人十之八九是怪胎。或许正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外交人员的日子才会如此难过;相对的,怪胎(我在此间碰

过不少)的日子颇好过，他们都把烂摊子留给别人c

走在街上，陌生人对我微笑打招呼,没有任何企图。或许因为我是英国人，对此特别感到不可思议。

时间流逝,而在非洲城市居住实在大不易。雅温得是观光客生活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虽然我过得毫不奢华，钞票却不断从指缝中溜走，我非得离开此处，非得吵闹一番不可。

我壮大胆子,前往移民局。柜台后面坐着我打过数次交道的傲慢官员，正在阅读公文，他抬起头来，漠视我的问候，自顾展开点火、抽烟的复杂程序,然后将我的护照甩在桌上。我要求两年居留期限，莫名其妙地,他只给了我九个月。我感激叩谢他的小恩惠，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我铸下两个大错,证实我对即将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首先，我去邮局拍电报到恩冈代雷(我搭火车的下一站)，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结果，电报14天后才抵达,对非洲老手来说，这算正常速度。我在邮局里结识了一个奇怪的澳洲人，他被傲慢的办事员以及跟法国人学了一身推挤本事的本地人搞得抓狂,无奈地站在邮局中央、令人吃惊地高喊广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天杀的肤色不对！”然后，他直称再也不要妄想从喀麦隆寄信给母亲了。

幸好,我还有多余邮票可以卖给他，他感动异常,迸发英联邦同胞情,坚持一起喝杯啤酒。几杯下肚后,他透露自己已经旅行两年多，每天花费不超过五十便士。我当然极感佩服,直到他酒钱也不付就离去，才明白个中道理。

这时，我犯下致命错误。目前为止,我大部分的研究经费都是开成国际保付支票,随身携带。此时看来似乎应存入银行，比较保险。我只花了一小时推推挤挤、饱尝傲慢对待,便存完了钱。~个能言善道的年轻人向我保证:24小时内支票便会寄至恩冈代雷,我随时可从户头提款。不可思议,我居然相信了。后来我足足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有办法动支当时漫不经心存进去的钱。但是当时看来存钱是理智选择,因为白人圈中流传可怕的犯罪故事，越传越耸人听闻。喀国规定出门必须携带各式证件,不少男性仿效欧洲大陆的文弱风格，手上拿个皮包。据说入夜后，胖大的非洲女人成群结党在街上抢夺单身男性的皮包，胆敢反抗,就被海扁一顿。这种传言颇可信。非洲盛产体型超级壮硕的男女，源自大量的劳力工作与低蛋白质的饮食。站在胸膛壮硕的南喀麦隆人面前，瘦弱

的西方人顿时矮了一大截。

结账离开旅馆，我如释重负，终于摆脱日夜轰炸、呼啸作响的非洲吉他音乐，也逃脱妓女的夹击。她们是我见过这行中最不含蓄的女人，常见的拉客法是直接走向目标，以老虎钳般的手紧紧抓住对方下体。千万记住，避免与她们共处于封闭的电梯里。

当我安全抵达火车站，逐渐怀疑我是否真能享受到伦敦那位航空小姐所形容的冷气火车。它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火车，经由神秘历程，从意大利运至此地。车厢内以辉煌的意大利文谆谆告诫厕所与饮水设备的使用方法及禁止行为。

翻译难题轻易解决，干脆不翻。

买车票当然又是一番推挤，此外，还得填一张复杂如人寿保险的表格。

在西非旅行很像在美国西部搭乘驿车。乘客类型颇固定。

火车与丛林计程车乘客看起来都差不多。丛林计程车(bushtaxi)是非洲乡间重要交通工具，通常是大型的丰田或萨维恩(Saviem)旅行车，原本是12到20人座，但是车主永远可以挤上30到50人。如果车子好像挤得要裂开来，权宜之计是加速前驶、紧急煞车，一阵东倒西歪后，永远可以再挤出一、二个位子。乘客阵容一定有几个下士或少尉。通常，宪兵可以坐到司机旁最好的位子，而且总是不必付钱。典型乘客还包括几个南部老师，痛恨被派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教书。毋需任何鼓励，他们便自动娱乐乘客，滔滔不绝叙述在蒙昧无知的北方如何受苦，那里的老百姓毫无上进心，异教徒多野蛮，食物多么难以下咽。乘客中也总有趿着蓝色塑胶拖鞋的异教徒女性，敞开胸部奶孩子，这似乎是此间女性一日到头在干的活。再加上几个来自北方半沙漠地区、身材瘦长、手上拎着祈祷用的席子与水壶的穆斯林，就构成了乘客阵容。

火车乘客也大致如此。喀麦隆人最欣赏的现代科技之一是收录音机，他们可以录下被静电干扰得嘶嘶作响、哔啪嘈杂、声音颤抖不协和的广播，然后以极高分贝一遍又一遍公开播放。北方的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总是激烈竞争空中优先占用权。胜利者可以独家播放他的卡带，不管什么时辰，也不管他爱放的是冗长、平板的西非流行音乐——尼日利亚混合语(pijirO?流行歌曲“噢，难忘的母亲”、本地流行歌曲“我是一个杜

阿拉欧雷的小孩”，或者是刺耳呻吟的阿拉伯风格甜腻音乐。音乐播放只要稍有空档，即代表奉送对手机会，绝不可以。喀麦隆城市里，本地官员与外交人员住宅区的最大差别在于噪音量。非洲人常很困惑西方人为何那么爱安静，他们分明有钱可买足够电池，日夜不停播放收音机。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另一大差别是小便方式。基督徒男性站着小便，使用火车上的便池十分方便。穆斯林男性却是蹲着小便，必须在快速行驶的火车上，把袍子拉开如帐篷，身体半悬出车门外解决，十分恐怖危险。

此刻我对面坐着一位德国农业专家，前往北方履行后半段任期。据言，他负责推广外销棉花种植。棉花外销是国家专卖，用来赚取喀国亟需的外汇，中央政府十分鼓励农民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疯狂成功！事实上，农民花太多时间种植棉花，忽视粮食作物生产，不仅粮食价格亲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會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奇怪的是，德国农业专家对此结果并不沮丧，认为这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善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眼前，这位年轻人类学者吃着一根根香蕉，心头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趟车程原本号称三小时，结果足足开了十七个小时。气温慢慢下降，火车爬上高原，我们逐渐靠近恩冈代雷。黑夜骤然降临，车上灯火俱灭。我们坐在阴暗中吃香蕉，用破碎的德语交谈，看着矮小的灌木没人黑暗。当我开始忧惧一辈子下不了火车时，终于到了恩冈代雷。

一种疏离陌生的感觉立即袭来，远比我在南方时还强烈。

恩冈代雷是南北交界点。因为气候凉爽，又有铁路通往首都，颇受白人欢迎。铁路虽为此地带来变迁冲击，它仍保有大片的茅草屋聚落。

往南走,茅草屋便完全被居民热爱的浪板铁皮屋或金属板屋取代,这种房子在大太阳底下热不可挡,还是巨大辐射体,到了晚上,仍和白天一样闷热。以西方人眼光来看,非洲城市的丑陋,这些铁皮屋功不可没。这种观点多半带着民族优越感:茅草屋“美丽如画、质朴原始”,铁皮屋则是“贫民窟”。但是恩冈代雷不像多数非洲城市那么刺眼。暮色里,千百道炊烟袅袅升起,十足西方人眼中的非洲景观。到了白天,你会看到处处成堆的生锈垃圾,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骑着塑胶花装饰的小机车,呼啸自垃圾堆蛇行而过。

但是此时,我和德国佬正忙着与计程车司机交涉。虽然我已经接受了冤大头的历史性角色,德国佬却与司机恶狠狠杀价,带着熟悉路径者对计程车司机的高度鄙夷。结果我们以最不绕路、最合理的价格被载到天主教会,与德国佬相熟的神父热烈欢迎我们C

一般人认为神职人员都以中世纪好客之道接待旅人。有些教会的确会提供食宿,但对象是出差路过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乏味的浪人c他们受够了那些身无分文、以为可以在非洲白吃白喝的搭便车旅行者。在这些旅人威胁下,好客之道必须停止,否则到头来,教会就会沦为旅馆经营者。但是我急着前往新教教会,我相信他们正在等我。由于公文往返的拖延,我的田野调查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没见过。忧虑萦绕心头,我害怕多瓦悠人根本不存在。也许地方官的文献不是忠实记述,“多瓦悠”三个字在土语里便代表“没人”?我礼貌询问天主教会里的人:“谁住在那里?”是的,多瓦悠人确实存在。幸好,天主教会与他们没啥往来,那些人坏透了。在神父开设的学校里,他们是最糟糕的学生。我干嘛要研究多瓦悠人?他们生活模式的背后原因?很简单:无知。

译注

pijin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语,尤其娃指当地语言与英法语混合的语。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在尚未认识传教士之前,年轻人类学者便已摸清他们的底细。除了自以为是的地方行政官与剥削的殖民者外,传教士也在人类学的鬼神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有人拿着锡罐在你的面前摇晃,要求你捐钱支持教会的海外工作时,惟一理智可敬的回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你反对教会对外国的介入。传教士的行为,文献记录斑斑可循。人类学老师在入

门课上便告诉学生,是美拉尼西亚教会的暴行与短视才导致船货运动(cargo。!。沪与饥荒。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教会被控贩卖奴隶与雏妓、巧取豪夺土地,以武力与地狱之火恫吓原住民。教会摧毁传统文化与原住民自尊,将全世界原住民矮化成仰赖布施、无助困惑的白痴,让他们成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奴隶。此中最大谎言是传教士灌输给第三世界的思想体系,在西方世界早就多半被扬弃了。

当我抵达恩冈代雷的美国教会时,内心深处正是这种想法。就连与传教士说话,都好像背叛了人类学:因为自从号称发明田野调查的马林诺夫斯基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人类学者便惶恐沾上与教会打交道的污点。我会小心提防魔鬼诡计,何况我若想省时间,便应与真正的多瓦悠人接触。

大大出乎意料,我受到热情欢迎。我发现传教士并非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少数一两个老派传教士除外),相反,他们极端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相较之下,人类学似乎被捧上难堪的高位,成为对抗文化误解的特效药——这是我无法衷心接受的位置。

我碰到的第一个传教士是朗恩尼尔森(RonNelson),他经营一个教会电台,播音范围涵盖西非洲大部分地区(发射器非属国有的地方)。他和太太散发着一股静谧的力量,远非我想象中歇斯底里的上帝卫队(毕竟愿意远渡重洋、驯化异教徒皈依基督的人必定是个宗教狂)。我的确在一些较极端的宗教团体中看过这类疯子,当我打算带几尊繁生偶像(fertilitydoll)回欧洲时,他们抨击我将魔鬼带进上帝的国度;这些偶像应当被焚毁,而不是拿来展览。幸好,这类宗教狂是少数,如果我碰到的年轻传教士成为主流,他们将更趋式微。

整体而言,我很讶异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的符号语言。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经费不小心被非洲银行吞下肚,全靠教会借钱给我,才能开始设立田野工作点。当我生病,教会治愈我。当我束手无策,教会给我打气。当我的补给品耗尽,教会让我在理论上只供所属人员使用的福利社买东西。对饥饿、疲惫的田野工作者而言,那个福利社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宝库,提供便宜的进口物资。

对毫无心理及物质准备要面对丛林生活的人类学者而言,教会不只是紧急支援站,更是绝对重要的庇护所,实在受不了时,你可以逃进教会,吃肉、说英语,与自己人相处,不用烦恼最简单的句子都要费尽唇

舌解释。

法国教会也相当照顾我，显然认为欧洲人必须团结对抗美国人。我最喜欢的法国传教士是活力十足、快乐外向的佩雷亨利(PbHenri)。他曾和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

生活好几年，据他的同事说，他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向富来尼人传教”。他热爱富来尼人，每天花数小时与会说“纯”富来尼语的人讨论文法细节。亨利位于山丘顶耶稣会的房间是圣坛，也是图书馆。他录下许多与民族志资料提供者(! &。。斤的谈话。靠着神妙如希思鲁滨逊(HeathRobinson)?的机器,辅以手肘推撞、脚踩、膝盖撞击各种复杂开关,他还完成了所有的资料整编、打字、交叉对比。他是那种转速比常人快一倍的人。当他听说我需要一辆车子进入丛林,马上带我旋风般走访各种门路,包括看了几辆十分便宜、几乎要解体的老爷车。最后我们抵达机场酒吧,老板乍看是典型的法国殖民者,却是伦敦人,他认识某个人,那个人又认识一些有车要卖的人。下午,亨利又带我去看了一些车,并帮我谈妥复杂的保险选择,只要是在太阳底下发生的意外,都在保险之内。最后,我用教会借我的钱买了尼尔森的车子,装满补给品,准备立刻前往田野。他们也慷慨借了一些工具给我,那是教会扎根多瓦悠20年,辛苦炮制出来的东西。除了语言学资料外,还有亲属关系表(错得离谱)以及民族志学的零碎资料,足以让我唬弄多瓦悠人。。熟悉他们的文化,要察觉他们是否说谎,易如反掌。我还在英国时,曾和“萨摩亚语言学研究所”里的两位研究员联络,取得多瓦悠语的词汇表,以及一份动词系统与基本音素的大纲。我自觉准备十分充分了,快乐地揣想第二天便可以进入空气干净清新的丛林,对“我的原始人”展开严谨无比的深入分析。就在这时,官僚作风再度将我击倒在地。

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我的主人以对待无知笨蛋的容忍语气温和透露,在我还没弄清楚文件之前,我和我的宝狮404哪儿也不能去。到处都有宪兵驻守,他们除了检查文件,啥也不做。你无法预知碰到的宪兵是不是文盲,除非紧急状况,最好不要企图蒙骗过关。

因此,我拿着所需文件出发前往县府,展开生平最错综复杂、诡异的追逐游戏。他们告诉我牌照登记费是120镑,经过一番免不了却不算严重的推挤,我拿到宝贵的牌照登记表,送到财政部,他们却拒收,因为上面没有200中非法郎的印花(用来支付行政费用)。根据此地规定,印花只限当曰有效,而且仅邮局的“包裹”柜台有售。但是邮局没有低于250法郎

面值的印花，我便贴上250法郎印花。回到财政部，他们却认为此举不符办事规矩，必须交由督察裁决。悲哀的是，督察被“公事饭局”耽搁了，稍晚一定会回来。但他一直没回来。我看到一个宿命的富来尼计程车司机，同样在衙门里寸步难行，靠着穆斯林的信仰对抗逆境。他的重要战役是付电费，从一个办公室冲到另一个办公室，企图抽冷子逮住一个肯办事的人。办事人员对他越来越不客气，我想是在惩罚他的催促，毕竟我也不过才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合格的人盖好章，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公文跑件。

第二天我重返财政部，回到最早的那间办公室，将手中的文件交出去，换来一式三份的表格；又经过数个小时的跑文，将这个一式三份的表格换成更多一式三份的表格，然后送到城的那一头盖章（中间只绕了一小段路去买所需印花）。

这时，那个富来尼司机依然呆坐在财政部，虔诚祈祷，相信惟有上苍的直接干预，他才能获救。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到了第二天傍晚，我为了牌照登记大约已花了200镑，即将结束我的漫长奔波。最早在县府接待我的人员满怀兴味看着我，将其他人赶出办公室，请我坐下来。他绽开大大的笑容说：“恭喜你。多数人得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办完。你带来文件、收据、申报书没有？”我把这些文件统统交上去。他将它们收进公文夹里，万分戏剧性地说：“谢谢你。下个礼拜再来。”我吓呆了。他愉悦地笑着：“牌照登记卡用完了，但是一二天新货就会来。”迹象显示我必须坚守立场，我使劲激烈争辩，终于拿到临时登记证，带着公文夹离开他的办公室。

我在暴雨中开车绕道前往冈纳（Gouna），沿途风平浪静。

那是条碎石路，以当地的标准来看，已经算是相当好了。人们曾警告过我途中的“趣味景象”，所以我开得非常慢，从高原降到平原，气温陡升，好像驶进烤箱。在此区开车的一大危险是道路安全标志。譬如某些桥只容单线通车，为了确保驾驶减速慢行，官方会睿智地在桥头两端的路中摆上两排砖（那时尚无任何警告标志）。未能察觉这些谨慎措施的驾驶人会落得车毁人亡，河床上到处是报废轿车与卡车残骸。穿行乏味的灌木丛，寻找沿途的车祸新残骸是标准的消遣。如果搭乘丛林计程车，看到车祸残骸，乘客中必然有博学多闻者能说出车祸故事。那边的卡车是从乍得入境，油箱爆裂，整辆陷入火海。那边是两个法国人骑乘的摩托车。当他们撞上减速砖块时，时速至少80英里，整个人都被桥边栅栏刺

穿了。

惟恐熟悉路径的驾驶过于轻忽，官方还会以花岗大石头标出路面松软之处，但是这些石头在暮色中几不可辨，有一次差点要了我与朋友的老命。

但是此刻赶着两百公里车程，我一切满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丛林、泥屋村落、热情挥手的孩童，以及路边成堆贩售的山药。现在是七月底的雨季高峰，满眼尽是矮小的绿色灌木与青草，因为干季里的森林火灾让大树无法成长。眺望远处是哥德特(Godet)山脊，赤裸的花岗岩锯齿嶙峋，那是多瓦悠人居住的地方。

数小时后，我抵达冈纳，遍寻不获地图上标示的加油站。它根本不存在。英国地图素来讲究陆地测量式精准，在景观呈现上和我手中的法国地图大异其趣。法国地图很少有渡河处、教会尖塔等标记，而是大幅介绍餐厅与美丽景点。光看我的法国地图，会误以为轻轻松松便可从一处充满感官享乐的地方到达另一处。

进入泥巴路，前十哩还算平顺。道路两旁是大片照顾良好的农田，间杂点缀黑色灌木林。我肯定田里种的是玉米，结果是小米。终于，在道路两旁园子里满足地耕耘的正是我此行的目标——多瓦悠人。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他们对我微笑挥手，停下辛勤工作，眼睛追随我的车子，展开热烈讨论——显然是在讨论我是谁。然后道路越来越糟，逐渐变成大石遍布、凹沟深陷。我显然开离了大路。这时，两个小孩子急忙跑来，鞋子高举头顶，以防泥巴派脏。他们会说法语，我如释重负。是这条路没错。但是路况很糟呀！它以前还不错。后来，我才听说修路的预算神秘失踪，同时，副县长却买了一辆美国产大车。但是路况太差，他无法驾车往返县城。真是报应不爽。两个学童说他们的学校就在前面路上，我很高兴载他们一程。当我们颠簸弹跳前进，沿路我又载了几个小孩，足足有七八人呢。

终于遇见我的多瓦悠人，我反而不知该说些什么。“你们是多瓦悠人吗？”我问。惊人的沉寂。我重复问题。他们同声怒吼，傲慢否认与那种“狗崽子低级民族”有任何关系。他们是都帕(Dupa)人。只有笨蛋白痴才会搞混两者。多瓦悠人住在山的那一边。我们的谈话骤然结束。又开了十几哩，学校到了，下车时，他们脸上依然带着被侮辱的表情，礼貌向我道谢。我继续往前行。

根据我的地图，波利（Poli）应该是个不小的镇。地图上未注明人口数，但它是副县城（sous-prefecture），有一家医院、两个教会、一个加油站与一个小机场。就连大比例尺的英国地图，也显著标注它的位置。我想像中，它大概和英国的切尔登翰（Cheltenham）差不多大，只是建筑没那么辉煌。

事实上，它只是个小村，仅有的一条街道延伸数百码，两旁是泥屋与铝片屋顶。数百码后，这条街便后继无力，消失于矮树丛与旗杆后面。我转身四顾，企图寻找路的踪迹，但是没有，它就此打住。波利小镇有墨西哥西部城镇的午觉气氛。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游走，瞪着我。酒吧挂着锡制招牌，那是间惨淡的小屋，墙上的装饰是乐透彩券的广告与消除文盲运动的口号。它以抖擞的语气写道：“文盲缺乏能力与资讯，是迈向国家整体水准提升的障碍。”我不知道文盲要如何阅读这个告示。酒吧空无一人，但是我跌坐椅上，等待，忧愁地望着道路前方的泥海。

举世皆然，酒吧是你具体感受城镇气氛与谎言幻象的地方，毫无例外。十分钟后，一个脸色疲惫的男人出现，告诉我呆坐无用，啤酒三个星期前便卖完了，新货可望在一天内抵达。现在，我已经摸透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病”，转身离去，前往新教会。

那是几栋锡顶房子（此间教会的典型建筑），教堂位于中间，由轻型方块砖盖成，上面有浪板铁皮的尖塔。教会负责人是眼神狂野的美国牧师，他与家人已经在此传教25年。它与恩冈代雷的教会同属一派，教会里的人亲切收容我，直到我在村子里找到住处为止。惟一令我困惑的是：

每当我提到波利教会，人们马上岔开话题，谈丛林生活的辛苦、与世隔绝与闷热。直到我看到赫伯特布朗

（Herbert B.）牧师，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他的真名，你可以把他视为小说人物。）

一个奇怪的人影现身屋前，上身赤裸，露出便便大腹。他头戴遮阳帽，上面有大英帝国标记，与帽檐下的鲜紫色太阳眼镜形成不协调画面，手上拿着一大串钥匙与螺丝起子。打从我认识布朗牧师以来，从未听他完整说过一个句子，虽然他口操三种语言，短短四个字，便从英语说到富来尼语、法语又跳回英语，还不时以富来尼语咒骂、肢体动作、改变

话题来打断原本就十分快速简短的句子。他的生活方式也类似如此。他可以突然放下经课，跑去最爱的车库敲打脚踏车钢圈；也可以把年迈失修、胡乱发作的发电机狠捶一顿，发电机还没有教训好，又跑去发放咳嗽药；半途可能又跑到园子里赶山羊，回去对会众发表讲道，抨击欠债的罪恶。这一团混乱还必定伴随尖叫与怒吼、绝望与挫折，脸色胀得猪肝红，让身旁人唯恐他一命呜呼。他强烈相信魔鬼存在，因为他就深陷一场与魔鬼的个人殊死战。这解释了为何他的努力总是变成泡影。他进口的农耕机碎成破片、水泵坏了、房子倾颓瓦解。他的生命就像一页与熵(entity)⑥的对抗史——将就使用、修修补补、挖东补西、左支右绌、锯这砍那、捶打敲击——漩涡般无止尽。

因为如此,这个教会充满疯狂紧张气氛，与邻近天主教堂恰成对比；那里宁静安详、一切有序。只有一位神父管理教会，手下两名修女负责分发药品。园子里甚至还种花呢！

多瓦悠人对此有一解，他们说新教会的牧师是铁匠。在多瓦悠社会里，铁匠是隔离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铁匠阶级只能与铁匠阶级通婚,不能与其他多瓦悠人共食，也不能一起汲水或者进入他人的房子o铁匠必须与众人隔离，因为他们制造噪音、气味，还说话奇怪。

译注

①船货运动：此名词普遍使用于澳洲托管地之新几内亚，用以描述自1935年以降流行于此K的千禧年运动（millenarymovement),他们相信千禧年将因死者之灵携带大量欧洲人的货物归来而开始，货物将平均分配给此一运动的附和者。后来此一名词被广泛用来指西南太平洋区各类反欧洲人的运动c

②富来尼人：两非洲萨赫勒(Sabel)一带的游牧民族，以牧牛为生，主要分布于塞内加尔、几内亚、尼H尔、马里、乍得与尼日利亚。

③人类学者进入m野地点，开始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如户门调查、记录系谱、习知当地的各种角色,有关风俗信仰的种种则询问适当对象，这种访谈对象称之为inforiam,亦即资料提供者，《丐代文化人类学》翻译为报导人。

④鲁滨逊（1872—1944):英闰著名漫画家、插画家与剧场设计者。

他的漫画里经常出现奇妙的机器发明。后来人们便将荒谬无用或者极端复杂的机器称之为“希思鲁滨逊机器”(a Heath Robinson contraption)

⑤亲属关系常指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部分)的一套复杂规则,用以支配继嗣、承继、婚姻、婚姻外性关系以及居处的问题,并从血亲和婚姻各方面的联系来决定个体及群体的地位。人类学者基辛说,人类学者研究一个社会,必须先了解亲属关系,才能了解其他事情。有的社会,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竞争,都可能用亲属关系来说明。亲属关系也作为人们与非亲属以及神灵之间关系的典范。即使不是研究亲属关系领域的人类学者,一旦要向读者描述他所研究社会的生活,也必须设法引领读者了解复杂的亲属关系。

⑥熵:热力学名词,后来用以引申代表系统的无序性与混乱度。熵越大,越混乱。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非洲的一天早早便开始。我在伦敦时习惯八点半起床,这里五点半天光一亮,人们便开始运转。我被敲打金属声与尖叫声准时吵醒,猜想我的牧师邻居开始干活了。他们分配了一整栋旧而大的教会房子给我。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何等奢华;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自来水,更别提电力了。隔壁有个煤油冰箱,颇引起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怪物。它是早年丛林生活的重要商品,后来因城里装了电力而变得稀少昂贵。煤油冰箱诡谲难测,乖张错乱,常会毫无预警自动除霜,毁掉你一整个月的肉品储存,或者吐出足以火焚人身的热气。煤油冰箱必须避免干燥、潮湿、地面不平,运气好的话,它或许愿意制造一点冷却效果。由于喀麦隆是多语言与混合语的国家,使用煤油冰箱还有其他危险。英国煤油、汽油经常与法国汽油、美国煤油、汽油精搞混。仆人将汽油加进煤油冰箱的事时有所闻,制造了大灾难。我偷偷瞄了一下冰箱内容,里面小心堆放装着黄色大白蚁的纸袋。即便死了,白蚁看起来仍像在蠕动。我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大啖这种非洲佳肴,一次顶多只能吃个一二只,它们却是多瓦悠人的最爱。只要下雨,白蚁便蜂拥而出扑向灯火。捕捉白蚁的标准方法是在水桶里放一盏灯。当白蚁扑向灯火,翅膀一收,便掉入水中。肥胖的身躯可生吃或烤来吃。

经过一天休息,又到了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恩冈代雷的教会曾提醒我别忘了向地方警察局报到,还要去晋见副县长(他是政府代表)。听从教诲,我带上所有文件,徒步进城。虽然距离不到一哩,但是白人

步行显然是罕见怪行。

一个人问我是不是车子坏了e村人冲上前来与我握手,叽喳说着不标准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尼语入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理喻。

警察局约有15名宪兵,全副武装。其中一人正在擦拭半自动冲锋枪。司令官是南方壮汉,身高六呎五。我被召进他的办公室,他仔细检查我的文件。我到此的理由?我拿出我的研究许可,那是一份盖满图章、贴满照片,颇震慑人的文件。当我企图说明人类学工作的性质时,司令官显得很不高兴。他问:“但是,人类学到底要干什么?”我徘徊在即席发表“人类学入门”演讲与简单解说间,最后选择了笨拙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上,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他的眼睛在头巾下审慎评估我。我突然注意到他嘴里含着一根针。他用舌头摆弄针的平衡,一会儿,针尾那头放在舌尖向外。一会儿,轻巧转弄,又将整根针收进嘴里,在里面灵巧调整,跑到嘴巴另一边,针头向外。吞回去,这回儿出来的又是针尾。看起来简直像蛇信,恐怖极了。我预感我有麻烦了。果然不错。他暂时让我过关,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他将我的名字与个人详细资料登录在大公文卷宗里,令我想起大使馆里那些黑名单档案卷宗。

副县长住在一栋建于法国殖民时代、潮湿且外墙剥落的房子里。外墙罅隙与裂缝长满苔藓。他原本在城外山上盖了一栋辉煌的新宫殿,但是现在它空置山头,冷气没用过,瓷砖地板也没人踩踏。针对这个现象,有几种解释。一说副县长贪污,政府因而没收此房子。我与多瓦悠人混熟了后,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版本。这栋房子位于多瓦悠人的古墓场上,多瓦悠人抗议无效,也未威胁副县长,没这个必要,他们了解祖灵。他们只告诉副县长,他搬进新居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死亡之日。不管哪种故事版本,总之副县长没有迁进新居,注定要从老房子的窗口哀怨地望着新屋。

一位郁郁不乐的仆人听了我的求见理由后,带我进去。看到他跪下来禀报副县长,我大吃一惊。

之前,便有人告诉我可以送雪茄作礼物。我规矩奉上,他优雅收礼,雪茄瞬间消失于飘逸的袍子里。我仍直挺挺站着,仆人也仍跪在地上,

副县长坐着。我的文件再度被严密检查。我开始担心离开喀麦隆前,这些文件就会翻烂了。他冷淡地说:“不行。我不能让你待在波利。”这真是一大挫败。我原本以为这只是礼貌性拜会。我小心翼翼强调:“但是雅温得给我的研究许可准许我待在波利。”他点燃我送的雪茄:“这里不是雅温得。你没有我的许可。”此刻如果拿出钞票贿赂,显然不礼貌,尤其那位可敬的家仆仍跪在地上,仔细聆听每句话。我坚持问如何才能获得您的允许?”他说:“县长的信。免除了我的责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加路亚(Gaïnia)找到他。”他转身,埋首公文。会晤就此结束。

回到教会,布朗牧师似乎认为这个结局证明了他的悲观主义。对我的不幸,他掩不住感动与雀跃。他怀疑县长真如他们所言在加路亚,就算如此,我也未必见得到他,更何况他可能去了首都,数个月后才能回来。布朗牧师的生活充满诸如此类的不幸。他咯咯笑着走开,“没有希望的,这里是非洲!”

我估算自己还有足够的汽油可以开到百哩外的加路亚,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

第二天我踏出房门,讶然发现屋外挤满自信期待的脸孔,准备和我一起上路。在非洲,此类消息究竟如何散布,始终是神秘的谜。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一举一动如何被密切注意。光是检查油表便可招来连番的搭便车要求。多瓦悠人绝不接受“不”。不少人批评欧洲人是家长心态,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人不只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雇佣是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他的太太生病了,这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尽可能帮助她痊愈。如果你有东西不要,他有优先选择权,之后你才能给别人,否则便是不礼貌。你几乎无法在自身的利益与他的私生活间划清界线。稍不小心,欧洲人便会深陷范围宽松的各式亲属义务中(除非他的运气很好)。如果一个雇工称呼你为“父亲”,那是危险征兆。接踵而至的一定是聘金未付或牛只死亡的悲惨故事,如果你不帮助他解除一点负担,就是背叛。何谓“我的”与“他的”,两者界限随时可以谈判改变,而谈到攀附富人,从中尽量获利,多瓦悠人可是不逊任何人的专家。多数雇佣摩擦来自对“贫富”关系的欠缺理解,导致双方对条件各有解释。西方人总是抱怨雇工(现在大家不再称黑人仆佣为“男孩”或“佣人”)卤莽、厚颜,因为他们期望雇主照顾他们,次次帮他们解危。刚开始时,碰到类似今天的状况,我也是困惑不已。我似乎无法随意行动,凡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后面一定拖着庞然重担。如果你让人搭

便车进城,会更苦恼,因为接着他期待你资助他在城里的吃住,如果拒绝,他便懊恼。毕竟,你将他载到陌生地方,却弃之不顾,这是不可思议之事。

但当时我是第一次让人搭便车,什么也不知道,能载几个便载几个。又一次,欧洲想法与非洲想法大大不同。根据当地标准,一辆车坐6个人,根本是空车。如果你坚称塞不下了,会被斥为胡说八道。当我摆出非洲人预期的欧洲人坚定态度,成功拒绝塞进更多人后,却懊恼发现他们拉出妥善藏匿的各式行李,统统以随身携带、内胎割成的橡皮绳绑在车顶上。

经过这番长时间的拖延,我终于出发了,车子喘气咆哮,前往加路亚。旅人的各式特色开始显现。多瓦悠人不爱旅行,对汽车颠簸反应激烈。不到10分钟,便有三到四人大吐特吐,搞得全车都是秽物,他们根本懒得开窗朝外吐。当我们终于抵达关哨,我早已疲累不堪。白人独自旅行不会引起警察注意,如果拖着一大群非洲人,便值得关注了。关哨警察对我的动机与行动非常感兴趣。

护照上的“博士”两字比任何东西都有效,迅速解除了他们的疑虑,我的乘客便没那么幸运。当我忙着向警察解释为什么没有牌照登记证,并亮出我深谋远虑从雅温得带来的卷宗档案时,我的乘客正忧郁地排成一行,被要求出示过去三年的缴税收据、身份证、全国惟一政党的党证等等。

可想而知,他们并非样样具备,我又被进一步耽搁。显然午休之前,我什么事也办不了。

加路亚是个奇怪的城市,位于景观乏善可陈的本维河(Ri胃Benmie)畔,此河雨季时奔腾如密西西比河,干季则变成潮湿砂地。加路亚城的生计全赖任性多变的本维河,从满城悬挂如烟幕的鱼干便可窥知。鱼干是本城的主要工业,另外两项产业是啤酒与行政机关。对多瓦悠人而言,啤酒是特别的销魂物,他们尤其热爱法国殖民时代背下的“三三牌”啤酒。“三三牌”啤酒的特性是让你直接由清醒掉入宿醉,中间毫无微醺与酒醉阶段。从啤酒工厂的落地玻璃窗,你可以看到啤酒瓶无人操作,自动滑行穿过一个个生产过程。多瓦悠人对此尤为着迷,可以数小时连续观赏此一奇观。他们以“葛思”(gerse)形容啤酒制造过程,意指“奇迹”、“神奇”、“神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谁知它日后会深深勾起我的人类学兴趣。“葛思”也是多瓦悠人丰富的暗喻来源,用以比

喻最形而上的概念。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满怀忧惧,我现在认为就算我能见着县长,也得等上数天。一种冷静的宿命情绪降临我心。事情该拖多长，就得拖多长，担心也没用。田野工作者的特征包括心情要能随时换档,一旦面临上述情形，就切换心情，让事情去自生自灭。

我初次进城,还不认识可以招待我的人，只好先住进旅馆。

加路亚有两个旅馆,一个是现代化的诺瓦提连锁旅馆(Novotel)，专门针对观光客，住一晚起码三十英镑。另一个是老旧的法国殖民时代建筑，要价不及诺瓦提连锁旅馆的零头。后者显然比较符合我的风格。它由独栋木屋组成,茅草屋顶,家具布置军队化，但是有水有电，显然是为派驻远方、寂寞无聊、酷爱阳光的法国军官而设，提供他们休息与娱乐。木屋外有极大的阳台，高贵的房客可以坐在阳台饮酒,望着太阳缓缓沉下树梢。此情此景浪漫异常,让你无法忘怀非洲的存在，因为邻近的动物园传来阵阵狮吼。

就是在这间旅馆，我初次邂逅后来被封为“枯伊女士”的某位非洲女人。不知为了什么，加路亚的气温硬是比波利热上至少十度,又因紧临本维河,蚊虫肆虐。与尽情呕吐的多瓦悠人共处一车后，我渴望洗个澡。才站到喷头下，门上便传来阵阵刺耳的搔抓声，不管我如何询问，对方就是不回应,仍执意抓门。我围上浴巾，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超级肥胖、五十好几的富来尼女士。她状似害羞地傻笑,一边用尺寸惊人的脚在地上画着圆圈。我问:“什么事?”她做出喝水的动作:“水，水。”我大起疑窦，却又模糊想起沙漠人的好客之道。当我还在衡量轻重时，胖女人已经沉着穿过我的身畔,拿起玻璃杯,到水龙头下装水。令我恐惧万分,她居然开始解开大如帐篷的衣裳。服务生偏偏选在此时替我送来肥皂,误解情势,一边喃喃道歉，一边退出房门。我陷入一场闹剧中。

幸好，我在东方与非洲研究院选修的一点点富来尼语帮了大忙。我大喊：“我不要。”极力否认我对这个女人有任何肉体接触的欲望（她令我想起“劳莱与哈台”里的哈台）。默契下,服务生抓起她的一只手臂,我抓住另一只，将这位胖女士架出门外。但是她不相信自己的魅力不被激赏，每小时回来一次，在我门外徘徊，嘴中不断喊着“枯伊，枯

伊”，好像呜咽恳求的猫儿e最后我实在厌烦了。显然她和旅馆管理人员沆瀣一气,我只好自称是神父，派驻丛林里，是来城里晋见主教的，实在无法苟同这般闹剧，闻言，旅馆人员既吃惊又困窘。从此，胖女人便不再骚扰我。

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多瓦悠人的最爱。他们夜间有营火会，主要娱乐便是打屁。我叫助理协助我练习说“富来尼胖女人的故事”，每当我讲到“枯伊”的部分时,多瓦悠人便尖声大笑，抱膝在地上翻滚。这个故事对建立关系颇有助益。

相较之下，第二天我与县长的会面真是反高潮。我被直接带进县长办公室，他是个高大黝黑的富来尼人，倾听我的问题后，拿起电话口述一封信，一边和气地与我聊天,讨论政府在异教徒区域建校的政策。秘书将信拿进来，他签了名、盖了章，祝我幸运与“不屈不挠”。有了此项武器，我返回波利。

首要之务是找个助理，然后开始学习多瓦悠语。诡异的是，你在民族志纪录里总是看不到人类学者助理这号人物。旧神话将身经百战的人类学者勾勒为独行侠,进入一个聚落，打理好住处后,便在几个月内“自然学会”当地语言;民族志文献至多提到翻译，但是通常几个星期后，人类学者也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这种神话与所有语言学经验完全背道而驰。在欧洲,一个人可能在学校修了六年法语(还有语言学习器材的辅助)、去过法国、浸淫于法国文学，但是碰到紧急状况，还是说不出几句法语。一旦置身田野调查地,他顿时变成语言学奇迹,没有合格老师指导、双语教材、文法与字典，却能马上学会一种对欧洲人而言远比法文难的语言。最起码这是人类学者企图给人的印象。除了当地语言外,人类学者不免要借助混合语甚至英语，文献也不曾提及这些。

状况很清楚,我需要一个会说法语的多瓦悠当地人，这代表他上过学。考虑多瓦悠的情况，受过教育代表他是基督徒。这是个缺点，因为传统信仰才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c但是别无选择,我决定去找当地的中学，看看有没有合适人选。结果，我根本没去成。

因为我已经被“预订”了。一个正在波利教会受训的传道士知道我要找助理，正好他有12个兄弟。他以罕见的企业家嗅觉,马上将12名兄弟从20哩外的丛林村落动员到我面前，一一介绍给我。这个厨艺好、个性佳，可惜不会说法语。那个会读会写，身强力壮，可惜菜烧得糟透了。还有这个是好基督徒，很会说故事。看来，他的每个兄弟都有伟大优

点，而且价钱极为低廉。最后我同意暂时试用一个，选择了法语说得最好、能读能写，却完全不会烧菜的。当时我便发现那个传道士才是最理想人选，可惜他有工作在身。后来他因淫乱好色被逐出了教会。

时候终于到了（已经拖延了太久），该搬进村里了。多瓦悠人分为两类：山地与平地。每个我咨询过的人都建议我住到平地多瓦悠人聚落。他们比较不野蛮，多数会说法语，生活用品供给也比较容易。山地多瓦悠人则野蛮、难相处，崇拜魔鬼，什么也不会告诉我。根据此类资讯，人类学者只能有一种选择——住进山地多瓦悠人村落。距离波利镇九哩外便是孔里村(Kongle)，虽然位于两座山间的平原，却是山地多瓦悠人村落。他们说那里有个固守传统的老人，拥有来自祖先的神秘知识。通往孔里的路差堪可行，我决定搬到那里住。我与新助理马修商量，他听到我要住到丛林里，吓坏了。这表示我不会有漂亮房子与其他仆人？是的。但是我不会住到孔里吧？——那里全是野蛮人。我应当交给他办。他可以找父亲商量，他是平地多瓦悠人，一定可以安排我住到教会附近。我再次向他解释人类学工作的性质。在这之前，惟一的类似工作是语言学者建立的工作站。他们到此研究多瓦悠语，花两年时间盖了一栋漂亮的水泥房屋，所有供给都是飞机送来。马修丧气地发现我的研究规模实在寒酸。他的地位高低全系于我，所以他总是不忘提醒：他的尊严滑落都是因为我对不起他。

终于要展开初步接触。依据马修的建议，我带了一些啤酒与烟草，出发前往孔里。路况不算太坏，但是两条河令我不安，后来也证明它们实在讨厌。我的车子常常到了河中央就开始出毛病，原本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这两条河很容易在暴雨时变成滚滚山洪。此处的山都是花岗岩，下雨时，雨水直直冲刷下山，在河谷掀起狂涛。此刻道路两旁人们忙着耕作。他们停下农活、瞪视我们驱车而过。有人转身逃逸。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以为我是副县长派来的人。对多瓦悠人而言，外人是麻烦。马路到了山脚戛然而止，成排的小米梗与仙人掌后面，就是村落了。

多瓦悠小屋是圆形泥屋建筑，屋顶成圆锥状。这种房舍以乡间的草与泥巴建成，美丽如画，对受够丑恶城市的人而言，真是一大纾解。泥舍屋顶攀爬着长瓜，好像英国乡间小屋玫瑰攀爬。马修带路，我进入每个多瓦悠村必备的圆形广场。它是村人的公共聚会场所，也是法庭，宗教仪式在此举行，也是各式重要神坛的所在。它后面是第二个圆形广场，圈养村人共有的牛只。我们穿过广场，进入酋长的院落(compound)?。严格说，“酋长”(chief)并非精确称谓。

多瓦悠社会并没有一般定义中那种握有权力与威权的酋长，是法国殖民政府创造了所谓的酋长，希望透过这些“领袖”统治子民与收税。以前，多瓦悠社会的酋长称为瓦力(waari)，依据分类，他只是有钱人，也就是拥有许多牛只。因此他有能力主办各种宗教祭仪(这是宗教生活的重心)，穷人借着与酋长攀亲带故，可以完成自己无力举行的祭典，因此酋长是非常重要的。有些酋长师法此地的强势部族富来尼人，自抬身价，即使面对族人也拒绝说多瓦悠语。听到母语，却装出听不太懂的样子。因此，当我拒绝和其他白人一样说富来尼语，坚持要学多瓦悠语时，他们颇为吃惊。有些酋长还模仿富来尼贵族的富丽威武阵仗，身上配剑，有专人为他们撑红色遮阳伞。部分酋长还有赞美歌者，走在前面击鼓唱歌，陈腔滥调颂扬主子的特殊成就与美德，全用富来尼语。

孔里的酋长是另一种极端。他鄙夷此种文化沦丧的多瓦悠人，坚持只以母语和族人交谈。我们戛然止步，我面前跪着一个裸露上身的女人，双手交叉盖住只有少数树叶遮蔽的下体。马修低语“她在迎接你，跟她握手。”我依言照办，她开始前后摇晃，不断以富来尼语低吟“谢谢你”与拍掌。

墙内与屋旁闪现鬼祟的脸孔。接下来的场面让我大为窘迫，一个小女孩突然端出一张折叠椅，放在庭院中央，要我坐到椅上。庭院里空无一物，我一个人堂皇孤坐，很像殖民时代照片里那些僵硬、典型的英国人。非洲多数社会非常强调身份地位的差异，非洲人也爱大张旗鼓凸显上下有别。他们以一种西方人无法消受的方式匍匐在地、立正行礼、下跪、鞠躬，拒绝接受此种致意是极为失礼之事。刚到孔里时，如果我与他人平坐在等高的石头上，立即引起极大难堪。村人会想尽办法重新安排，以便我坐得比他们高，或者让我坐到席子上，虽然比坐在石头上矮，但有身份的人才可坐席，也算可以接受的折衷。

此时，寂静越发窒息，我觉得有义务说点什么。我曾说过田野工作的乐趣之一是让你有机会使用日常根本用不到的辞汇。我大喊“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如实翻译后，他们说酋长在田里，马上回来。

朱迪波(Zuuldibo)酋长后来与我成为好友。他大约四十出头，总是满面笑容，有发福的倾向。他相貌堂堂，身着富来尼长袍，配剑，戴太阳眼镜。我顿时明白不管他方才人在何处，反正绝不会是田里。没有人耕田会穿得如此体面，更何况，朱迪波一辈子没碰过锄头。他认为农耕这回事无比乏味，只要听到人们提起农活便满面痛苦。

我开始事先准备的演讲，描述我从非常遥远的白人国度来此，因为我听说了多瓦悠人的好，孔里人尤其善良温和。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我希望与孔里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习俗。我努力说明自己不是神职人员。

刚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住在教会，他们也认出我开的是教会的车子。我强调自己和官方无关，也没人相信，因为有人看到我去找副县长。我又说我不是法国人，这点，他们完全不懂，对多瓦悠人来说，白人都一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礼貌聆听，不时点头低语：“很好”，“是呀，是呀。”很快的，酋长同意我在一周后可以搬进村里，他会帮我与助理张罗一间泥屋。我们一起喝了点啤酒，我奉上烟草。每个人都兴奋极了。当我离去时，一个老女人趴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我问：“她说些什么？”马修咯咯笑着：“她说上帝派你来聆听他们的声音。”这个起步远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又去城里一趟，采买用品与烟草。

多瓦悠人喜爱尼日利亚黑色烟草，它在多瓦悠的售价是城里的四倍。我买了一大袋，准备酬谢资料提供者。我的财务状况依然很紧。离开英国前，我曾安排我的薪水直接由英国汇到喀麦隆。因为钱来自英国，所以会先汇到英属喀麦隆的旧都维多利亚^③，转雅温得到恩冈代雷，最后才到加路亚。

结果这笔钱根本没到；维多利亚的银行直接扣除10%的手续费，便把钱退回英国。这让我咬牙紧撑，债台高筑，欠教会更多钱。你无法和维多利亚的银行联络；写信，他们置之不理，电话也不通。

就在进城时，我首度感染疟疾。我在离城时出现初期症状，微微感到晕眩。返抵波利镇时，眼前已出现重叠影像，几乎看不清路。陷入高烧，还伴随阵阵颤抖与肚子火热绞痛。

疟疾的可悲在于它会让括约肌失能；当你站直身体，便尿在脚上。更糟的是疟疾药千百种，有的是预防性质，有的才是治疗药。不幸的是，我吞下的并非治疗药，这使我的病况更糟，持续高烧，变成抽抽噎噎的病夫。布朗牧师过来探视，欣然于我的病骨支离，给了我一些疗药，警告我：“在这里，没什么东西保证有效。”结果居然有效。让我及时颤巍巍按原定时间搬进村里，但是在那之前，连续好几个高烧不退的夜晚，我都

饱受天花板洞穴飞下的蝙蝠侵扰折磨。我看过不少文章盛赞蝙蝠的飞行功能超级优秀。一派胡言。热带蝙蝠飞行总是迎头撞上障碍物,制造可怕的碰撞噪音。它们特别擅长迎面撞墙,扑翅掉在你的脸上。依照我的“田野必备”名单,我会强力推荐网球拍,迎战满屋蝙蝠,它具有毁灭性效果。除此之外,布朗牧师还拨冗驾临告诉我蝙蝠携带狂犬病毒。这对我的高烧梦魇贡献良多。

直到我打包准备走人时,才发现生病时,有人潜入我的房子,偷走了大半食物。

译注

①院落是家户生产单位。通常是数个独栋房屋与谷仓构成,中央有块空地。院落群体(compoundgmup)的核心是一男性长老,担任群体的头目。他几位妻子,通常每位妻子在院落中都有自己单独的茅屋。典型的院落群体含有头目的未成年孩子,以及已婚的儿子及其妻小。这个扩展式家庭(extendedfamily)有时还可包含头目弟弟的家庭。

虽然住在独栋茅屋的每位太太及其子女构成个别的家计单位,但是较大的院落群体才是日常生活与共同经济的中心家计单位。

者此处是在讲圈内双关语。在基辛的《当代文化人类学》

的“政治组织”一章中,人类学者研究每个社区都会遇到“政治”的过程,往往一到田野场就说:“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

③一次大战后,喀麦隆被英、法占领。1914年,西喀麦隆成为英国托管地,东喀麦隆则成为法国托管地。1960年,东喀麦隆独立,成为“喀麦隆共和国”。西喀麦隆独立运动则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统一,另一派主张并入尼日利亚。

1961年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西北喀麦隆决定并入尼日利亚,成为该国一省。西南喀麦隆则与喀麦隆共和国统一,成为“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的一邦。1972年再度举行公民投票,成为单一的国家,恢复国名为“喀麦隆共和国”。

第六章 你的天空晴朗吗?

连番磨炼与苦难，我终于抵达“我的”部落，有助理协助，有纸有笔。经过那么多障碍，可以开始“做人类学研究”了，我突然一阵惊惶。我越是沉思，越是发现自己对“人类学研究”一无所知。如果要我勾勒人类学研究的图像，我会完全不知道主角要干些什么。浮现脑海的可能是一个人正在爬山(前往“做人类学研究”的途中)，或者在写笔记(已经“做完研究”了)。显然，“学习外国语”必须包含在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定义里。与多瓦悠人聊天也应算是人类学研究。

但这并不容易。首先，我一句多瓦悠语也不会。第二，今早村里并无多瓦悠人，他们全去小米田里工作了。一整个上午，我忙着搞东搞西，试图让我的茅屋变成有效的工作场所。

朱迪波酋长慷慨赐借侧院落 (sidMonipoiid) 的一栋大茅屋给我，紧临他的两个太太与弟弟。许久之后，我才知道此举代表他对我的高度信任，通常惟有心爱妻妾的家人才可以分配到这个位置的茅屋。前任屋主留下一堆无可辨认的东西，箭簇与矛被塞在草堆里(让我想起金斯莉在芬族部落时，曾在茅屋里发现一只人手)。我将这些杂物清除干净后，把配备挂到屋梁上，包括一副从首都买来的波利镇地图。对多瓦悠人而言，地图是神奇之物，他们始终搞不清楚它的道理。他们要我在地图上指出我去过的村子。我指出来后，他们又要我说出那里居民的姓名。他们不明白我为何指得出村落位置，却无法说出村民的名字。

为了表示对我恩宠有加，酋长请人送来两张我初次造访时看到的那种折叠椅。后来，我发现这是村子里仅有的折叠椅，每当有大人物造访，就得送回酋长的茅屋。因此它们就在我们两家间来来去去，令我想起大学时代与三位同学共用的晚餐外套。。

茅屋内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硬土床，那是我睡过最不舒服的床。我不惜斥巨资买了塞了棉花的薄床垫，酋长对此颇为觊觎。他最大的梦想便是一张好床。他向我透露希望死在一张可以传给儿子的铁床上，“不用担心白蚁蛀食”，他咯咯笑说：“白蚁咬到铁柱，保证抓狂C)”

头三个星期，大雨倾盆不停。空气异常潮湿。墙壁长满霉，我十分担心相机镜头受潮。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多瓦悠语的基本规则。一般非洲人多操双语或三语，但是他们全在社会环境里自然学习，从未刻意学习任何一种语言。

要求他们记录一个动词的所有时态、形式、陈述语态，以便了解此

种语言的全部系统,对他们而言是崭新经验。他们从小学说话,轻而易举便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多瓦悠人全然不解他们的语言对欧洲田野工作者是多大挑战。它是一种音调语言(tonallanguage),一个字的音调高低可以完全改变字义。多数非洲语言为两声,多瓦悠语则为四声。一声与四声颇易辨认,二声与三声却相当不易。更惨的是,多瓦悠人会将音串连,形成滑音,一个字的音调因而受到相邻一字的影响。此外还有方言的困扰。某些区域在使用不同词汇与句子构造时,也必须使用不同音调。最重要的是相对音调,一开始,每当我与女人说话,再转和男人说话,便发生困难,因为后者的高音约等于前者的低音。

最令我挫折的是日日为之的问候语。只要我遇到多瓦悠人,便须问候他。这没问题,我已经请助理帮我反复练习:“今日,你的天空可清朗?”“非常清朗,你呢?”“我的天空也很清朗。”不管碰到谁,都得重复这段问候对话。英国人吝于这类仪式,认为纯粹浪费时间,但是多瓦悠人可不像我们如此忙碌,遭到冷淡对待,便觉受辱。有时我会蠢笨地加上两句:“田里如何?”或者“你打远方来吗?”对方马上脸色一沉,茫然不解。此时,我的助理便会快步向前,重复一句在我听来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对方随即脸色一霁:“哦,我明白了。但是他怎么不会说我们的话?他不是已经来了两星期么?”

多瓦悠人对自己的母语评价极低,多数酋长拒绝使用此种原始、不雅,只比动物鸣叫略高一等的语言,因此他们不懂为何有人学不会它。可想而知,他们也是糟糕的语言学资料提供者。多瓦悠人喜欢说通用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靠着学习辅助器材、字典与手册,曾学过一点富来尼语。但人类学传统强调母语,非母语提供的资料“不算数”。事实上,我也发现以富来尼语搜集来的资料错误百出,创造出所谓的“铁匠、佻作、理发匠、割礼人、医师”等不洁行业,与多瓦悠人的分类概念不符。依据我以前读到的资料,这些不洁行业都由同一人为之,祭司则与其他阶级隔离。事实上在多瓦悠社会里,铁匠才是最受隔离的阶级,其他“不洁”工作则分属各阶层。此外,多瓦悠人在一起时通常不说富来尼语。只有一位村民例外,即便与朋友一起都拒说母语,但他也成为自食恶果的典型笑话。

当他与村人一起在田里工作时,他会大声抱怨:我这个高贵的富来尼人,为何沦落到与野蛮的多瓦悠人一同耕作?他巨细靡遗地批评这个狗崽子民族的诸多缺点,听者越听越好笑,歇斯底里倒地翻滚,喘不过气来。每当我坚持用破烂的富来尼语和他说话,娱乐效果更佳,好像唱双

簧一样。

过度仰赖富来尼语有许多缺点。我可以用富来尼语访问，但是深入交谈则绝对避免。多瓦悠人说的是一种劣质富来尼语，省略所有不规则变化，并更改字义以符合多瓦悠人的概念。你必须先熟悉他们的母语，才能将这些预防“隔墙有耳”的变化抓出来。

有一次，我攀山到多瓦悠最远的边界。那里有许多小孩从未见过白人，看到我便恐惧地尖叫着跑开，大人安抚他们说我是孔里来的“白人酋长”。我们一起抽烟，笑谈孩子的无知恐惧。通常我不抽烟，但是我发现一起抽烟、分享烟草可以创造社交亲密感。当我离开时，一个女孩放声大哭，抽噎说：“我要看他脱下皮肤。”我将这句话记在脑海，准备回去后问助理，通常这种状况，我可能是听错字的音调或者搞错同音异义字。但是当我询问助理时，他却异常窘迫。我拿出专门应付这种场合的奉承态度迎合他，给予他全副注意力；多瓦悠人常被邻近部族讥为野蛮，只要感觉别人不看重他，马上守口如瓶。马修百般不情愿，最后才吐露多瓦悠人认为长居于此的白人是多瓦悠巫师转世。白皮肤是我们的掩饰，底下的皮肤是黑色的。我晚上就寝时，有人看到我脱下白皮肤挂在墙上。当我到教会与其他白人会面，我们会在夜里拉上窗帘，锁上房门，脱下白皮肤。马修边以嗤之以鼻的口吻说他一点也不信，眼睛却不停在我身上逡巡，深恐我当场变成黑色。多瓦悠人会有此种想法，显然因为西方人过度重视隐私。

这也解释了多瓦悠人为何对我学习语言缓慢感到困扰，我已在此居住数月，却学不好多瓦悠语，一定是企图掩饰我的多瓦悠本性。大家都知道我如果专心想学什么，没有不成功的。我为什么老要假装不懂多瓦悠语？直到一年后，我第一次听到多瓦悠人称呼我为“我们的白人”，骄傲之情油然而生。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接纳我，是因为我不放弃学习此种不完整且高度被低估的语言。

但，这都是“后见之明”。初抵孔里的三星期，我只知道自己在学习一种超难的语言，一个村人也不见，大雨下个不停，我觉得虚弱，无比孤寂。

面临此种情境，我和多数人类学者一样遁入资料搜集中。我相信人类学论文之所以充斥资料搜集，并非源自它具有高度价值或趣味，而是来自“凡有疑惑，便搜集事实”的态度。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可理解的研究进向。田野工作者无法预知哪些事实到头来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一旦

他将某项事实记录在笔记本里，写论文时便很难舍弃不用。他会记起搜集此项资料时，他在大太阳底下跋涉了多少哩，花了多少小时才逮住正确的人。此外，过滤资料会对你正在做的研究形成预设观点，但是多数人类学论文的动机只在“写论文”，并无其他。

所以，我每日带着烟草与笔记出发，到田里踱步，估算农作物产量、计数山羊数目，做一堆不相关的事，至少可让多瓦悠人熟悉我奇特、莫名的行事风格。现在，我已经开始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不少文章写道：人类学者被研究对象“接纳”，那些作者理应心知肚明这是胡说八道。他们甚至暗示：一个陌生民族到头来会全盘接纳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的访客，并认为这个外来者和本地人并无两样。很悲哀的，这亦非事实。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三个月后，我的关系面临转捩点，酋长威胁收回茅屋。讨论许久，最后我同意最好的方法是我自行建屋。这耗掉我整整十四英镑，雇用割礼人的儿子与医师的侄子建屋，割礼人是酋长的兄弟，他的儿子向他力保我的真诚，并教我如何打猎。医师的侄子则介绍我认识他的叔叔。我的车子自然成为村里的救护车与计程车。女人随时可以向我借洋葱、盐巴。连村里的狗都知道我心肠软弱，群聚在我的茅屋前，大大激怒我的助理。制陶匠与铁匠的生意空前大好。我的莅临提高了酋长的地位。他永远不忘提醒我他受邀参加的各式庆典的时间，好让我免费载他一程。对那些口袋空空却满怀期望的人而言，我就是他们的银行。急着为脚踏车、煤油灯更换零件的村人，都知道找我代办。而我，还是病人的良药。

当然，我也有缺点。我吸引外人进入村子，这是不好的。我常以蠢笨的问题累死主人，还拒绝理解他们的答案。我可能将所见所闻泄漏给外人知道。此外我常捅娄子，让大家困窘不堪。替如一次，我问某男人他出猎前是否停止行房。问题本身没问题，关键是他的妹妹就在旁边。一听到此问题，他们尖声大叫，起身弹往不同方向。稍早前，我还和三个男人坐在茅屋里聊天。突然间，茅屋空无一人，只剩我的助理抱头呻吟。数个星期后，村人仍在窃窃私语我的猥亵之举。

我的语言能力低落构成一大威胁。多瓦悠语言里，猥亵与正常只是一线之隔。音调稍加改变便会改变疑问质词，使正常句变成问句，还是最猥亵不堪的字眼，如“戾”。我常令多瓦悠人错愕捧腹，说出：“今天，你的天空可清朗，戾？”我的麻烦不止于“阴部问句”，还扩及饮食男女的诸种问题。有一次酋长召我去他的茅屋，介绍我认识祈雨巫师。我已经

央求酋长好几个星期，请他安排此次重要接触。我们礼貌交谈，互相试探。此次会面，理论上，我不应知道他是祈雨巫师，我才是被访问的人。我猜想他很满意我的谦卑态度，同意让我去拜访他。我急着离开，因为我买到一些肉(这是这个月来我第一次吃肉)，却将肉交给助理保管。我起身与祈雨巫师礼貌握手，说：“对不起，我家里正在煮肉。”至少，我认为我是这么说的；却因音调错误，一脸错愕的宾客听的是：“对不起，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

孔里人很快便成为翻译专家，懂得将我的错误句子翻译成正确句子。因此，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多瓦悠语真有长足进步，还是他们学会了我的特有混合语。

直到今日，我仍深信我对多瓦悠人的最大价值在“新奇”。如果你认为无聊乃文明特有产物，那是大错特错。非洲村落生活乏味至极，不仅习于日日声光刺激的西方人觉得如此，连村人自己也觉得。芝麻绿豆的小丑闻会被一再讨论爬梳，任何新奇事物都不被放过，只要可以打破日常老套，都被视为单调生活的一大调剂。人们喜欢我，因为我有娱乐价值。没人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或许我会进城，带回新奇东西或故事。或许有人会来拜访我。我可能会去波利，发现啤酒来了。或许我又会闹笑话。我是永不枯竭的话题来源。

为了打发时间，我已经变尽各式无聊花样，是该正常过日子的时候了。第一要事是早早起床。每年这个时候，孔里人为了提防牛只践踏收成，都睡在田里的遮棚里。理论上，多瓦悠人每天都要赶牛回村里的畜栏，但他们甚少如此。传统上，赶牛是孩童的工作，现在他们都上学去了，结果是牛儿随意漫步田埂，蹂躏作物。多瓦悠女人知道如果牛只践踏了她的田，代表她偷人，丈夫可以痛殴她一顿，因此特别小心守田。为了防止来年粮食受损，有时孔里人好几个星期才回村里一趟，第二天又一大早离去。

因此，我努力在天色破晓便起床，出外问候村人。“问候”是非洲重要传统，包括素不相识的人到你家，一坐数小时，聊尽所有话题。席不暇暖极为失礼，因此大家搜索枯肠、一再重复相同话题——农作、牛只、天气。这类聊天对新手而言颇好处：使用词汇不多、句型简单，有时还会出人意料，说出心中默背已久的完整句子。

一旦我完成了大家都满意的“问候”礼节后，便可以准备早饭了。在多瓦悠，吃饭是个大问题。我有一个同事曾在南喀麦隆的丛林地带工作

过，屡屡谈到各式佳肴美食。香蕉长在自家门前，走在路上，酪梨从天而降，肉类供应不虞匮乏。不幸此刻，我比较接近沙漠而非丛林。多瓦悠人酷爱小米。他们不吃其他东西，惟恐生病。他们整日谈的就是小米，以小米抵债，用小米酿啤酒，如果有人奉上稻米或山药，他们也会吃，却满怀遗憾它们远不及小米好吃。搭配小米的是一种野生植物提炼的胶状酸酱。偶尔吃吃小米还不错，但是多瓦悠人一天两顿，早晚都吃小米。炖煮过的小米闻起来像塑胶板。多瓦悠人抱憾居然没人要买小米。多瓦悠人的土地是无主之物。只要愿意，一个人可以任意占地建屋、耕作。但这不代表多瓦悠人勤奋盛产。他们只种植少量作物，伐树焚地、耕耘收成已经够辛苦了，更糟的是，几乎一半的耕种季节都得犁地。为了消解农作的乏味，多瓦悠人不时举办大型啤酒宴会，只要有酒，种田者便乐意留下，酒足饭饱后，再带着主人前往别家的宴会。由此，孤独的农耕不时掺杂社交烂醉。虽然小米在城里价格颇俏，多瓦悠人却毫不心动。富来尼商人控制了市场交易，从中赚取一到二倍差价。富来尼人也同时控制大众运输工具，多瓦悠农人贩售小米能获得的报偿其实有限。因此，多瓦悠人只耕种自己所需的小米，如果近期有祭典，他们会多种一些，以便履行亲属义务所需。他们总无多余之粮，一旦雨季降雨不多，便有饥荒之虞。想在多瓦悠买东西，就好像逆流游泳。法国政府刻意引进赋税制度（并不成功），企图迫使多瓦悠人使用钱币。但直到今日，他们仍喜欢以物易物，不爱用钱币。他们累积债务，直到杀一头牛便可一笔勾销为止。如果他们馈赠我小米，我便必须回赠他们肉或城里买回来的小米。

虽然多瓦悠人养牛，却不挤奶或作为肉牛。那些是迷你牛，背上无峰，和富来尼人养的牛大不相同，几乎不产奶。多瓦悠人宣称他们的牛儿剽悍，我一点都看不出来。理论上，多瓦悠的牛只用作祭典牲礼。一个拥有40头牛的有钱人如果死了，至少得宰杀10头牛分赠亲属。近来，中央政府禁止葬礼屠牛，认为这是浪费，但是风俗仍持续。

除了丧礼外，牛只也用作聘礼。因此，年轻人一旦有了对象，便不愿为了口腹之欲或金钱任意宰杀牛只。每当人们馈赠我牛肉（尤其是酋长），我便由极端匮乏摆荡到极端丰盛。他会坚持送一整只牛腿，根本吃不完就会坏掉，必须将他的好意分赠出去，希冀我转送的肉可换来鸡蛋。倒不是说鸡蛋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多瓦悠人不吃蛋，认为鸡蛋恶心，他们问广你难道不知道鸡蛋从哪里掉出来的？”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孵小鸡的。他们会小心捧来在大太阳底下孵了好几个星期的鸡蛋，作为回赠之礼，满足我的病态嗜好。我像女巫做法一样，将鸡蛋浮在

水中，却不保证能筛选出坏蛋。一旦鸡蛋腐烂超过某种程度，它们就会像新鲜蛋般沉入水中。好多次，我饱啖鸡蛋的希望破灭，一颗颗敲开来，里面全是蓝绿色，飘散可怕臭味。

无法仰赖土地维生，我决定自己养鸡。结局也不成功。人们给了我一些小鸡，我又买了一些。多瓦悠小鸡骨瘦如柴，吃它们，就好像吃模型灯蛾一样。但是细心调理，它们还是会长大。我用稻米与燕麦喂食它们，从不喂鸡的多瓦悠人嗤之为奢华。一天，它们终于下蛋了。我开始梦想每日有蛋可吃，当我坐在茅屋里，心满意足地望着我的辛勤成果，我的助理现身门口，脸上表情得意。他喊道：“主人，我刚发现母鸡下蛋了，我宰了它们，以免它们流失精力！”此后，我努力限定自己早餐只吃燕麦与从教会店铺里买来的罐装牛奶。茶叶是喀麦隆大宗作物，但是你在波利镇根本买不到，倒是有不少尼日利亚走私进口茶叶。

马修通常与我一起吃饭，他说山地多瓦悠人的食物难以下咽。几个月后，我发现他变得异常肥胖，原来他每天都在酋长与我家两处吃饭。

早餐后，我开始诊所时间。多瓦悠疾病不少，我并不喜欢病菌聚集我的茅屋，但是我的医术虽浅陋、疗药也有限，却不忍像我的助理一样把病人赶走。依据非洲地位分级，马修认为我该仔细过滤交往对象，不宜与平凡百姓接触。我可以和酋长、巫师说话，却不应该浪费时间在愚蠢的村夫村妇身上。当他发现我居然和小孩说话，更是吓坏了。他守着院落战略位置，只要有人企图接近，便一跃而出，好像驻守大人物官邸前厅的秘书。每当我向别人敬烟，他都坚持香烟必须经过他转交给对方。我向马修抗议，他终于放弃此种行为，但不时提醒我，我与平凡百姓接触过多，有损他的崇高地位。

前来求医者多半是皮肤割伤或溃烂。我为他们的伤口涂上抗生素，贴上绷带，虽然我知道多瓦悠人喜欢裸露伤口，一旦离开我的茅屋，就会将绷带扯掉。求诊病人中有一二个是疟疾，现在我已颇精于治疗疟疾，投以奎宁，当我向病人解说剂量时，马修在旁协助，确保我没搞错。

消息迅速传开，大家知道我有治疗疟疾的“草根”（多瓦悠人对医药的称谓）。一天，一个愤怒的老女人跑来指控我传染疟疾给她，我吓了一跳。众人热烈激辩，我搞不清楚在吵些什么，老女人被大家嘲弄轰走。后来，我与医师、巫师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才明白那天的争吵内容。多瓦悠人将疾病分为几类。一类是传染性疾病，白人有药可医，包括疟疾与麻风。一类是头部巫术或以植物作法的巫术致病。也有一些病征清

晰可判是被亡灵侵扰。最后一类是污染性疾病，肇因于碰触了禁忌之物或禁忌之人，疗法惟有禁绝与禁忌之物(人)接触。老女人听说我有治疗疟疾的药物，判定疟疾是污染性疾病，藏在我茅屋内的医药也是引起疟疾的原因。在村落里匿藏威力如此强大、危险的东西，当然会被指责。

结束看病后，我开始学习语言。马修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欣欣然逼迫我练习各种动词变化，直到我受不了为止。数个星期后，我换了一种练习法，马修便觉得教书没那么快乐。

我有一个小型录音机，总是随身携带，在田野场上与人交谈，我有时会录下谈话。多瓦悠人很喜欢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但不特别兴奋，他们当中的时髦者以前便看过收录音机。真正令他们啧啧称奇，喃喃称道“神奇”、“魔法”的是写字。除了少数孩童外，多瓦悠人全是文盲。虽然学童会写法语，也曾有语言学者前来研究多瓦悠语，他们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语言可以书写。当我以英、法文混杂拼音记录重要的多瓦悠语时，他们会轮流站在我背后观看，数小时不厌倦。数个星期后，当我照着笔记，把上一次见面的对话念给田野对象听，他会大吃一惊。慢慢的，我累积了一大堆录音谈话、笔记与解说，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我可以随时挑出一段，与助理逐字研究，要求他更正当初的翻译，厘清某些辞汇、信仰，解释同义词。一旦这成为标准程序，我的语言学能力激增。马修也越来越谨慎，放弃原有的无所不知态度，不敢再用差不多的翻译唬弄我，他会记下特别难的地方，回去后，再与我仔细参详。

午餐有时就吃吃硬饼干，搭配巧克力、花生酱或米饭。饭后是一天最热的时候，马修去睡午觉，我则回到硬邦邦的床上，写信、睡觉，或者绝望地盘算自己的财务困境。

几星期后，天气越发炎热，偶尔大雨倾盆如注，我开始午后游泳。多瓦悠地区的水十分危险，蕴含多种地方性特有寄生虫，最恐怖的是住血吸虫。不少多瓦悠人都染有此种疾病，它会造成内出血，导致恶心、虚弱，最后死亡。此地人平均寿命很短，很多人都熬不到寄生虫病的最后阶段便死亡。何时下水才不致染上住血吸虫，人言各殊。部分权威人士说，只要不智地将脚踏进河水，住血吸虫便上身，终身不去。另外一些人则说浸身污水数小时，才可能感染住血吸虫。一位路过此处的法国地质学家告诉我，大雨初过的河水很安全，它会将住血吸虫寄生的水蜗牛全部冲到下游。因此，如果避免干季的死水与流速缓慢的水，应该很安全。每当多瓦悠人在冷泉里快乐戏水，我都只能汗流浹背干瞪眼，很想冒险一试；更何况行走多瓦悠地区，很少能跨越激流而不搞得半身湿

透。我决定采用地质学者的分析,在大雨初过后到男子沐浴处游泳。那是瀑布下方、花岗岩壁的一个深潭,女性禁入,因为它也是男孩割礼处。

我第一次现身沐浴处,只有两三个从田里回来的人在此洗澡。我的生理构造显然引来缤纷揣测。第二天,至少有20到30个男人现身,一窥赤身白人的奇景。之后,我的新奇价值迅速下滑,沐浴人数恢复正常,让我微觉受辱。这个地方棒透了,坐落山脚下,潭水喷溅,冰凉干净。四周有树,潭底布满细沙。溪水弯处还有岩棚,你可以躺在上面,晒晒太阳再跃入冰凉中。

只要没事,我和马修每天都会到此游泳。就是在这个纯男性的天地,多瓦悠人首度向我透露他们的信仰与宗教。多瓦悠男人全都依照传统接受割礼,我没有,话题便自然围绕这个主题,后来我才发现它在多瓦悠文化中的重要性。

洗过澡后,我和马修回到田里绕一圈,寻找啤酒宴会。我们会在某个布篷下发现二十来个男女轮流犁地、喝酒。一位著名的法国殖民官员曾形容小米啤酒浓稠似豌豆汤,怪味似煤油。多瓦悠人中午不吃饭,光喝小米啤酒,酒精浓度很低,却能烂醉不已,让我始终想不透。尽管小米啤酒制造过程恐怖,我却立定决心非喝不可。我第一次参与啤酒宴会,便面临一大考验。他们问我:“你要喝啤酒吗?”我回说:“啤酒皱眉头。”发音错了。我的助理以疲倦的语气解释:“他的意思是——好的,他要喝。”他们大为讶异。

从未有白人愿意碰多瓦悠小米啤酒。为了表示对我这个外国人的尊重,他们抓起一个葫芦瓢,把它递给狗舔干净。多瓦悠的狗本就模样不美,这只更是恶心,羸弱不堪,耳朵上的伤口苍蝇围绕,肚皮上还挂着几只肥胖的虱子。它津津有味舔干葫芦瓢。他们添满啤酒后递给我。每个人都盯着我看,满怀期望微笑,无计可施,我只能一口喝干它,满足吐气。接着,我又喝了好几瓢啤酒。他们大惊我居然不醉。西方人想要喝小米啤酒喝到醉,根本不可能,怎么喝都不够。相较之下,多瓦悠人喝工厂产啤酒,一喝便醉。

一瓶啤酒可以喝上三天,还天天酩酊大醉。酋长朱迪波永远盘旋在这类场合,从未错过一场啤酒宴会,虽然他总是拒绝帮人犁地以为回报。如果你想要找出哪里有啤酒宴会,最好的方法是派马修去找朱迪波,只要找到朱迪波,便找到宴会场所。朱迪波的狗儿知道跟着我,便有好

吃的,所以我们的出巡阵容十分诡异。我说出的第一句完整多瓦悠句子是:“马修跟着朱迪波,我跟着马修,狗儿跟着我。”村人认为这句话大有智慧,不时拿来复诵呢。

巡完田地后,我会站到十字路口迎接打道回府的村民。一棵倒下的树桩被移至此处,权当座椅,男人坐着聊天,拍打蚊子,等着吃晚饭。我的晚饭通常是燕麦、速食马铃薯泥罐头(非常贵,但是新鲜马铃薯几天就烂了),搭配一罐汤,就打发了。饭后,我会写写笔记,记录明日我要问的问题,或者随便读点东西。

我的最大奢侈是一盏在恩冈代雷买来的煤气灯。虽然我得开150哩去换贮气瓶,但是几个月才需换一次,而且我还有备用贮气瓶。煤气灯让我天黑后还能工作,这真是一大恩赐,因为此地终年七点就天色全黑。村人经常拜访我,希望看煤气灯奇迹,我必须费尽力气解释它不是电。

几个星期过去,我开始融入村落生活,多瓦悠人也慢慢回到村里过夜,我比较不觉孤寂了。但是每当被大雨困在茅屋,我便感到无边沮丧。疟疾后,我的身体也未全然恢复,可能和饮食单调有关,我常常省略不吃,或者只把食物当燃料,强迫自己吞下。

好几个月后,我的语言能力才略有进步。在这之前,我几乎要相信自己在返回英国前,一定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不明白。最糟糕的是,多瓦悠人似乎无所事事,没有信仰,没有任何象征性活动。只是存在着。

我对理解周遭人的谈话仍有很大困难,我开始怀疑是助理的问题。他教我的动词形态似乎是错的;我的话,他好像多半不懂;我甚至怀疑他不懂山地多瓦悠语。有时提到某些话题,我看到他与其他男人交换无奈眼神,里面铁定有阴谋。

田野工作者的助理是个困难职位。当族人与他的雇主发生冲突时,族人会认为他应当站在自己人那一边。非洲社会,一个人如果招惹亲属愤怒,日子将非常、非常难过。另一方面,雇主却期望他作为与当地入交涉的代表,随时提供策略与消息。对民族志学者而言,资料真假至关重要,却必须通过一个识字不多、忠诚度摇摆不定的学生作为中介,实在是极端挫折的事;更惨的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各有不同。譬如,多数多瓦悠人从教会经验推之,认为白人都是疯狂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很讶

异我的助理星期天会去做礼拜,而我却不。因此,我必须在他们做完礼拜后,等在路旁和他们聊天,表示我不去教堂,并不是因为自持身分优越。

开始,我最沮丧的是从多瓦悠人身上挤不出十个字。当我要他们形容某个仪式或动物,他们会说个一二句,然后就打住。我必须再提问,才能得到更多的讯息。对此,我非常不满意,因为这变成我在引导他们回答,不是正确的田野方法。约莫两个月的徒劳无功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原因。

非常简单,多瓦悠人的对话规则和西方人完全不同。我们习惯不中断别人说话,但是非洲习惯不一样。两人对话就好像在打电话,必须不时以话音打断、辅以声音回应,以确定对方仍在线上聆听。多瓦悠人听别人说话,会严肃地望着地面,身体不断前后摇晃,每隔五秒钟便低语:“是的”、“的确如此”、“好的”。否则,对方的谈兴便会戛然而止。一旦我开始有样学样,访问便大大不同以往。

马修的最大问题不在忠心与真诚,而在他的年纪。在非洲,年纪与地位成正比。多瓦悠人表示尊崇的方式是尊称对方“老人”,因此地位崇高的多瓦悠长者会称我为“老人”或“祖父”。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老人聚在一起谈话,旁边站着年仅17岁的孩子,实在不像样。对我而言,马修几乎不存在,对那些长者而言,他刺眼如烂手指。

后来,每当我们要谈些重要事情,长者会断然把马修赶出去,事后,我再与马修研究我碰到的语意问题。幸好,马修好像与祈雨酋长那边的人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一开始做田野调查时,他们才容忍他的存在。否则我也会像那些研究多瓦悠的人一样,空手而回,坚信这个民族似死猪头般顽固。

译注

国某些大学规定,学生与学校主管或教授正式在学校餐厅用餐时,必须穿着正式外套。

第七章 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

我每星期的调剂就是周五进城,理由是取每周五从加路亚运抵的邮件。这是个天大的谎言:邮件只是“理论上”周五送抵。波利镇的富来尼酋

长有一台卡车,包办邮件运送,但是什么时候送信、送不送信,全看他高兴与否。如果他决定在加路亚多待几天,邮件便下周五才来。老师与公务员领不到薪水、医院药品短缺、全城的人感到不便,他全不在乎。

此外,喀麦隆邮政迟滞缓慢。头两个月,我收到的全是加路亚银行错得离谱的账户结存通知。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巧妙变化,现在我有三个账户,一个在加路亚,一个在雅温得,还有一个神奇万分,是在我从未去过的城市。

“取信”的重点是我可以稍稍摆脱助理。这辈子,我从未与人日夜相处这么久,开始觉得我像被迫与最不速配的人结了婚。

因此周五下午一到,我便开始快乐地过滤旅程所需饮水。

我坚持步行进城,一来,波利镇不卖汽油,必须节约使用;二来,开车得搭载全村人。雨季水量丰富,饮用水只需过滤即可。干季里水坑变成熏臭的泥潭,饮水必须煮沸或加氯。

我的水壶在多瓦悠人间是个笑话,一公升可以喝上一整天,不过,他们认为这是白人的特有奇行。事实上,多瓦悠人有自己的饮水规范,相较之下,我的不过是逻辑必然。替如,多瓦悠铁匠不得与族人一起汲水,必须等人主动奉水;一般多瓦悠人不能饮用山地多瓦悠人的水,除非主人奉水;祈雨酋长不得饮用雨水。这全是交换体系^①的一部分,规范上述三个团体的女人、食物、饮水的交换。因为我不与其他团体交换女人或食物,可以有自己的饮水规范。除非我将饮水奉到他们手上,多瓦悠人绝不会碰我的水。非经邀请就喝我的水,会招来疾病。

每周五步行九哩路进城是一件快乐的事。平日我都在泥泞田野跋涉,数个月下来,脚踝与脚掌已染上恶毒霉菌,药石罔效。雨季里,长裤只有一个月寿命,之后,便从裤管开始破烂。

短裤是明智选择,却遭马修严峻否定——有地位的人不穿短裤;何况,短裤无法保护双脚不受荆棘、刺草与丛林里四处可见的芦苇刺伤。

进城后,我和所有翘望等信的老面孔一样进驻酒吧,竖耳聆听送信的卡车声,喝啤酒打发时间。有时我会到市场闲逛,市场里只有一群可悲的年迈男女,贩卖一丁点儿胡椒或串珠。我无法相信这勾当可以维生,一定只是打发时间而已。城那头的屠夫每周两天卖肉,多数肉早被城里

大人物预购一空，普通顾客只能买到蹄与内脏，以斧头剁开。屠夫不用磅秤，同样的钱，每次买到的斤两都不同。城里到处是闲逛的公务员、流浪者、宪兵与满街的孩童。

因为周五取信，我认识了几位老师。顶顶有名的是阿方斯，他是体型壮硕的南方人，派驻法洛河(RiverFan>)再过去的丛林小学，极为偏远，简直算得上是尼日利亚领土了。

那里流通的是尼日利亚而非喀麦隆钱币与货品，走私甚为狠厥。阿方斯独自住在提查巴人(Tchamba)聚落里。曾有朋友前往一游，回来报告说阿方斯身无长物，仅有两条短裤与两只颜色各一的拖鞋。那里没有啤酒。干季一到，通往提查巴的路头地平线便会卷起一股烟尘。慢慢的，一个黑点浮现，那是阿方斯跋涉、蹒跚、爬着朝波利镇前进，嘴里喊着：“啤酒！啤酒！”坐定酒吧后，阿方斯开始挥霍积存的薪水。许多人认为阿方斯一定有慈悲女神守护，因为他莅临镇上时，从未碰过啤酒缺货的漫长诅咒期。通常喝到下午四点，阿方斯便进入想要跳舞的阶段。

阿方斯体型壮硕，没人招惹时脾气温和，生起气来却显得庞然骇人。他想跳舞时，酒保(通常是当地的逃课学生)便跑去拿收音机。乐声响起，阿方斯抬起庞然身躯，好像什么伟大的自然奇观，浑然忘我移动双腿，低声咆哮，杯中酒一饮而尽，臀部左右摇晃，鼠蹊来回摆动，头儿低垂。如此这般数小时，阿方斯进入另一个阶段，此时每个人都得起来跳舞，否则就是侮辱他。众人关注的焦点是邮件到底会不会在“社交群舞”前抵达？阿方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的君王威风下，紧张兮兮的巡回查税员与宪兵都得翩翩起舞，他则在角落满足地轻叹与微笑。

他的主要盟友奥古斯丁也是南方人，喧闹本事不相上下。奥古斯丁放弃首都的特许会计师工作，跑来当法文老师。在这个嘉许俯首帖耳的国度里，他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胆敢拒绝购买党证。据说他和副县长有恩怨(两人均因溺爱妻子而恶名远播)，不少本地公务员大胆预测：奥古斯丁的下场如不是因“政治因素”离奇失踪，就是与镇上富来尼族女人恶搞而丧命。喝酒之后，奥古斯丁会骑重型机车满城飞驰，吓坏老老少少。他不时从摩托车上摔下，幸好都只是皮肉伤。他总给人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所到之处，净惹麻烦。有一次他到村里拜访我，居然与有夫之妇公然通奸。多瓦悠文化纵容女人通奸，男人也以勾引他人老婆为乐。但是奥古斯丁和这名妇人在她老公的茅屋里做爱，这可是公然侮辱。对方老公发现此事，依据连坐法逻

辑，认定我必须赔偿他。经我与酋长及其他“法律顾问”商量后，礼貌拒绝了他。他与兄弟现身我的茅屋前，威胁下次看到奥古斯丁来找我，一定不放过他，要用棍子敲毁他的摩托车。我的精明判断是警告奥古斯丁暂时远离孔里。但他本性难移，第二天便出现，还把摩托车停在戴绿帽的老公屋前。我极端担心发生暴力场面，也害怕我与多瓦悠人的关系毁了。

那位老公果然与兄弟现身。奥古斯丁拿出城里买来的啤酒。我们静默喝酒。不一会儿，凭着难以置信的闻香酒鼻，朱迪波立即现身。我的助理马修在茅屋后焦急打转。

我敬上烟草。那位丈夫仿若酒醉的格拉斯哥人，始终陷于压抑静默的沉思。突然间，他开始唱起平板、细气的歌曲，其他人马上兴高采烈加入和唱。随后他便起身离去。

人类学者的角色就像辛勤的工蜂，我四处打探原委，以理解这个笑话。那是嘲弄女人的歌，唱道：“噢，谁能和苦涩的阴道做爱？”显然，啤酒平息了做丈夫的怒气，他决定男人的团结情谊比区区的老婆忠贞重要。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朱迪波还跟奥古斯丁变成好朋友，共享无数酒宴。

通常，奥古斯丁与阿方斯会一起在酒吧，以待产父亲的无助焦急等待薪资邮件。薪水到手后，又剧烈争论所得税扣除有误。波利镇的老师薪资和我差不多，还有免费国内机票，可以在黑市脱手。分发邮件的过程令人怀念与官僚的推挤奋战。你必须大排长龙，等着发信人反复检查你的身份证、在整齐画线的学童习字簿上详细登记各种琐碎细节、盖了橡皮章后，才能拿到信。技艺精湛者，一封信可以搞掉10分钟。

接着便是发信后场景。没信的人退回酒吧哀伤。有信的人通常也回到酒吧庆祝。因为此地七点便天黑，我总是摸黑跋涉回村。人在英格兰会忘掉黑夜有多黑，因为我们多半离光害不远。多瓦悠的夜是一片漆黑，人人必备火炬。入夜后，多瓦悠人拒绝跨出村落围篱，他们害怕黑暗，总是哆嗦着围绕营火，直到曙光降临。暗处里有野兽、妖巫，还有巨大的“甜椒头”怪物会乱棒敲昏旅人。

他们讶异我敢在黑夜丛林里乱走，认为是“匹夫之勇”，独行更是疯子行径。其实，暗夜独行荒凉丛林，再安全不过。空气清爽似英格兰夏夜，虽然闪电沉默划亮远处山头，但是雨丝洗去丛林闷热。星群明亮辉

煌。稍后明月升空，丛林白亮如昼。此地并无大型掠食动物，惟一的危险是踩到蛇。比起村里的嘈杂混乱，暗夜丛林宁静安详，我可以逃离人们的注视、指点、叫嚣与诘疑，重拾我在非洲生活的第一个折损品——“私生活”。丛林夜行后，我总是倍觉精神抖擞。

偶尔，我会碰到成群飞奔逃离黑暗恐怖的旅者，有的是不小心在山地村落耽搁了，有的是参加完庆典返家。一看到我，他们总是转身飞奔。第二天趣味横生，他们会向村人说在丛林里碰到“甜椒头”怪物，幸好逃过魔爪。他们小心避免结论：自从我莅临孔里后，“甜椒头”现身次数遽然增多，我一定脱不了关系。他们认为怪物恐惧可吓阻妇人“四处游荡”。“四处游荡”暗指女人通奸偷情。有时，男人会在十字路口布下可变出“甜椒头”怪物的草药巫法，吓阻女性外出游荡。

后来，当我慢慢厘清祈雨酋长、一般多瓦悠人、铁匠的关系后，我也勾勒出多瓦悠文化的男女关系。具体细节是我与助理在游泳处与男人亲密相处时所得，余者仰赖奥古斯丁在异教徒女性圈中的“田野调查”补充。我曾拜托他留意某几个主题，他都能提供丰富的性风俗资讯。他也证明了许多瓦悠人在性行为方面，的确是放荡与谨慎的奇特组合。

多瓦悠人性启蒙甚早。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年岁，很难判断初次性行为的年纪，但多数八岁便开始性探索。男孩看上一个女孩，可以自由到她的茅屋过夜，鸟然做母亲的会留意孩子的行为，不容许放荡乱交。到了青春期，性关系却不再甜美。婚前怀孕不算污名，反而颇受欢迎，它证明女孩的生育能力。麻烦的是月经，多瓦悠人认为男孩碰触到经血，有可能变得低能蠢笨。割礼让青春期更加复杂。男孩从10岁到20岁间都有可能接受割礼，全村男孩一起举行。因此有的男人可能结婚生子，却尚未接受割礼。父子一起接受割礼虽然罕见，却也并非新闻。没接受割礼者被视为拥有女性污点，包皮过长，散发女性阴部臭气。他们被禁止参加所有男性活动，死后也只能与女性埋在一起。更糟的是他们不能举刀发誓。多瓦悠地区最严重的咒语是“当米加瑞”，意思是“看刀”。此刀指的是男孩割礼之刀，威力强大，可以砍伤妖巫、杀死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对女人施此咒语，代表他震怒，女的恐难逃老拳。尚未行割礼的男人口出此咒，会遭众人恶意嘲笑，坚持不改则会挨揍。每当我脱口说出“当米加瑞”，都被当作闹剧。

多瓦悠的割礼十分恐怖，整个阴莲都要划开来。现在多数男孩在医院割包皮，老派多瓦悠人认为可耻，因为割得不够多。此外，他们也未与女性隔离九个月。割礼仪式通过死亡与更生(rebirth)，让男孩从呱呱

坠地的不圆满形态，蜕变成一个完整的男人。我以六瓶啤酒的代价，换得割礼人宣称我“受过可敬的割礼”。赦免代价十分便宜。

理论上，女人不能知道割礼内容，她们听说割礼是用小块牛皮缝合肛门。这一切隐瞒只是表面工夫。干季里，热气使植物叶片皱枯，缺少蔽身之物。多瓦悠到处可见性器昂扬的男性，忙着遮掩自己，直到潭边无人，才躲到岩石后一跃而入解放自己。事实上，女人知道割礼，但不能公开承认。我在多瓦悠社会地位特殊，女人视我为无性别者，愿意向我吐实。许久之后，才有人告诉我此种知识隔离，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女人知道割礼，只是不能在男人面前讨论。多瓦悠社会有许多“男性秘密”话题——割礼、歌曲、器物等一绝不能在女人面前提及。其实，女人对这些“男性秘密”所知颇多，只是无法尽窥全貌。譬如她们知道割礼和阴茎有关，却不知道割礼仪式几乎和富人死后数年遗孀所举行的仪式一样，因此也不知道整个头颅祭仪式完全翻录自男孩割礼。后来，我才发现整套文化模式仅宥男人得悉。

曾有人指出，女性观点在人类学者的记述中总是神秘缺席。大家认为她们不好应付，也是极端匮乏的知识提供者。

我却发现她们帮助极大，不过接触起始是一场大灾难。

问题仍出在我的语言能力。我去找一位老女人，聊聊过去几年里多瓦悠人行为的改变。明智之举是先征得她丈夫的同意。他问：“你想和她谈什么？”我说：“我想谈婚姻，也谈谈风俗习惯、通奸与……”话声未落，助理和他浮现不可胥信的惊恐表情。我迅速在脑海中检视刚刚的话语，音调并没荷错误呀。我把马修拉到一边密商。发现问题出在多瓦悠语的表达方式。在多瓦悠语里，一个人不“做”什么，ifiiiT说”什么。譬如，一个人“不做”通奸之事，他“说”通奸。换言之，刚刚那句话被解读成我要和他的太太搞仪式、通奸。

误会厘清后，我发现这位女性资料提供者非常有用。男人自认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才肯与我分享。女人却认为自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她们有时顺口提到某个信仰或仪式，全是男人吝惜提及的话题，为我开启全新的探索领域。基本上，多瓦悠社会男女分开生活。一个男人可能妻妾成群，却终日与男同伴相处，女人则与其他妻妾、女性邻居共处过日。这种模式非常类似英格兰北部。多瓦悠女人负责炊爨，丈夫却不与她同桌，而是与年长儿子共食。男女各自耕种，她种自己吃的，他则耕耘他的所需，只有在某些吃

重阶段才帮老婆一下e夫妻只为行房目的相聚，依据妻妾事先安排的轮值表，当班太太到先生的茅屋办事。他们之间缺少西方夫妻的熟稔与热情。多瓦悠人曾向我诧异转述看到的奇事——美国传教士远行回来，老婆居然从屋内跑出来迎接。他们呵呵嘲笑说，要搭这位传教士的便车还得征求他老婆的同意，而且他不打老婆呢。

我们不能据此断论多瓦悠老婆可怜，饱受丈夫斥骂，像朵枯萎的紫罗兰。她们懂得捍卫自己，还以颜色。大不了，她们可以回娘家的村子。做丈夫的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回聘金牛只非常困难，会人财两失。丈夫担心老婆跑回娘家，常尽量拖延支付聘金。因为抛夫之事并不少见，牛只让渡便成为伟大的拖延艺术，拖延效率之高，一如喀麦隆的银行。婚姻破裂的频繁加上许多丈夫无法清偿聘金，常使民族志调查者抓狂，因为同一个女人会被错误重复计数两三次。譬如一个女人抛弃前夫再嫁，两个男人都会大刺刺向人类学者宣称她是他的老婆。第一个丈夫夸谈他付了多少头牛，却略而不提这笔聘金从未送抵岳家。第二个丈夫也大谈他付了多少头牛，却忘了说这笔聘金是付给了第一任丈夫，而不是给岳家。而那个前夫可能拿这批牛去偿付他拖欠其他妻妾的聘金。这时，气冲冲的女方家长可能跑到第二任丈夫家中，要他偿付前女婿积欠的聘金，否则要把女儿带回家。第二任丈夫则敏捷回击说三代前，他有一个女亲戚嫁到他们家，聘金到现在还欠着呢。一场毫无希望、循环盘旋的法律争执于是开始。

多瓦悠人从不说自己娶妻娶貌，而是娶德，看重她的顺从好脾气c女人绝不能看到割礼过的阴茎，会生病。男人也绝不能看到女性阴部，会从此不举。因此性交成为黑暗中的鬼祟行为，两方都不脱光衣服。女人不拿下阴户前后遮盖的叶片。早年，男性性交时则解开缠腰部，拿下行过割礼者必戴的葫芦制阴茎鞘。现在男人流行穿短裤，只有老一辈的参与仪式还戴阴茎鞘。女人在笑闹时，会鼓起双颊发出阴茎出鞘的噗噗声；这种声音也是性行为的腼腆婉转说法。多瓦悠女人即使结了婚，仍向丈夫索取夜度资，这让不少传教士无情批评多瓦悠婚姻形同卖淫，但他们却认为夫妻账务分明很重要。诸如此类的资讯都是点滴累积而得。我所研究的庆典仪式，则和日常生活有很大不同。

真是运气好。我来多瓦悠的前一年正好是小米丰收年（多瓦悠人以11月初小米收成到第二年11月为一年），不少人趁此丰收，为祖灵筹办头颅祭。

多瓦悠人死了后，尸体以尸布、牛皮包裹。尸布是此地棉花所织，

牛皮则是死亡仪式特别宰杀的牛。尸体以屈膝抱缩的坐姿下葬。裹尸时特意露出脖子脆弱处，两周后，死者的头颅便自此处砍下。详细检查头颅未被施咒后，便放置在树内的瓦罐里。接下来，男性头颅与女性(或未受割礼的男性)头颅际遇不同。男性头颅放在茅屋后面的丛林，那是头颅最终安息处。女性头颅则被送回她出生村落的一栋茅屋后面。换言之，女人结婚，由自己的村子搬到配偶的村子，死后则落叶归根。

几年后，亡灵可能会骚扰亲人，出现在他们的梦中，让他们生病，或者拒绝进入女人子宫轮回转世，诞生新儿。这是该准备头颅祭的征兆。通常，一个富人会出现寻求亲人支持，奉上啤酒。如果两场啤酒宴下来，无人有异议，便可以举行头颅祭。多瓦悠人喝酒后脾气不佳，醺醉而无争吵，殊属罕见，需要在场所有人极力自制。连续两场酒宴都无争执，显示大家对举行头颅祭有极大共识。

朱迪波告诉我15英里外的村子即将举行头颅祭，我决定先做些调查，确定其真实性。

你如想规划十分钟后的事，碰到多瓦悠人的时间观，真会气绝。我们以月、周、日度量时间，老一辈的多瓦悠人对何谓“一星期”却只有模糊概念；它和月份名称一样，全是文化移植物。多瓦悠老人以现在为基准来推算日子，如要描述过去与未来，便要用到复杂句子如：“昨日的前一天的再前一天。”使用这种系统，你几乎无法确定事件确切发生日。此外，多瓦悠人绝对独立，痛恨有人企图组织他们。

他们怎么方便便怎么行事。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我讨厌浪费时间，憎恨时间的损失，投注时间就想有收获。每当我逮住人请教某事的确切时间，答案总是“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机”，我听到此话的次数铁定创下世界纪录。和人约定时间、地点碰面，绝对行不通。他们会在隔一天甚至一星期后才露面，还很惊异我生气了；或者让我跋涉10英里，他却不在家。在多瓦悠，时间不是一件可安排的事，某些物品如烟草亦然，你无法画出己有与他有的界线。刚来时，我很困扰马修总是自行享用我的烟草，没有一丝不告而取的歉意，可是打死他，他也不敢私自饮用我的水。多瓦悠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烟草与时间都属于弹性颇大的领域。烟草不可据为己有，朋友有权翻捡你的口袋拿取烟草。每当我酬赏资料提供者一袋烟草，他会公然蔑视礼节规则，急忙忙奔回家藏起来，深恐路上碰到拦截者。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扇椰子谷(Valley of Borass Palms)，顾名思义，此地

以盛产扇椰子闻名。老地图上有公路穿越山谷，现在已经失修不堪行。但是小心驾驶，还是可以深入云雾笼罩的山谷数英里，远处是尼日利亚边界的山峰美景。此地村落比起孔里更像传统山地多瓦悠聚落。村民的话十分难懂，音调不同，高低起伏甚是夸张。朱迪波在前开路，我与马修紧随其后，数个小时后，终于抵达此地酋长的院落。基于防御理由，此地茅屋紧密贴邻，你必须俯身膝行穿越。人n茅屋则低矮无比，我们全得趴下来爬行。孔里人身高约莫五英尺六，此地人则轩昂六英尺，一定觉得茅屋矮得难受。

酋长摆出庞然阵仗迎接我们。令我大吃一惊，他长得像海盗，独眼，脸上爬满修饰性留疤@。他拿出啤酒待客，朱迪波猛烈进攻。我开始担心会整天耗在这里，酋长证实要举行头颅祭，确切日期则很模糊。搞了半天的“今天过后的一天又一天.....”后，我才赫然发现酋长根本醉了。朱迪波也快速跟进。他说多瓦悠语，酋长说富来尼语。他的一个儿子参与讨论，说的是法语。好一会儿后，我发现酋长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误以为我是住在此村好几年、最近才离开的荷兰语言学者。那个学者足足比我大30岁呢。反正，西方人看起来都一样。酋长表示他很乐意让我参加头颅祭，届时会派人通知我。根据经验，我知道他不会，但还是衷心感谢他。我将水壶装满啤酒，确保回程有足够的酒，才诱使朱迪波起身告别。

此刻正是酷暑午后，我的脸不断脱皮。多瓦悠人密切注意这种变化，无疑希望看到我显露“真实本色”。即使年迈的多瓦悠人走起山路来，速度都是欧洲人的两倍，像山羊般在岩石间跳跃。我开始后悔水壶装了酒。随行人员对我极端忍耐，讶异白人能走长路。对白人的纤弱无助和容易生病不适，多瓦悠人有夸张解释——都是因为白人皮肤柔软。的确，非洲人的脚底板与手肘长满一英寸厚的茧，赤足行走尖石路面甚至玻璃都不会受伤。我们终于抵达车子，开往回程方向，顺便搭载一个女人。还开不到一英里，她便吐得我一身，典型多瓦悠人作风。我在多瓦悠时，不少人与狗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对我大吐特吐。雨季里，这没大问题，只要在河边停车，连人带衣服跳进河里洗净即可。

回到村里，我很讶异马修发挥了乡土智慧。目睹酋长院落的酒醉场面，马修溜去找熟识的年轻女子，她负责头颅祭的啤酒酿制。根据啤酒发酵程度，马修判断再两天啤酒就可做好，四天后就会酸掉，因此头颅祭一定在那中间举行。

他的主动进取正好碰上发薪日，我给了他一小笔奖金，出他意料，

我也对自己微觉吃惊。这个插曲成为我们关系的转折点，马修开始热衷探听各式讯息与庆典。但是他转身离去时说，此行根本多此一举，只要看到路过孔里的人大增，就知道要举行祭典了。也没有必要征询酋长允许，庆典是公开活动，外人越多越成功。

头颅祭那天，曙光明亮清朗。和往常一样，我被村人和马修的对话吵醒“他还在睡呀？”“他还不起床？”六点二十五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田野场试验我的器材——相机与录音机。我教马修如何操作机器，他负责录音，我则负责拍照与做笔记。这让马修喜出望外，趾高气扬排闷众人，以示自己肩负重任。大雨冲断了一座桥，我们必须步行绕路五英里。最麻烦的莫过于穿越急流，不时从湿溜溜的岩石失足滑下，还要保护高举过头的器材。马修是平地多瓦悠人，表现和我一样差，我们的随从则是年约五十岁的山地多瓦悠人，赤足紧紧抓附岩石，细心护卫我们过河。

大群人猬集丛林小径，全是要参加庆典的。女人脱下遮身树叶，换上布条，这绝对是参加公众盛会的打扮。根据法律，多瓦悠人必须穿衣，并且禁止拍摄裸露乳房的女人。如果严格遵守，什么也拍不成，所以我和其他人一样无视规定存在，一边忐忑担心被宪兵逮到可麻烦。抵达村子时，我们讶然发现挤了一堆陌生人。大群小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在泥里打滚笑闹，枯干萎瘦的老人和我们热情握手，殷勤的年轻人盛情奉上收音机，以免我错过日夜盈耳的尼日利亚流行歌曲。我耐心解释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多瓦悠音乐。老人听了很高兴，年轻人颇感困惑。

牛圈广场上已经挤满人。朱迪波早就坐在草席上，气派的太阳眼镜与配剑一应俱全。他一边喝啤酒，边解释场子状况。

多瓦悠人的“解释”问题多多。首先，他们会漏掉最重要的事项，以致模糊不可解。譬如，没人告诉我这是掌地师(Master of Earth)所在的村子，司管万物的生长，因此此间的仪式规矩和其他地方不同。不过这种疏漏可以理解，太明白的事不用提。如果我要向多瓦悠人解释如何开车，我会告诉他换档、道路标志等细节，却忘了说不要撞上其他车子。

此外，多瓦悠人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我问：“你为啥这么做？”

“因为它是好的。”“为什么它是好的？”“因为祖先要我们这么做。”我狡猾问道：“祖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

我永远打不败这些祖先,他们是一切解释的起始与结束。

多瓦悠人喜欢用惯例说法,令我困惑不已。我问:“谁是庆典的主办人?”

“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他今天没戴。”

多瓦悠人总是描述事情“应有的状态”,而不是“现有的状态”。

多瓦悠人还嗜好开玩笑。照例,我会记下庆典参与者身上的特殊叶饰,不同打扮可能有不同意义,但我总被“戏谑者”(如!。!),搞得迷迷糊糊。戏谑者是同一批参与割礼的男人,或者同一时间初经来潮的女人。他们会穿戴奇怪的叶子,打乱常规。你必须一开始就认出他们,以免误将他们颠覆仪式的怪诞行为视为仪式正常部分。

同时,你必须明白一个人可能同时扮演数种角色。头颅祭里惟有小丑能碰触头颅,小丑中有一个人是死者的兄弟,此场仪式就是为这个死者举办的。他会穿梭在小丑与主办人两种角色间,外人难以辨别哪一个角色开始,哪一个角色结束。

由于头颅祭巫师病弱,这位死者的弟弟还必须扛起许多巫师的工作。他一个人便在文化系统里分占三个不同位置。

以我当时的分析能力自然不可能理解这些。我只是坐在一块湿石头上呆看,问些白痴问题,拍一些看起来有趣的仪式镜头。

除了小丑外,头一天还有不少精彩镜头o小丑十分喧闹嚣张,脸上涂成半白、半黑,身穿破烂衣裳,混杂富来尼语和多瓦悠语,尖亢呐喊猥亵话语与胡说八道。他们尖叫:“臭屁啤酒!”围观群众爆出欢呼。小丑还会裸露下身,用我摸不着头脑的机关,放出震天响屁,并试图互相交媾。小丑以骚闹我为乐,拿着破碗当相机对着我拍照,在香蕉叶上记笔记。我还以颜色,当他们向我讨钱时,我严肃掏出啤酒盖给他们。

村外放着死者头颅,男女各一堆。宰了不少头山羊、牛、绵羊,排泄物全洒在头颅上。主办人砍下鸡头,把血喷向头颅。小丑争夺牲礼尸体,扭打成一团,奋力踏踩泥巴、血水与排泄物。暑气逼人,人群拥挤。小丑将血与秽物喷洒到观众身上取乐。臭气熏天,有几个人忍不住

呕吐，更添浊气。我退出人群。一阵骤雨倾盆而下，我和朱迪波瑟缩躲在树下，拿着棕榈叶遮顶。

群众窃窃私语，一名老者是众人关注焦点。他个头矮小结实，嘴巴凝固着僵硬笑容，后来我才知道他接收了别人的假牙。看他拿下假牙是多瓦悠的一大奇景。他笔直地坐在一把红洋伞下，带着仁慈、无所不知的表情左右环顾。没人肯告诉我他是谁。朱迪波只说：“他是慈祥闻名的老人。”马修说：“我不知道。”一脸鬼祟。有人拿了一大罐啤酒给老者，他喝了一口后，消失于丛林里。气氛紧张。

鸦雀无声。

十分钟后老者再度现身。大雨逐渐止息。人人露出如释重？

负的表情。我不知道发生何事，但知道不宜逼问答案。或者，朱迪波与我私下相处时，会比较愿意松口。

现在进入了多瓦悠活动无可避免的无聊部分。我遁入ra野工作的“换档心情”，一种生命近乎停摆的状态，一耗数小时，不会失去耐性，也不觉挫折，更不期待精彩事发生。

过了许久，终于确定今天不再有节目。有几个亲属搞错日子，没有出席，明天或许会现身。接下来，大家忙着安排住宿。马修跑去安排我的落脚处。朱迪波说只要有酒，他愿意睡在树下。

我们穿过树林捷径，行经两条河与刺人的芦苇，进入一栋茅屋。一个逢迎巴结的老人将儿子赶出去，好让自己有屋可睡。在我的追问下，他热心解释他的儿子可到某位多瓦悠女孩家享艳福，所以不算太坏。

这是我看过最脏的茅屋。角落的箱子放着腐烂的鸡尸，显然老者今日曾向祖先头颅奉祭鲜血。屋梁挂着古老器物，是仪式后面阶段要用的——活人献祭时吹的笛子，还有男子与头颅共舞时，用来装饰头颅的马尾与裹尸布。地上全是秽物。我一屁股躺到床上，才发现上面有半腐烂的肉块与骨头，那是牲礼牛只的遗骸。

我蜷缩在湿答答的衣服下，远处村里传来鼓声与歌声，节奏高低有律，引我入眠。突然间，我被门上的抓爬声惊醒，顿时恐慌想起“枯伊女士”，却是马修为我端来一葫芦的热水：“主人，我煮沸五分钟，可以安心

喝了。”我偷偷藏了一些速冲咖啡与牛奶，还准备了大量的糖，供多瓦悠人索取之需。我与马修对分咖啡，他一口气加了六匙糖。我想起自己的责任，开始询问屋梁上的器物，得到大大启发。

马修说：“今天那个老者是卡潘老人(OldManofKpan)，祈雨巫师的首领。朱迪波明日会介绍你们认识。”马修离去，我听到一个多瓦悠人大声问道：“你的主人这么早就睡了？”

一早，我便见到奥古斯丁，逃脱波利镇的苦闷，到此透气。和所有都市非洲人一样，他绝不辛苦走路，居然一路骑摩托车到此。昨夜他很晚才到，与卡潘老人的某位任性老婆共度春宵。她出生此村，返家参加庆典。虽然，她的兄长带领奥古斯丁到她的住处，却斩钉截铁、严词威胁说，祈雨酋长如发现此事，他们一定会遭雷殛。昨日，我的脑海才开始建立祈雨酋长的档案，现在资料已在迅速累积中。

祭典随即将祈雨酋长逐出我的脑海。多瓦悠头颅祭有点像俄罗斯大马戏团，四个圈子同时进行不同表演。小丑泼完最后一次秽物后，开始清洗头颅。同时，本村出生的女人在丈夫陪伴下返乡，打扮成富来尼战士。她们在山头跳舞，在“说话笛”(talkingflute)的伴奏下挥舞长矛。说话笛可以模仿语言的音调，这又是一个我搞不透彻的多瓦悠语特色。

笛声鼓励返乡女子夸示丈夫的财富，丈夫则威逼老婆卖力表现，叫她们刻意打扮，除了长袍外，还炫示太阳眼镜、借来的手表、收音机与其他消费产品，有的丈夫还在老婆头上别上钞票。

村子的另一边是头颅祭主角们的遗孀，身着树叶长裙，头戴同一植物做成的圆锥形帽子，一字排开跳舞，好像歌舞女郎。此时，我只能尽力记述各式资讯，得空再做智慧分析。

马修忙着录音，从这儿倏地飞到那儿，以一种打死我也做不到的粗鲁姿态排开人群，挤到最前面。

远处，另一群人扛着一捆奇怪的东西，挥舞刀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行过割礼的男人抬着头颅祭主角的弓，一边唱着割礼歌曲。突然间，一群男孩冲出来对他们尖叫。我以为是突发冲突，但从观众脸上的欢愉之色来看，它显然是祭典标准项目。身旁一位男人自告奋勇解说：“他们是未受割礼的男孩，总是这样……。”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他吃惊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大白痴。“祖先叫我们这么做的。”转身离。。o

堆放头颅处有情况，我箭步飞过去，马修则盯着两组人马的战斗。多瓦悠人只要集体合作，必定争吵不休，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一边争论，一边用布包起男人的头颅。我看得出来那是割礼者穿的衣服。女性头颅则被屈辱地弃置一旁，没人理会。女人和小孩全被赶走。他们推挤男性头颅，吹起我在屋梁上看到的那种笛子。朱迪波解释说：“他们在威胁亡灵要割他们的包皮。”简直是个谜团。一个男人将头颅高举过头，嗡然鸣响的锣搭配着鼓与低音笛，吹奏毛骨悚然的曲调。他们甩开刚刚那捆神秘的东西，抖出长长的裹尸布，男人撑起裹尸布，左右摇摆，好像一只大蜘蛛。其余人则将血淋淋的牲礼牛皮披在身上，顶起牛首，嘴里咬着一片生肉，以奇怪的跺地节奏围着头颅跳舞，不时弯腰、歪斜。场子里满溢臭气、噪声与动作。村子入口处，头颅祭主角的遗孀们一边跳舞，一边向头颅招手。头颅阵先是围着中央大树转绕，而后移往村落人口，和牲礼牛只头颅放在一起。头颅祭的主办人在头颅旁不断跳跃，呐喊：“感谢我，你们这些男人才受过割礼。如果不是为了白人，我将献祭一个男人。”

当时，我自然以为他口中的白人指的是我，猜想他们因为我压抑了许多渎神行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失望，差点高喊“别管我。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经询问，我才知道早年此类仪式的确要活人献祭，他的头颅还要用石头敲成碎片。后来中央政府(法国、德国与喀麦隆)制止了此种风俗。

接下来的进展沦为喝酒与一般歌舞，我们决定回孔里。回程路上，朱迪波绕道带我进入山坡上的一个孤立院落，卡潘老人住在那里。表演了冗长的问候仪式后，我掳获了卡潘老人的心，他陷入叹息、呻吟、咯咯欢笑的狂喜状态，好像老姑婆看到最喜欢的侄子。温啤酒送上，我们坐在昏暗中聊天。卡潘老人说着说着，不时爆出喜悦赞叹，很高兴我来拜访他。他知道我对多瓦悠的习俗感兴趣。他住在这里很久了，看过许多事情，他会帮助我。我应当尽速再来拜访他。他会派人通知我。这个季节他最忙了——他露出你知道的表情，我也装出我知道的样子。我是第二个拜访他村子的白人。我问广前一个白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企图确定那个白人莅临的时代。卡潘老人说：“不是，就是像你这样的白人。”我奉上带来的可乐果，起身离去。跋涉花岗岩大石头与积水小径，回到主要山径，山谷底已经雾气迷蒙，今夜将非常冷。当我们抵达车子时，浑身发抖，渴望速速返回温暖的孔里。西非洲的气候非常区域化，一地下着小雨，几英里外可能变成滂沱大雨。孔里的夜间气温一向比多瓦悠这一头高十度；山的另一头气温更高。

一看到车子，我们便发现问题，角度歪斜得奇怪。我在多瓦悠期间，只有生病时在教会遭窃一次，只要远离文明地区，我习惯东西不上锁。或许有人爬上我的车子，放开刹车，移动了车子？

稍加检查便发现问题。原来我将车子停在峡谷边，前方的路通向被冲毁的桥。前日的大雨掏空峡谷边泥土，让车身倾斜，一边的轮子悬挂在六十英尺高的悬崖上，危然平衡，轻轻一碰便可能掉下峡谷。这种状况只有壮汉蛮力才能拨正，但众人仍在参加庆典。没法可想，夹着笔记本、相机与录音机，我们垂头丧气跋涉回头。好日子的烂结局。朱迪波还要雪上加霜，叨念着：“人生来就要受苦。”显然是从当地穆斯林学来的宗教安慰。这类陈腔滥调，朱迪波取之不竭，我们在冰冷的河水中颠簸而行，他说：“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我们连滚带爬回到村子，他还加上一句：“世事难料。”

我们开始寻找该村的酋长。如果说在多瓦悠，有什么比约定时间地点会面更徒劳无功，那就是寻找一个人或地方。不同的人带着相同的自信回答：酋长在他的茅屋里、去了波利镇、生病了、喝醉了——除了驾崩或身在法国，样样都有可能。自始至终，我都无法确定这是认识(有别于知识、事实与证据)上的差异，还是他们单纯在说谎。他们只是说些我想听的答案，还是他们坚信错误总比怀疑好？或者这是此地文化，尽量混淆外来者？我倾向最后一个判断。

终于找到酋长，对我们的不幸际遇，他大表叹息。他说黑夜无法办事，大家畏惧黑暗，明天他会打点这件事。我说：“人生来就要受苦。”朱迪波咯咯发笑。

马修和我被安排住到香蕉园正中央的一间茅屋，我们在寒夜中以香蕉果腹。茅屋里仍有余火，一只狗昏睡不理人。我发现这是某人的炊爨屋，为何孤立果园，不得而知。此外，多瓦悠人绝不允许狗儿进入茅屋睡在炉火旁。马修迅即展现多瓦悠人作风，开始找木头准备给狗儿迎头痛击。当他找到木头，我说服他还是先用木头补充炉火。当晚，我们便连着一身湿衣服睡在肮脏的硬土地上。我的位置较好，狗儿就窝在我的脚旁。但这可不是我在多瓦悠最值得记忆的快乐夜晚。寒气逼人，马修鼾声如雷，狗儿咳个不停。我估算着我还没付钱的车子有多大机率会掉下悬崖，自我安慰幸好白天里收集了不少好材料，虽然我压根儿搞不清楚它们。

天快亮时我才入眠，枕着相机，手压着笔记本，好像中世纪学徒抱

着工具睡觉。

天刚破晓，马修便起床。喉咙全是痰的狗继续睡觉。我们瑟缩发抖了一会儿，便与四名高大壮汉出发。宝狮404的车子非常重，难以想象四个人便能搞定它，在我估计中，十二个人还差不多。根据我当年大学的放荡经验，四名壮汉大约只能抬动迷你车。朱迪波沿途娱乐我们，细述昨晚和痢疾患者同房共寝的经历。多瓦悠语有各式用来描绘动作与气味的奇特声音，朱迪波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当我们抵达车子时，大家情绪都很高亢。不待指挥，四名壮汉便爬下峡谷，赤足攀住岩棚，以侮辱人的轻松姿态便将车子举起，推回硬地，毫不费事，显然两个人就可搞定。朱迪波兴奋万分，鼓掌、拍腿，发出连串的舌头颤音、哑声与鼻音，以示庆祝。我则尴尬极了，我应当给这四名帮手一点零钱，表达我的感激。不幸，我身上一毛钱也没有，只好奉上不成敬意的香烟。他们显然有点丧气，却未抱怨。此后，只要我出发做田野，一定随身带饮用水、一罐肉、一些零钱与一周的抗疟疾药。我已经两天没吃药，忧惧万分，觉得快要发烧，急着铆劲奔回我的医药箱。

经过一天休息，我们恢复士气，惟一的永久损伤是我的脚。两脚的大拇指指甲附近起了奇怪的红点，奇痒无比。

那是跳蚤。这种讨厌的寄生虫会在人的肌肤上掘洞产卵，让你整只脚都烂了。非洲田野老手告诉我碰到这种状况，要请当地人帮忙，他们会以安全别针挑出跳蚤，不致刺破卵囊。不幸，多瓦悠人没有安全别针，也不善对付跳蚤。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以小刀挑出跳蚤。担心留下虫卵，挖下好大一块肉。这场恐怖但必要的手术让我许久行动不便，不过没关系。我手边终于有了研究素材，可从阐述田野笔记开始。一页笔记就够我忙上好几天：将它们对照我的所见，与孔里这儿的仪式有何不同，又代表何种文化意义。譬如，仪式里那个举着头颅跳舞的男人，不能是随便任何人，他必须与死者有“丢思”(duuse)关系。为了了解“丢思”是什么，我必须检视所有的亲属称谓。我不能用法国的亲属称谓来询问村人，那毫无用处。但是多瓦悠人使用法文亲属称谓的错误，倒是可以用来参考。譬如，他们无法分辨伯叔与甥侄，也无法分辨祖父与孙子。这显示他们称呼叔伯与甥侄都用同一个词，称呼祖父与孙子亦如是。事实也证明如此。多瓦悠人的亲属称谓是相互的。如果我称呼某人xX，他也会以同词称呼我。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破解出来。最后，我拿了我仅剩的三瓶啤酒(波利镇啤酒缺货，它们是方圆两百哩仅剩的啤酒)，向学校借教室与黑板。原本在十字路口晃荡的那些男人，雀跃前来和我

这个善良疯子聊天，交换啤酒喝。他们很快便理解亲属表的原则，我得到不少知识许多文献都提到原始民族无法理解假设性问题。我则无法确定我与多瓦悠人的沟通问题出在语言,还是其他原因。

譬如我说：“假设你有个姊姊，她嫁给了某人，你会称呼他为……。”

“我没有姊姊。”

“我知道。但是假设你有……。”

“但是我没有,我只有四个兄弟。”

几次挫折尝试后,马修介入了。“不对,不对。主人，你必须这么问。一个男人有个姊姊。另一个男人娶了她。她成为他的老婆。这个男人该怎么称呼她的丈夫?”如此这般，马修得到答案。我采用马修的方法，不再碰到困难，直到“丢思”一词。我问广谁是你的丢思?”

“我可以和他开玩笑。”

“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丢思?”

“小时候,人们告诉我他是我的丢思。我和他开玩笑。”

“他住在哪里?”

“他可以住在任何地方。”

“如果他是你的丢思,你父亲叫他什么?”停顿。

“他叫他祖父。”

“你的儿子怎么叫他?”

“我的儿子叫他祖父。”

曙光出现。

“你是不是也叫他祖父?”

“是的c”

在多瓦悠,老人都被称为祖父。这个称谓没有特殊意义,只代表对方上了年纪。前天,我花了一整个下午才搞通这点。

我另辟蹊径。“丢思是你们本家,还是姻亲?”其中一人回答:“本家。”另一个人回答:“姻亲。他就像祖父。”我换一种方法:“你有几个丢思?”“不清楚。”

我突然想到,“丢思”未必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形式。我试遍所有可能:居处、头颅屋成员、交换关系,仍搞不清楚“丢思”是什么。我采取另一个策略,请大家介绍我认识他们的“丢思”,然后我们坐下来,辛苦追溯他们的关系。终于有了较清楚的概念。如果我有“丢思”,他和我的关系是:我们在曾祖父(或更老的辈分)那一代有共同亲戚,中间还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女性亲属。

换言之,“丢思”可能是我的外曾祖父,除了“丢思”外,别无他词可以称谓,他和我属于不同的头颅屋,在亲属谱中是非常边缘、几乎无法追溯的位置。难怪我将两个“丢思”凑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关系往往有不同陈述。一个男人可以有許多“丢思”,但他只选择其中少数人玩笑戏谑,一起参与仪式活动。

其他田野细节也颇棘手。譬如男人参与不同场合所戴的羽毛、特殊仪式使用的叶子、仪式宰杀哪些动物、不宰杀哪些动物……,这些琐碎小事对理解多瓦悠文化都可能至关重要。譬如,豹子在多瓦悠已经绝迹30年,却在他们的文化里占有重要地位。豹子猎杀人与牛,猎杀特质和人一样。

割礼人和豹子一样让人见血,必须发出豹子猎杀的咆哮声,接受割礼的男孩则穿得像小豹子。如果一个人杀了豹子,必须举行和杀人仪式一样的仪式。杀人者被称为豹子,他的帽上可以戴豹爪。多瓦悠人解释死者的埋葬仪式,将它与豹子巧妙结合,说豹子和人一样,都把头颅摆到树上(其实豹子是把猎物拖到树上吃掉)。像祈雨巫师这类法力强大、危险的人物,死后会变成豹子。如果把这些想法界定在反映人性暴力、狂野的一面,诸此种种态度拼凑起来,也成一番道理。

即便如此简单明了(对人类学者而言)的研究范畴,都花了我好几个星期才弄清楚。人们不愿意谈论祈雨酋长与豹子的事。我是有一次星

期五到城里取信时,无意间与一个男孩闲聊,才得知此事。当时大雨倾盆,我们在树下躲雨,话题自然转到祈雨巫师。他指着远方云雾终年围绕的山头说:“那里住着一个祈雨巫师,唐布科。就算旱季,那里也有水。但是最棒的祈雨巫师是我爸爸——卡潘老人。当他死后变成豹子,我就继承了祈雨的秘密。”我竖起耳朵,听着男孩随口闲聊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开始挖掘金矿。抵达波利镇时,我已经从他口中知道某些特别的山与洞穴非常重要、祈雨用的石头,以及祈雨酋长可以用闪电杀人(还有他戴了假牙)。一旦我知道了这些事情,便可向村人查证。但是得知祈雨酋长与豹子的关连,可纯粹是好运。如果我不是刚好走那条路,如果不是时间凑巧,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个秘密,或者要很久之后才知道。

诚如前面所言,就连豹子这么重要的动物,我和当地人的沟通仍发生问题。一般人的想法里,非洲人通晓各种有关动植物的乡土智慧与民间传说。他们可从芽胞、气味、树木记号辨认行经的动物;小心翼翼分析树叶、果实、树皮,便知道它属于何种植物。非洲人的特有不幸是西方人别有居心曲解他们。早年,西方人自诩文化优越,自然认为非洲人的多数看法是错的,而且笨得很,智商大概只及肚皮之下。无可避免,人类学者的重大责任是反驳大众对原始民族的错误观感,尽力证明非洲人自有一套西方观察家忽略的逻辑与智慧。在那个新浪漫主义时代里,力守职业伦理的人类学者赫然偏到另一边。今日的状况与卢梭、蒙田时代并无不同,西方人依然利用原始民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声讨自己不喜欢的社会现象。当代“思想家”不太注意“事实”,也不留心前辈学者的平衡论点。在我尚未来多瓦悠前,便有过一次震撼经验。那是一次美洲印第安人工艺展,展览品中有一艘独木舟,解说写着广独木舟,与环境和谐共存、无污染。”旁边有一幅建造独木舟的照片,印第安人焚烧大片森林,以取得适合的木头,余者任其腐烂。“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仅死而复活,还在伦敦西北区及部分人类学系所活蹦乱跳呢c

多瓦悠人的真貌是,他们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我还少。追踪时,他们能分辨摩托车痕与人类足迹,这已是能力的极致。和多数非洲人一样,他们相信变色龙有毒,再三向我保证眼镜蛇无害。他们不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无法分辨不同鸟儿,更不能仰赖他们凭树皮精确指认树木。多瓦悠语里,许多植物都没有名字(虽然他们经常使用),而是以复杂句子指称:“那种树皮用来做染料的树。”多瓦悠人狩猎多半用陷阱,最没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存”。他们埋怨我未从白人国家带来机关枪,让他们一举扫荡此地残存的可怜羚羊群。多瓦悠人奉命为政府种植专卖

棉花，政府发给他们许多杀虫剂，他们马上拿来毒鱼，大把撒入河中，而后捡取漂浮河面的鱼尸。杀虫剂迅速取代传统用来窒息鱼儿的树皮。他们说：“它很棒，丢入河里，沿着下游好几英里，大鱼小鱼全部杀光。”

每年多瓦悠人都会故意大举焚林，加速新草的生长。森林火灾屠杀无数幼兽，也危及人类。

上述种种都和我与多瓦悠人讨论豹子有关。语言部分便困难重重。称呼豹子，多瓦悠人倒有合适字眼——纳母悠(Naamyō)。狮子则是复合字——老母豹。小型猫科如麝香猫或山猫则是另一个复合字——豹儿子。大象的称谓与狮子极为接近，只有音调稍稍不同。更糟糕的是，我请教的第一个会说法语的多瓦悠人犯了大错，告诉我“纳母悠”是狮子。此外，我怎么知道当他们说“老母豹”时，指的是狮子、年老的母豹子，或者两者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棘手。后来我终于搞到一些非洲动物的明信片，里面有~张是狮子，一张是豹，我给他们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其中的差别。不幸，他们不知道。问题不在动物的分类，而是他们无法辨识照片。西方人常忘了人必须经过学习才能辨识照片。我们自小接触照片，即便是各种不同打光、扭曲的镜头，依然可以辨识照片中的物体，毫无困难。多瓦悠人没有视觉艺术的历史，仅能辨识几何图形。当然多瓦悠小孩上过学，看过课本和身份证，懂得辨认照片。法律规定多瓦悠人出门都得带身份证，上面有他们的照片。我对这事百思不解，他们多数人从未到过大都市，波利镇也没有摄影师，他们是怎么搞来照片的？仔细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才发现是一个人的照片大家用。显然，官员辨识照片的能力也不比多瓦悠人好。当我收集多瓦悠词汇(譬如人体器官)时，我画了一幅画，是一男一女的粗略轮廓，搭配模糊的性器官外形，好让多瓦悠人指着部位告诉我名称。这幅图造成轰动，一连数月，男人蜂拥到我的茅屋要求看这幅画(他们尤其焦虑我是否完整表现割礼过阴茎的光彩模样，如果是，就不能给女人看)。关键是他们无法分辨男女的轮廓。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画技不佳，直到我拿出狮子与豹的照片。老人们拿着明信片左转右转，用各种角度观看，然后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小孩虽然认得照片，却不懂这些动物在仪式上的意义，没有用。最后，我只好跋涉到加路亚。市场里有一个名称辉煌的摊位——传统医师联合组织，在那里我找到各式奇怪东西，有植物的各个部位、豹爪、蝙蝠眼、土狼肛门……。我买了豹爪、麝香猫脚、狮子尾。有了这些配备，终于可以确定我们聊的是什么动物。

这仍未解决问题。解释这些动物的关连，多瓦悠人说了一个故事广

一只豹娶了一只狮子。它们住在山上的洞穴，生了三个小孩。有一天豹子怒吼。两个小孩害怕逃跑，变成山猫与麝香猫。留下的那只变成豹。就是这样。”

自然我要问这件事只发生一次，还是所有山猫与麝香猫的起源都是如此。众人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说这是山猫的起源，但是麝香猫产自麝香猫。有人则说这是麝香猫的起源，山猫的祖先本来就是山猫。

这不是单独现象。任何有关鸟呀、猴呀等简单问题，往往充满惊人复杂，一点不似你在人类学文献里读到的明白陈述“多瓦悠人相信……”。多瓦悠人到底相信什么，不是直接问他们即可得之的。你必须每个阶段都参酌各种解释，才能忠实反映他们的思想。

所以，日子继续。一场祭典提供我多日的研究素材。田野工作者不可能期望永远效率高超。据我估计，我在非洲期间，真正花在研究的时间不到百分之一，其余都用来补给后勤、生病、社交、安排事情、从这儿到那儿，还有最重要的——等待。我漫无节制的做事渴望已经触怒当地神祇，很快，我就受到教训。

译注

①在人类学里，交换是个复杂概念与体系，意指个人或群体之间有关宝物、权利、货品等的互惠性转让(transfer)。研究一个社会的交换范式与交换机制，自然导致研究一个社会再分配的制度。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 Mauss)认为相互的馈赠交换象征人类社会性的互相依赖，因此与亲属制度与社会阶层制度混在一起，并加强这些制度的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则将亲属制度视为交换范式，而女人是最终的稀有物资。

②留疤是指在身体上切割留下疤痕，可作为身份的证明，也是修饰身体的要素。为了美化身体，澳洲与非洲的一些部落住民常切割不同花样。

③戏谑者是拥有戏谑关系的人。戏谑关系是指一种存在于两个人(或两个团体)间的关系，按照习俗，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戏谑揶揄，后者不得引以为忤。有时戏谑是相互的行为，戏谑的实际形式差殊很大，但猥亵与取走财物是最平常的形式。此种关系是一种友情与敌意的混

合，它常见于具有冲突可能性但必须极力避免的情况中。此种具有双重价值的关系，能够经由尊敬、回避或允许相互轻视、放纵而产生一种稳定的形式。也有人认为交相戏谑可排除敌意，最大功能在于净化双方的情感。

④非洲许多地区的乐器均可调整音高，用来模仿裔调语言(tonallanguage)的高低音，藉此传达字义。最有名的是各式说话鼓(talkingdrum)，它们是沙漏型挤乐式的鼓，藉由挤压调整系带，达到变化鼓面张力、调整音高的目的。还有许多管乐器、弦乐器、嘎嘎器及其他体鸣乐器，都可以说话。

⑤高贵的野蛮人一词源自英国作家德莱顿

(John Dryden, 1631—1700)的剧作“格拉纳达的征服”(Conquest of Granada, 1672)，也是18、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代表作家对未开化民族的理想憧憬，认为他们象征人类未受文明污染，天生善良。详见《不列颠百科全书》(Britannica.com)。Roger Keegan指出，人类学者一旦置身初民或乡民的生活方式，浓烈的人情味及简陋的物质条件都具有强烈吸引力，让人类学者浪漫拥护“他们的民族”，坚决为部落生活的价值(甚至高贵性)辩护。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俗文化掀起一股回归“高贵的野蛮人”热潮，在意识形态上，是在对抗现代生活的疏离、不讲私情、狂乱等现象。

第八章 跌到谷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无疑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旅行经历，那段时间里，我完全沉溺于丧志的罪恶中。

连串不幸始于我决定去加路亚补给用品。我非去不可。我不仅已经断粮，汽油只够驶到加路亚，身上还仅剩1500中非法郎(约3英镑)。此等窘况导致贸然行动。我答应奥古斯丁载他进城，约好天色一破晓便在大街后面会合，希望偷溜出城，不必搭载宪兵或满车顶的小米。加足油门快冲，我们逃出城外，开始在最烂的路段缓缓爬坡、转弯，过了这段路后，才能连接柏油马路。我们并未抵达柏油路，距离目标五哩处，我绕过转角，赫然发现整条路根本被大雨冲掉了。西方人有个坏习惯，总认为一条马路到了转角，弯过去也一定是马路。在非洲却大大不然。我一转弯，车子发出可怕的金属嘎吱声，随即歪进一呎深的沟渠。车子的转向轴有问题了。它发出呜咽、隆隆声，拒不接受方向盘指挥。以往我只

靠微薄的资浅讲师（Junior Lectin.）?薪水过活，甚少接触车子，完全不知该怎么办。找人帮忙才是上策。

通常不管机器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布朗牧师，他在机械方面的神奇能力，众口相传。光凭两只衣架与一个旧犁，当场就可变出一个工具箱。他的解决方式不漂亮却管用。当他将修好的东西送还给你时，常会加上一句：“这是一堆废物，但是在非洲，样样东西都用不久。”不幸，今天他外出了。无法可想，还是得去加路亚。我们将车子推到路旁，开始步行，抵达柏油路后拦下一辆丛林计程车。当时，我并未把教会门上的铭文“上帝的意旨决定一切”当作恶兆。

我们平安抵达，乖乖遵守漆在车上的乘客守则，不吐痰、不打架、不呕吐，也不敲破窗子。抵达加路亚时已近中午，奥古斯丁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非洲餐厅吃饭，菜单选择只有两种：吃或不吃。我选择了吃，结果却没吃。他们用搪瓷大碗端上一只牛蹄，泡在热水里。当我说“牛蹄”并非指用牛蹄部位做成的食物，而是连皮带毛带蹄、货真价实的整只牛蹄。我努力进攻，却连牛皮都穿不过，突然食欲全消。奥古斯丁却以行军蚁精神将整只牛蹄吃到皮肉无存，只剩骨头。

此行有两大胜利。第一，我从当初贸然存钱进去的银行巧言哄骗出一笔钱来。第二，我找到副县长的机械工载我们返回波利。当时我愚蠢地以为这是鸿运临头。他先载我们在城里的富来尼人区绕了几小时，办一大堆琐事，终于出发前往波利。道路非常狭小，挤满载运棉花、汽油来往乍得与恩冈代雷的联结卡车。我惊恐发现这位机械工超越庞然卡车时，居然是双眼紧闭，整个车子急速往旁一偏，车轮离路旁三呎高的排水渠不到数英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傍晚抵达我的车子旁。他快速检查一番。车子没问题，他只要敲一敲就好了。他爬到车下，我听到金属敲击声以及富来尼语咒骂。他微笑着爬出车底。车子虽未完全修好，但开回波利没问题。到时我再换新零件好了。

我高兴极了。奥古斯丁与我爬上车，以缓慢速度出发。转向轴还是怪怪的，但多少愿意照方向盘的指示前进。路上到处都是猫头鹰。它们常会踞坐路面，突然飞起来撞向车前灯，到处都是它们的尸体。多瓦悠人很怕猫头鹰，认为到了夜里，妖巫便躲在它们的翅膀下飞行。如果你的屋外或牛圈传来猫头鹰叫声，必须赶快寻求解方。

我们开抵通往波利的山头，开始下坡。官到驶近横跨峡谷的窄桥时，才发现转向轴又完全不灵了。我居然还有时间想起桥头两边的尖刺

——那原本是栏杆,数年前,一位副县长在此车祸死亡,将栏杆撞得只剩尖刺。我们的车子先是撞上树干,弹回来撞上石头,直直往峡谷里冲。我整个人的力量全踩在煞车上,没用,车子在崖边悬了一会儿,随即掉下去。

一棵树干干净利落接住我们,然后慢慢被重量压垮。我非常镇定,熄掉引擎,问奥古斯丁可还好,然后爬出车外。从峡谷爬上 come 后,看着底下尖刺嶙峋的岩石,我们突然无法自抑歇斯底里大笑,非觉有趣,而是恐惧、如释重负与不可思议。我想我们呆坐了许久。逃过一劫,我和奥古斯丁都没受大伤,他胸口瘀青,我的头撞到方向盘,手指、脚趾与肋骨大概也受伤。徒步返回波利,我们喝了几瓶奥古斯丁窖藏起来应付危急状况的啤酒。此刻完全符合条件。

第二天,我们才完全明白损伤状况。仔细检查车子后,看来修理势必旷日费时且所费不赀。但是我们逃过一劫仅受轻伤,实在太幸运了。我请当地医师检查,他宣称我们都没受伤。但是我的手指与脚趾角度奇怪,两根肋骨肿起一大块,显然他的检查并未看出轻微的骨折。我的两颚状况最惨,两颗门牙摇摇欲坠,整个下颚肿起来,痛苦不堪。

我期盼状况会好转,回到孔里继续研究豹子、山猫,靠镇定剂才能在夜里打盹人眠。

此阶段我最关注的研究是疾病分类,为此,我花了许多时间跟随当地一位传统医师研究,不便之处是他住在孔里村旁高山顶上的悬崖。我们常常花数小时讨论各式药草、疾病诊断与各种疗法的差异。

我前面说过多瓦悠人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头部巫术(headwitchcraft)、亡灵骚扰与污染性疾病。惟有传染性疾病与巫术导致的意外伤害可用药草治疗。判断疾病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有些疾病的名字同时指称病征与致病因子(譬如我们的“伤风”可指称某些症状,也代表病毒感染致病)。有些疾病的名字则特指病征(譬如“黄疸过高”可能是多种疾病的结果)。从病征确定疾病须使用多种占卜。

病家先找来一个医师,他将鸡的内脏丢到水里。也可找一种专家用玻璃球观看患者,确定病征。最常见的占卜术是在手指间搓揉一种名为扎布托(wpto)的植物,口中喊着患者可能罹患的各种病名。扎布托断了,当时所叫的病名就是正确疾病。接着占卜者再用同样方法找出致病因子是巫术、祖灵或其他。最后才是确定药方。至少要经过三道占卜手

续,才能得到全部资讯。如果患者无法到占卜者处,可以请人将谷仓屋顶上的稻草送去,谷仓是一个院落里最隐密、最私人的处所。

如果占卜者确定是患者的哪位祖先搞鬼,解方是派人到头颅屋,用血、排泄物或啤酒喷洒这位祖先的头颅。

污染性疾病往往需要出动专家——割礼人、巫师或祈雨酋长。疾病的因果关系判断往往模糊暧昧。譬如,在我们看来是扭伤,他们却认为是虫跑进了手脚,属外力伤害。虫随雨而至,因此要找祈雨酋长治疗。碰触死者而罹患的疾病则需巫师治疗,疗法是以死者的衣物或其他私人物品擦抹患者。最可怕的污染性疾病来自铁匠与他的妻妾(制陶者)。与他们接触过多,尤其是碰触他们的工具,会生一种恐怖的病——女人的阴道会不断向内生长,男人的肛门则会脱垂。让男人致病的风箱非常类似阳具,它之所以攻击男性的肛门而非阴茎,可能和割礼的“官方版本”——割礼是缝合男性肛门——有关。

有些男人会施咒制造污染性疾病,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其中和我关系最密切者是孔里的仪式小丑。他拥有全区惟一的柳橙树,自从我向他买了200粒柳橙后,他便粘上了我c(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要买200粒,而是20粒,错误使用数字惹来麻烦。)为了保护柳橙树不受孩子蹂躏,他在树上挂了某些植物与羊角,如此一来,偷吃柳橙的人便会像山羊般咳个不停,不得不向他求解药。

有些多瓦悠人因拥有能让人牙疼、下痢等石头,赚了不少钱,患者必须向他们求取解方。多瓦悠人并不认为这种赚钱法有何不对。

头部巫术则是由近亲下在花生或肉里传染的。因为这种妖巫害怕尖锐的东西,所以尚未接受割礼的男孩千万不能豢养它,否则割礼时会流血至死。到了夜里,它会四处游荡,有人说它长得像小鸡,藏在猫头鹰的翼下。它吸人血与牛血,会造成死亡。防止妖巫入侵,必须在茅屋顶上放置尖锐的蓟或豪猪毛。一个人有没有染上头部巫术,惟有死后检查头颅才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所谓“死于巫术”通常不是指巫师作法让人死亡,而是拥有头部巫术的人反被其害:一旦妖巫受伤,它的主人也跟着死亡。多瓦悠人用此解释旱季里年轻人前往都市打工、死亡率偏高的现象。他们都是年轻人(根本就是孩子),不太会控制妖巫。看到城里屠夫摊上的肉,十分兴奋,不小心就被砧板上的刀子给割伤死亡。②

断定一个人是否染上头部巫术,必须在他死后检查上颚两块像钉子

的骨头。如果它们呈红色或黑色，代表妖巫已被杀死。如果一个家里接连几桩死亡都确定与头部巫术有关，通常某位亲戚会被指控为罪魁祸首。殖民时代以前，被指控施巫的人必须接受神判。①男的得喝割礼刀浸过的啤酒，如果有罪，他的肚子就会胀起来，流血至死。女的得喝掺了旦戈（dangoh，一种喀麦隆大戟科植物）有毒汁液的啤酒。如果她们不吐，就会死亡，证实有罪；如果她们呕吐，呕吐物白色代表无罪，红色则有罪。判定有罪者会被铁匠吊死。

一次，某女子被控对两个女儿下头部巫术，导致她们死亡。

第二个女儿死后的头颅检查，我也在场。一名老者用弯棍将头颅从尸身分开，技巧纯熟，颇获赞美。他将弯棍伸进眼眶内，轻轻一挥，头颅便随之而起，牙齿全没掉进尸体肚内。

女孩已死三周，腐烂气味臭不可当。死者父母必须答谢老者一副羊皮。照例，检查头颅充斥猥亵幽默，女人不得逗留——如果我们弯腰时放屁，她们会到处张扬。女人很不高兴地退场，男人开始检视头颅。我在多瓦悠期间检查过不少头颅，总是无法说服自己光凭头颅的形态差异，就能判断死者是否中了巫术，老人却往往结论一致。确定死者被下了巫术并不会引起公愤，而是满意。被指控的女人是我的近邻，大家开始笑说惟有白人才能做她邻居，因为白人不受巫术影响。对此侮辱，她不胜其扰，表示她愿意从死者头颅上走过。如果她是施巫者，就会当场死亡。她的丈夫不肯，对我说：“有什么用？她去走一定会死，我还得花钱再买一个老婆。”

面对巫术，多瓦悠人并无我想象中的恐惧感，他们以漠然的平常心看待巫术。他们常对我说头部巫术分很多种，只有一种是坏的。有些头部巫术让你牙齿干净强健；有的则保佑你农耕顺利，对大家都无害。当我说白人国度没有巫术，所以我很感兴趣，多瓦悠人始终不相信。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认定我的前世是多瓦悠巫师。多瓦悠人从不指责我说谎，只是摆出一种奇怪表情，尤其是听到地铁、英国人娶老婆不用付聘金等漫天大谎时。

大体而言，医师很愿意和我合作，赚取微薄报酬。他们只担心我会盗取药方，自己开业。原始社会里，鲜少有免费的知识；相反的，知识有归属权。一个人是知识的主人，既然他的知识是花钱买来的，岂会不收钱便白白传授他人，那就像嫁女儿不收聘金，是个笨蛋。因此他们向我收钱，纯粹合理。多瓦悠人依据血统来历判断药方好坏。古老药方一定

比新药方好；任何新药方都备受质疑,它缺少祖先的许可认证,因此医师也懒得寻找新药方。

医师原本对我的诊所颇感疑惧，直到确定我只用白人药草治疗传染性疾病，与他们没有竞争。但是一个病例让我面临道德与策略的两难。朱迪波的弟弟就住在离我数栋茅屋外,经常到我那儿拜访。他是个瘦长、奇怪、和蔼的年轻人，据说脑筋有点不灵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他好几个礼拜不曾现身，我问村人他是否出外，获知他生病快死了。

他得了严重的阿米巴性痢疾，家人跑去山顶悬崖请医师诊断。他检查鸡的内脏后，确定他受到母亲亡灵骚扰,她要喝啤酒。家人去头颅屋喷洒啤酒，酋长弟弟的病情却毫无进展。请来另一个医师，他说患者其实受另一个亡灵骚扰，只是这个亡灵假装是他的母亲。他们献祭供品，患者病势却越来越沉重。酋长的三老婆从小将这个小孩拉扯长大,忧心如焚，跑到我的茅屋前痛哭，询问我有没有白人药草可救他。我无法拒绝，事实上我的确有治疗痢疾的药与抗生素。我和大家解释我不是医师，不知道我的药是否有用，如果他们希望我治疗他，我就试试看。我害怕此举会破坏我与医师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看准我诊断一定错误。酋长的弟弟吃了我的药,迅速康复，几天内，便从骨瘦如柴变得活泼健康。大家都很高兴。医师也不生气。他们只说此病例十分复杂,患者得的是传染性疾病，但是不少亡灵也加人捣乱，让患者病势沉重。他们处理亡灵部分，我治疗的是传染性疾病部分。

惟有这种时候我才觉得多瓦悠人可怜，认为他们的生活形态的确不如西方人。除此之外，他们享受自由以及啤酒、女人带来的感官满足，自觉富足与自尊。可是一旦生病，他们便在痛苦与恐惧中毫无必要地死亡。波利镇的官方医院毫无助益。政府规定百姓就医必须携带笔记本，方便记录病历。部落文盲怎么会需要笔记本？大家都没有，波利镇也不卖。医院照规定行事,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医院拒收病人,不给他们亟需的紧急治疗，直到他们买到笔记本为止。我和教会都尽量提供他们笔记本。多数多瓦悠人不上医院看病，不少人死于缺乏救治。这种骄傲、没人性的官僚作风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同时间，我满怀罪恶地发现每当我到医院看病,仅因为是白人就可免于排队，获得达官显贵般特殊待遇。

另一次敏感事件是某位法国植物学者旋风般来去喀麦隆,制作喀麦隆植物分布图鉴。当我返回村子,发现这位绅士驻扎在校舍，已经连续调查本地植物6小时。多瓦悠人当然不解谁会单纯对植物感兴趣，他显

然意图窃取多瓦悠药草疗方,到他处大赚其钱。这位法国植物学者的研究站规模比我阔气,他不爱吃本地鸡,自己带了鸡来,还有两名随从服侍所需。我们在丛林里共进一顿奇特的晚餐,桌布与餐巾一应俱全,多瓦悠小孩则排成圆圈蹲坐我们身旁,张大眼睛好奇张望。他向我和气解释采集植物样本以供日后辨识的重要性。面对非洲,法国植物学者与英国人类学者的距离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直聊到深夜。

第二天,本地医师觉得我“兄弟”无法无天的偷袭妄为实在太冒昧。我颇费一番唇舌才说服他,我和法国植物学者来自不同国家,朱迪波请他喝啤酒遭到拒绝,就可证明。他和新教会的布朗牧师一样,都是外国人。这些种族和英国人的差异,就像可恶的富来尼人与善良的多瓦悠人一样大有差别。

依我们的见解,传统医师的疗法根本无效甚至有害。这些药方大异西方世界观念,譬如用羊角摩擦患者胸膛治疗肺结核,荒谬到我们根本懒得检查它是否有效。人类学者只要依据交感巫术(sympatheticmagic)?与感应巫术(Con-lagiousmagic)的一般原则,也能表现得有模有样,这些医师根本不够看。多瓦悠人在这方面的信仰丝毫不令我吃惊,直到我和祈雨酋长开始工作为止。有关这部分的故事容后再述。

多瓦悠多数药方以三大类神奇植物为主,从通奸到头疼,诸种痛苦都可治疗。这些植物又区分为几类,光凭外表,门外汉绝对无法区分。有时,多瓦悠人说起话来就像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无法眼见为实的东西,他们一概不信。我问:“你如何区分这种扎布托和另一种的差别?”或者“你怎么知道它是治疗头疼还是断绝通奸的植物?”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试了才知道,不然怎么办?”但他们又会滔滔不绝说些造雨石头、人变成豹、蝙蝠没肛门所以从鼻孔喷出排泄物等没影子的事情——无不违反他们的实证主义。你永远无法预测他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光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有三种说法,怒气程度不同。有时我能得到直接答案,多数时候是“我不知道,我没看到。没看到怎么知道?”大家开始嗤笑我这个人什么都相信。

这段时间,我开始觉得自己搜集到一些资料了。我逐渐适应非洲生活与田野方法的挑战。我还记得某篇文章说淘金是每三吨废物才沥出一盎司黄金,此言如果属实,田野工作和淘金颇相似。

我的双顎并未逐渐痊愈,越来越糟,牙床开始流出血液混合脓汁、不悦的粘液,该去看医师了。我绕道教会找布朗牧师,他雀跃闻知非洲摧

毁我的所有期许,印证他对黑暗大陆的悲惨观点。他愿意帮我修车,但不保证何时能修好。如果我早知道修车要九个月,我就不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当时我却觉得放下心头大石,搭上送信便车前往加路亚。

我始终不明白邮件车的驾驶为何不愿顺道搭载外国人。只要付点小钱,他就让人搭便车,碰到西方人,却搬出法规奉如圣经,断然拒绝。有时碰到善心宪兵,他会帮你说情。找不到便车离开波利,使我的非洲生活更添挫折。终于我来到加路亚,据说全喀国只有两个牙医,一个潜藏在此,另一个在首都。人们告诉我有中国大陆来的牙医,结果是烟幕弹,全是农耕机驾驶。最后我终于在当地医院追踪到牙医。

当时我还是个头脑不清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乖乖排队等看病。不久来了个法国商人,挤到队伍最前面,塞给护士500中非法朗,问道:“有没有白人牙医?”护士争辩说:“他不是白人,但是从法国来的。”那位流亡海外的法国人想了一下便离去。我留下。

当手术室门打开,我讶然发现自己被其他排队的非洲人推到队伍最前面。手术室里只有一些老旧的牙科器材,还有~张大大的里昂大学文凭,给我不少信心。我对一个大块头男人解说我的病状。他二话不说,拿起一把钳子拔掉我两颗门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我对拔牙的痛苦来不及反应。他说我的门牙烂掉了,甚至暗示说搞不好它们老早就烂了。现在他把烂牙拔掉,我好了,可以到外面付钱给护士。我呆坐在椅子上,鲜血直淌衬衫胸口,试图让他明白他可以进行下一步治疗。少了两颗门牙,还要用外国语与人争辩,实在很困难,毫无进展。最后他终于发现我是个难缠的病人,恐吓说好呀,如果我不满意他的治疗,他可以去叫牙医来。他转身离去,留下我狐疑到底是谁帮我做了拔牙手术。我居然掉进这么明白的陷阱,误以为站在手术室、身穿白外套、准备帮你拔牙的人,一定是牙医。

另一个男人出现,也是穿白外套。我忙问他是不是医师, he 说是。刚刚那人是他的技工,也修手表。补起我空空的门牙要花不少钱,难度高,需要精良技术,他有这种技术。

我告诉他除非我能说话,否则我无法工作,也就没法付钱给他。他顿时变聪明,叫我下午再来,他会做个塑胶的东西。

义说我是高贵病人,配得上用麻醉,在我的牙床注射局部麻醉剂。拔完牙后才打麻药,这实在很怪,但是我痛到毫不在乎了。

在拔牙与补牙间的空档,我在加路亚游荡,门牙漏风,像狼人般青面獠牙。迎面走来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我胸口沾满血,仿若身受重伤。宪兵怀疑我干了什么分尸坏事,盘问我时,我只能含糊不清、发音不全地回答。

下午我回到医院,医师为我补上两颗在牙床上靠不住摇晃的塑胶假牙,给我一瓶粉红色漱口水,收费超过法定标准10倍。没辙,只好照付。当我离去时,发现用来为我注射麻药的针筒弃置在地。

适应这个塑胶假牙可是我情愿不要的麻烦事,多瓦悠人却喜爱不已,许多人还仿效我,刻意拔掉门牙。我问他们干嘛如此?是看起来比较美吗?不是。那是(此刻人类学者沉浸于幻想中)为了提供身体一个像村落大门的入口吗?也不是。这是为了上下颚锁死时,还有一个洞可以把食物塞进去。这种事常发生吗?据他们所知,从未发生过,但有可能发生呀。能够一边说话一边拿开门牙,极端吸引多瓦悠人。

现在已接近收成季,多瓦悠人赶在雨季最后一个月把许多属于湿季的仪式举行完毕。譬如男人死后,必须将他的弓安置在头颅屋后面,举行安弓仪式。女性死者的水瓮必须由儿子送回到她的兄弟处。我迫不及待要看这些仪式,惟有看过并记录所有仪式,才能分析其内在逻辑、勾勒其架构。

我的可移动式假牙大大提高了马修的地位,让他很快慰。

他听说本地医师即将为过世的老婆举行仪式,每次上山去拜访医师都是痛苦的经历,必须攀爬摇摇欲坠的岩石,一失足便会摔落陡峭深渊。但是没办法。他选择这么不亲切的地方居住,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山地多瓦悠人的传统居住方式,在陡峭山边开辟梯田,必须四肢着地才能耕种。此外海拔高数百英尺,气候适合种植少数特殊品种的小米,它们比平原地区大片种植的普通小米值钱。理论上,供祭祖灵必须使用这种高等小米,给祖先喝的啤酒也用它酿造,酒精浓度较高。此外,高地农田较少被牛践踏。

相较于攀爬时的辛苦,抵达之后的工作环境很宜人:山地村落气候舒爽,人们热情欢迎我,其实离我的茅屋也不算太远。我检查了相机、录音机后,先去拜访主人以贿赂他,探询他举办此次仪式的动机、该准备些什么。先行拜访是聪明之举。一旦仪式开始,大批亲属四面八方涌入,谁也没时间理会人类学者的愚蠢发问。此外,先行拜访给我充裕时

间检查我得到的答案、思索我要问的问题,看看有无改进之处。仪式过后几天,我会二度造访村子,询问仪式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核对仪式参与者的身分,它和其他村落举行的仪式有何差异及不连贯之处。这时仪式器物尚未归还主人,正好可以拍照,这比仪式中拍到的照片更清楚。我将底片都寄回英国,请朋友帮我冲印。在喀麦隆冲洗底片既贵又不可靠,但是底片在这种气候下一放18个月,也很危险。寄回英国有可能半途丢了,也要回国后才能看,但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聪明。最大的缺点是大大增加了我与邮局人员的接触,即使以当地标准,他们也堪称是蠢笨与无能的大师。

就在仪式的前几天,我的生活水平突然大大改变。那天我进城取信,来了一辆陌生卡车,满载箱子、桶子与行李。陌生车辆向来招引诸种揣测。卡车上是一男一女陌生白人,身为驻地白人,上前探头探脑是我的责任。我们用生硬的法语交谈,不久即发现我们都来自英语系国家,男人热情握手,差点捏碎我两根手指早已骨折的手。

他们是约翰伯格与珍妮伯格,与新教会的布朗牧师是同事,奉驻波利。他们是美国人,年纪还轻,初次到非洲,和我当初一样饱受震撼。约翰负责主日学教学,珍妮是他的太太。我们都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口音。

他们在波利镇安顿下来后,我更是非进城取信不可。有他们的愉悦相伴,你可以大说英语、在厨房吃珍妮烘焙的面包、听音乐,聊些小米与牛只以外的话题。约翰的任务是和多瓦悠人沟通“基督精神的意义”,我的任务则是确立“多瓦悠文化的意义”。我们的相互助益,便在提醒对方目标常有力不能逮之处。最重要的,约翰傲然拥有12大桶垃圾小说,慷慨赐借。我在多瓦悠之所以不曾发疯,这些小说居功最伟。仪式的漫长间隔、七点之后村民全部上床的无边沉闷夜晚,一本小说在手,便不再那么痛苦难熬。顿时,田野工作变成我此生最浓缩的阅读经历,我从未有机会如此大量阅读。不管是坐在石头上、爬山半途中、坐在河流中、蜷缩在茅屋里就着月光,或者拿着煤油灯在十字路口等待,我都少不了一本约翰的平装小说。当我的期望落空、人们允诺我的神圣誓约破裂,我就遁入田野工作的换档心情,拿出我的平装小说,和多瓦悠人比赛谁能熬得更久。

我赢得令人艳羡的“固执”美名。如果有人约了和我见面却爽约,我就会拿本书坐下来等,直到他现身为止。我觉得自己终于赢得西式胜利,打败了多瓦悠人的时间观。

约翰和珍妮除了解决我的交通问题,愿意帮我从城里运送必需品,还满足我的其他需求。约翰把办公室钥匙借给我,他外出时我可使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真正的桌子,这是我到多瓦悠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平坦书写桌面,还有电灯与纸。没住过非洲山区部落的人,绝对无法体会这是何等奢侈。只要跨进他的办公室,我就可将多瓦悠锁在门外数小时。我可以摊开笔记分析资料,检查哪些地方还不明白,哪些调查又是有价值的。在毫无干扰、中断的状况下从事抽象思考——非常不非洲。

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初次见面后的事。但仪式部分的发展也超乎我的预期,前面说过我忙着记录医师之妻的水瓮仪式,我照宣布的仪式日现身,讶然发现它居然准时举行。我必须承认爬山耗掉我太多精力,到了山头,我差点站不住,世界在我眼前打转。我尽力记录仪式——死者水瓮如何布置成接受割礼者的模样、男人将水瓮高举过头边歌边舞。但情况显然不对,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来,相机重得拿不动,多瓦悠人的“解释”也令我恼怒不已。当时我坐在牛圈的墙上,忙着厘清仪式参与者的亲属关系,一个男人警告我不要坐在那里,以免染上可怕重病。我问马修他是什么意思。马修说问题出在角落的破瓦瓮,它们蓄积气体,会吸走我胃里的维生素。我实在受够这种胡言乱语,突然勃然大怒,连自己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是受过教育的多瓦悠人的典型答案,我早该习惯了。如果我当时心智正常,便会察觉这是传统多瓦悠人思维模式伪装成西方想法。后来我颇费一番工夫,才发现破瓦瓮下埋的是保佑牛只繁育的石头。它会扰乱人的生育,惟有丧失生育能力的老人才能接近。坐在那里,我可能终生不育。

到了仪式尾声,我几乎无法记笔记,以可能摔断脖子的高速飞奔回村,颓然倒在床上。第二天,太阳尚未完全露脸,我便爬进城看医师。他看看我的眼珠,在显微镜下检查我鲜黄色的尿液,宣布我感染了病毒性肝炎。他问:“最近你可曾用过不干净的针头注射?”我想到加路亚那位牙医。惟一药方是大量摄取维生素B、休息与营养饮食。考量我的状况,这些完全不可行。在床上躺了几天,我觉得好多了,便回到山上继续询问水瓮仪式的细节。

我在头昏脑胀的状况下工作了一星期。约翰和恩冈代雷教会的一位传教士开车到村里探望我。我不记得谈话内容,好像是在聊当天我买到的阳具状山药究竟有何性意涵。他们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开始一阵忙乱。他们担心我的状况,要载我去恩冈代雷的教会医院。我不认为

自己需要这么强力的治疗。幸好，他们坚持第二天出城时再来看我，让我思考一下。我拿着肥皂前往洗澡处，离开村子不到100码，便突然累得走不动。路边正好有大石，我一屁股坐下，无法抬动双腿。大雨骤然降下，我仍无力移动身体。

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可自抑放声大哭。就在此时，邻村的贾斯廷发现我。我抽噎说自己无法走路，他一把拉起我，背我回茅屋，我沉睡不醒，直到被抬进医院为止。

译注

②国大学教师分为ju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reader, professor四个等级，前三者都是讲师。

②此段有关头部巫术的描绘并不清楚。译者特地去信作者NigelBarley,请他进一步说明。NigelBarley为此向读者写了一段详细说明,请译者翻译附于文后:“头部巫术”直译自多瓦悠语的“祖克沛思”(Zuulkpase)。多瓦悠人和许多非洲人一样,认为人的身体就像容器,可以注入力量,也可以流出力量(因此瓦瓮才会在他们的象征体系里扮演重要角色)。头部巫术是多种巫术中的一种,可好可坏。(译注:亦即人类学里所谓的白巫法与黑巫法,前者可产生有利的力量,起保护作用。)你很难用英文讨论头部巫术,区分它是不是一种有物质形体的东西。多瓦悠语言并无此种分别,它是一种介乎东西、动物与抽象力量的东西。

一个人之所以染上头部巫术,通常是由亲戚通过食物下蛊。

和小孩所吸收的其他力量一样,当孩子越长越大,这个妖巫也必须加以训练控制。它非常畏惧尖锐的东西,晚上主人睡觉时,它就出外游荡。刚染上者缺乏自主控制它的能力,往往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则永远嗜食鲜血(尤其是主人的亲戚)。要证明一个人是否染上头部巫术,惟有在他死后检查他的头颅。虽然理论上,你可因他人施巫术而死,但多数时候多瓦悠人说“死于巫术”是指妖巫受伤,导致主人跟着死亡。

③神判(或称神断)是用生理和身体的测验来判定诉讼当事人有罪、无罪或者权利归属的方法。神判时被告须吞食毒药,或把身体的某一位浸在烧热液体里,或者和原告决斗。如果身体未受伤害,则表示被告无罪。

④交感巫术一词是由弗雷泽(James Geo. eFrazer)所创,他在《金枝》(Bougft)—书中说,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同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通过“相似律”引申出的巫术,施巫者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通过接触律,施巫者则相信能通过一个物体对另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不管是“顺势巫术”或“接触巫术”都奠基于交感作用,施巫者相信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神秘媒介,可以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亦即经由神秘的交感作用,可使本来无关系的两件事物发生作用。详见弗雷泽,《金枝》,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P233)

第九章 非洲总有新把戏

任何一家非洲医院就西方标准来看都很恐怖。没有西方医院的粉嫩色彩与低声细语,也不在走道旁诊疗室或屏风后面治疗伤患,而是众目睽睽展示令人不悦的病体。非洲人生病,全家人坚持和他一起住院,在医院里举炊、洗衣、给孩子喂奶,把医院当成家,旁若无人以刺耳嗓门操持家务。收音机震天作响,小贩叫卖各式垃圾货品。长长的队伍里,女人背着孩子、男人一脸忧郁,人人手上紧抓着纸,好像护身符。男护士穿过病患队伍,心无旁骛,全然无视紧抓住他们的手与哀戚恳求。医院周遭更是生态灾难。树叶全被摘下擦手,树枝被扯下充当柴火,新月形的草坪被踩得奄奄一息,上面一坨坨排泄物,鬼头鬼脑的狗儿尽兴大舔。

坐镇这一团混乱的是医师,通常是白人,工作过度、饱受骚扰,跑来跑去处理各种急难事件,以赛过12个部门的效率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为我注射丙种球蛋白,整整两天,我都无法移动双腿。再度,尼尔森牧师夫妇收容我,决心好好喂饱我。

肝炎的大麻烦是它很容易变成慢性,纠缠我直到我离开喀国为止。因此第一要事是检查出我罹患何种肝炎。肝炎检查只有雅温得医院才能做。那里也有合格牙医能帮我做一副较可用的假牙,直到我回英国为止。我的西方朋友显然受不了我吃饭、聊天时,假牙常常飞出去,频频鼓励我去雅温得换假牙。

财务灾难悄然逼近。我的钱还是没来。银行连最简单的指示都无能执行，我欠教会的钱已多到难堪的地步，还得面对修车与“身体大修”的额外支出。走投无路，我发电报给英国同事，请他们借我500英镑渡过难关。如果他们能电汇给我，我可以去雅温得的英国大使馆领取。

此次身体崩盘来得还算凑巧。主要的庆典季节已经结束，我打算参观的丰收祭尚未开始，大约有三星期时间整修自己，再回到田野调查地。运气好，说不定可以赶上丰收祭。拿着假牙，我出发前往雅温得。

因为身体虚弱，我决定不计代价搭乘卧铺。出乎我意料，卧铺很干净舒适，风格颇似20世纪初“火地岛铁路公司”(TierradelFuegoRailmadCo.)的出品。我的一夜好眠梦想却被服务员摧毁，他坚持安排我与一位恐怖的黎巴嫩妇女及其瘦弱的女儿同住一间。服务员指出我的铺位，我将行李放妥，倒头便睡。突然，那位利凡得(Levantine)?悍妇一把将我扯起，嘶声怒吼：“在我女儿结婚前，没有男人能与她同房睡觉。”她解释说：“她还是处女。”我与服务员以全新兴趣打量这位女孩。我试着解释我并不觊觎她女儿的肉体魅力。女孩咯咯笑。服务员咆哮。我被全然漠视。无视那位悍妇的骚扰，服务员唠叨念了一大篇规定。和所有非洲争论一样，他们的口角亦是周而复始、无关宏旨。

“我认识一个铁路局主管，我叫他开除你。”

“我兄弟是移民局督员。我叫他驱逐你出境。”

“野蛮人!”

“娼妓!”

随即他们在车厢门口毫不体面地扭打，互相大啐口水。我与那位女孩沉默交换同情眼神。该摆出决断的样子了，我吃力起身。妇人似乎担心我从背后偷袭她的女儿，紧握拳头，奋力扑到我的面前。服务员趁她不注意，一把抓住她的背，将尖声大叫的她拖到走道。众人围观，不少是出外旅行的警察，漠然袖手，一些可恶的观众则鼓噪叫他们打架。

我则一跛一跛沿走道前行，发现几乎所有卧铺都是空的，随便挑了一个睡上去。服务员视此为恶意背叛，用瞪视黎巴嫩妇人的恶狠眼神瞪了我许久，直到我拿钱贿赂才打发了他。整晚，我都听到那位黎巴嫩“哨

兵”只要瞥见敌人经过，便拉开车门对他大声咒骂。第二天抵达雅温得，服务员死命阻挠那位妇人找行李推伙，她则企图泼他茶水。

我和上次在雅温得认识的法国朋友约在老酒吧见面，闲聊大家的近况。多数失踪面孔都是感染了肆虐西非洲的致命病毒性病。非洲社交生活贫乏，通奸是最大消遣。我惊恐发现那些纪念品小贩还记得我是那个什么都没买的人，决心这一次不让我漏网。

初抵喀麦隆时，我对雅温得的丑陋与肮脏印象深刻，现在它却似天堂般美丽、品味非凡，充满文明舒适。短短数个月，我的标准便有了惊人变化。赤贫与富裕的骇人并存也不再擦动我。当我与白人同伴坐在咖啡馆时，一个孩子站在人行道上，年纪小小，却不知受什么政治激进主义影响，对外国人破口大骂。咖啡馆客人似乎觉得很有趣，丢了几个铜板，那个孩子连忙趴到泥巴地上拾起。

我很快住进朋友的公寓，再次发现英、法两国年轻人的生活优先顺序大不相同。生活在非洲，独立的英美人士不是自己种植，就是吃罐头食物，法国人却坚持法式料理。不教书时，他们的生活就是到丛林赛车、到大使馆区参加派对，或者从事其他观光冒险。他们当中有一人酷爱剥制动物标本，尤其擅长剥制穿山甲。据说穿山甲很难杀死，因此他终日忙着实验各种杀死穿山甲的新方法。有时澡盆里浮着他宣称刚淹死的穿山甲，有时冰箱冷冻库门关不上，里面是他“冻僵”的穿山甲。

奇怪巧合，综合医院里新来的医师认识我，他是我一位老友妹妹的男友，我们曾在法国拉罗歇尔(La Rochelle)的酒吧见过一面。发现世界这么小，而且依据非洲扩展式亲属关系运转，真令人欣慰。他安排我验血。我对这项检查颇感矛盾。我就是因针头感染而生病，再挨一针能治病吗？

第二天，我去大使馆打探钱来了没有。大惊失色发现自己成为外交工作的主角。伦敦外交部转来一大堆夸张报告，说我的身体伤残了，以致大使馆一位人员慎重考虑走出首都护围，寻找我的下落。典型作风，他们费劲解释为何无法帮忙，为我安排优先看牙医，却矢口否认知道钱的事。

我在雅温得待了两周修牙，用新假牙大啖肉与面包，某天还吃了奶油蛋糕。（我回英国后，天天吃两个奶油蛋糕，直到恢复体重为止。）再没什么比大病初愈后四处走动更快乐。有一天，我与烟草店老板一起

外出吃饭,不知为什么,突然幸福感紧紧包围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坐的是布套扶手椅。在多瓦悠,我不是坐在石头上,便是坐酋长的摇摇欲坠折叠椅或教会的硬背椅,这是数个月来我第一次坐到扶手椅。此地还有戏院,配备奢侈,坐在后座的人有一种机器可以听录音,不必仰赖前座的人口耳相传。最棒的是这里的房子不是浪板铁皮屋顶,大雨不致冲毁一切。

但幸福感短暂。此地白人生活集中于酒吧,到了晚上,他们就群聚于此互吐苦闷、抱怨雅温得种种。为防肝炎复发,我严禁喝酒,酒吧对我而言,实是乏味透顶。到后来我要返回内陆时,竟一点不觉惋惜。我也担心只要我转身不注意,多瓦悠人就会偷偷举行丰年祭。

我顺道到医院拿验血报告。第一份报告说“样本遗失”。

第二份报告说“验血试剂缺货”。我早就知道是一场白忙。但是我觉得身体好多了,而且配备了新假牙,可以发出基本的英语发音。财务状况则依然吃紧。数月后,大使馆才发现钱的确是汇来了,只是塞在某个抽屉里。我更讶异大使馆人员极端缺乏手腕,居然在乌龙事件后一星期寄来女王生日派对的邀请函,请柬背面写着:“如果阁下不克光临,大使也不觉意外。”

我平安抵达恩冈代雷,与约翰、珍妮碰头,搭他们的便车回波利镇。美国派来增兵,那是布鲁一家人,男主人是华特,他将在教会学校教书。他、约翰与我成为灵魂伴侣。华特迅速得到“瓦区”(Vulch)绰号,因为当地人将他的名字念成兀鹰(vulture)。华特是《时代周刊》填字游戏迷,经常坐在阳台上,与填字游戏数小时痛苦奋斗,不时绝望呻吟或者兴奋跳跃。他极有音乐才华,很快便取得教会那台饱受湿气与白蚁侵蚀、油尽灯枯、哮喘不已的钢琴独家使用权。后来他搞到一个调音较好的乐器,我才发现他真的能玩音乐。他的太太杰奎琳是完美的陪衬者,统管一切务实工作:裁衣、养鸡、钉钉键锤、生养那些“瓦区”边玩填字游戏边心不在焉逗弄的小孩。他们家永远访客川流不息,主人还欢迎多多益善。打从丛林来的客人永远不知道他们家里会有谁,到处是打开的行李、吵闹的小孩、猫狗与变色龙。这就是“瓦区”的家。

我不再觉得自己在喀麦隆孤孑一人。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我已克服种种困难。田野场不远处就有我的朋友,当我生病、沮丧、被孤寂打倒时,就可逃进我的避难所。现在,我可以开始进行此行的研究了。

译注

凡得指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自希腊到埃及,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

第十章仪式与错误

我离开了三星期，欣慰发现路旁的小米尚未到收割期。自从我读了马林诺夫斯基那篇反对人类学者赖在教会阳台上的激烈文章后，就对教会阳台大感兴趣,我发现坐在阳台上沉思非洲,往往心情愉悦且收获颇丰。阳台正前方是通往城镇的干道,背后是月光笼罩的山头,嘈杂与闲逸在此美妙处所兼容并存。

经历恩冈代雷的寒冽,此刻我欣然坐在阳台上享受美景与仁慈的温暖,远处山头飘来阵阵鼓声。再度,我觉得自己像40年代英国电影里的典型白佬，聆听远处山头的土著鼓声，怀疑这是否代表令人胆颤的屠杀即将展开。我认出那是深沉的死亡之鼓。有人死了，还是个富人。鼓声在山头回响，很难判断它来自何方。我问厨子鲁宾知不知道，他说鼓声来自蒙哥(Mango)村，结果鼓声来自我的村子。责任感驱使我起身：迄今，我尚未见过男性大型葬礼。我和朋友告别,举着借来的火炬,奔回孔里。

我一踏入村子,马修便热情迎接我，要求预支薪水。死者是孔里村最偏远处的一个有钱人，因为马尤(Mayo)的关系，我和那个院落关系不错。马尤是朱迪波父亲的老朋友,政府不顾孔里居民反对与世袭原则，派封马尤为酋长。②因为朱迪波的父亲突发狂想,认为政府有权课税，他也可以开征自己的特别税，被政府断然否决，气愤不已。为了酋长之事,副县长、孔里居民与马尤之间关系恶劣。马尤总是散发一股乏味的冒牌酋长味道,被村民视为政府的买办。奇怪的是,马尤与朱迪波的坚固友谊始终不变。我认为马尤是我碰到的最好的多瓦悠人,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意志高昂，帮过我无数忙。马修刚从马尤的院落回来，已经记下葬礼流程,令我欣慰不已。

尸体已经用小公牛皮裹过一次，取自死者兄弟专为此场合宰杀的牛只。女人身戴表示哀伤的树叶，敲击空葫芦壳，满村奔跑哀号。死者妻妾坐在停放尸体的圈地，眼睛呆望前方。笨得很,我居然趋前致意。她们根本不准动，也不准说话。看到我闹大笑话，男人一边裹尸一边窃笑。其他亲属(尤其姻亲)也献上包裹尸体的兽皮、布疋、绷带。死者的女婿携妻前来,让她站在牛只圈地中央，对着她的小腹丢掷供品,此举代

表他与死者之家的关连。死者岳家的人则将供品丢向死者亲属的脸上。此举通常表示侮辱，精确点出男人对岳家的尊敬。女婿与岳家的对应关系，前者居于劣势，后者居于优势。

葬礼时，男人互相打趣玩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与死者同时接受割礼。终其一生，他们见面就应互相戏谑侮辱，而且可以随意拿取对方的财物。突然间大雨如注，大家都消失。我问：“他们去哪里？”

“他们去树林里大便。”

当时，我天真以为这是暂停，在众人的共同默契下，让一早就参与仪式的人可以休息一会儿，到树林里解放后再继续。

后来，我才发现到树林里大便也是仪式的重要部分，间接点出这些戏谑兄弟的割礼真相——他们的肛门并未缝合。

马修、马尤和我躲到茅屋里等待大雨停歇。马尤告诉我村里如有人死亡，第二天上午男人会聚集村外的十字路口举行仪式。这是马尤的典型作风，主动透露其他人吝于分享的讯息。

男人都到十字路口。小丑和巫师也去。与死者同一批接受割礼的人也去。他们面对面坐下，把草放在脸上。一个人说：“把你的屎给我。”另一个人回答：“你可以拥有我的屎。”然后，他们开始交媾，用细棍子。一个男人放火烧草。他们大声呐喊，加入其他男人。结束了。

马尤觉得整件事非常恐怖，边说边放声大笑。基于礼貌，我也跟着笑，脑筋却不断打转，企图厘清讯息的意义。多瓦悠仪式让我头晕眼花，看似充满含义，却无法勾勒出他们的象征体系。我始终觉得拼图少了一大块——一个重要事实，因为太过明显，人们遂不觉得有必要告诉我，因此我把拼图整个拿反了，看错角度。我怀疑少掉的那一大块就是割礼，但是大家还不愿跟我谈它，数个月后，我才将整个图像拼凑完成。事实上，十字路口的那一幕是男孩割礼的精简版，结构由割礼蜕变而来，多瓦悠其他仪式亦复如此。所有生命危机、岁时祭典都以割礼辞汇描述。这也是为什么割礼衣服会不断出现在极不合理的地方，替如用来装饰死亡妇女的水瓮、包裹死者等。

外面传来呐喊声。当我们在茅屋躲雨时，男人已从树林回来，将一顶红帽子绑在尸体上，就像接受割礼者戴的红帽。

他们推挤尸体,威胁割他包皮。部分葬礼还有一个裸体男孩与尸体抵背而坐,男人割断绑在男孩阴茎上的红带子,模仿割礼。

马修与我待到很晚,录下仪式歌曲,搜集各式闲言。这些录音带够我们忙一阵子了。

我们刚回到村子,坐下来吃当天的第一顿饭,便听说邻近村子要举行头颅祭,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眼前这场葬礼进度暂停,尸体要维持原状放两天。我们可以先丢下这边,去参加另一边的大事。

吃饭时,马修又露出那种令我畏惧的狡猾表情。每当他别有居心,总是酝酿良久,以致当他表明企图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终于他开口了:当我进城疗养时,他得空拜访一些亲戚,也整理了我的茅屋,在我的皮箱底找到一套旧西装。

那是一位同事建议的:“你总需要一套西装吧?”理由为何,我不知道。几个月来,我带着这套西装流浪,始终找不到机会亮相,终于将这位同事的劝告打入“给田野工作者的疯狂无用建议”名单里。马修却另有想法。他恳请我穿这套西装参加头颅祭。他说这会令大家印象深刻。我断然拒绝。马修闷闷不乐。那么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一个厨子。

我不该自己烧饭。何况像今天这样,我们出去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就有饭吃,不是很好吗?他可以引荐他的兄弟。为求耳根清静,我答应与他的兄弟谈谈,心里却一点都不想加重负担,搞什么“居家生活”。

第二天尚未破晓,马修便叫醒我。满脸笑容,他有个惊喜给我。昨夜他提到的厨子——他的弟弟——已经来了,而且烧了早饭。那是油漉漉、烧得焦黑的内脏。我讨厌多瓦悠人煮东西总是放一大堆油。厨子被带到我的面前,准备接受我的嘉奖。他是年约15岁的年轻人,很奇怪,两手都有六根手指。我对此颇感兴趣,觉得应该研究多瓦悠人对身体畸形与残废的想法。年轻厨子将优良手艺归功曾在加路亚替白人工作。他在那里做厨子吗?不是,打扫的。我觉得疲累不堪,这个问题必须等我体力恢复了,才有办法应付。今晚,我再和他谈。

完全符合多瓦悠人的时间观,头颅祭仪式未照宣称时间举行,这让我有机会询问多瓦悠人秘而不言的仪式部分。严格来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我要求看“泼洒头颅”,据我所知,这是头颅祭的名字。没错,但它也代表对着头颅泼洒排泄物与血液的仪式部分。所以我要求看“泼洒头

颅”，我就只看到“泼洒头颅”，不少刺激性活动我都没看到，而且是由我不知道的人参与。譬如男人会抱镜跳一种非常自恋的舞，一起接受割礼的哥儿们必须爬上死者的屋顶，用肛门摩擦屋脊。女人以形似阳具的山药做出各种奇怪动作，令我颇感困惑，后来我才发现那是男孩受完割礼的仪式变形。

换言之，死者的妻妾在最后一次辞别丈夫后，被当成刚受完割礼的人。共同特点是接受割礼者与寡妇都经过一段时间隔离，可以再融入社会生活里。她们的丈夫——头颅祭的主角——也被视为刚受完割礼，他的头颅被放在头颅屋里，那也是割礼仪式的最后高潮地点。

自然，当时我全不明白这些，只忙着记笔记，无能猜测我努力记录的是什么。多数时候，我的发问只是散弹打鸟，希望能撞到一二个可以继续发挥的问题。象征主义领域的困难在于你很难判定哪些资料可用来解释象征体系。你试图勾勒多瓦悠人的世界——他们如何建构与解释自己的宇宙观，但此类资料多半属于意识不及的范围，你不可能直接问多瓦悠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太模糊了。解开宇宙观之谜，某个词汇、信念，甚或某个仪式的结构都可能至关重要。你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

譬如，我曾说过铁匠是隔离阶层。隔离规则包括不能与族人共食、一起汲水与耕种，也不能与其他阶层婚配。人类学者碰到这种案例，会怀疑是否有其他沟通形式也强调了铁匠的隔离，譬如当地人对语言的想法。事实的确如此。我发现铁匠讲的多瓦悠语和一般人不同，有一种特别口音。

多瓦悠人对乱伦与同性恋的想法，是否也强调了铁匠的隔离？对我而言，同性恋尤其是奇怪的领域。某次，一头公牛的睾丸感染寄生虫必须切除，我终于有机会询问同性恋的问题。平常如果数头牛同时要阉割，地点会在男孩割包皮的小树林，又是人认同牛的另一明证。那次，牛只全被赶进牛圈，好捕捉生病的牛。这时一只不到一岁的小公犊试图爬到另一只小公牛身上。我指着这个画面，希望多瓦悠人会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铁匠阶层。我的问题越深入，气氛就越尴尬。事实是，西非洲多数地方的人从未听过同性恋这回事，都是白人在说。多瓦悠人极端怀疑同性可以交媾。公牛爬到公牛身上，他们的解释是“在争夺母牛”。比起西方社会，多瓦悠男子同性间的身体接触较多，但全无性意味：男性朋友可以手牵手散步；年轻男子可以交颈共眠，丝毫不涉欲念。久未见面的多瓦悠人会一屁股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我的头发，看到我对这种公

开的亲昵举动大为困窘，他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的猜想查无实据，铁匠阶层并没有乱搞同性恋的名声。但他们吃狗与猴子，多瓦悠人不吃这两种动物。人类学者可能会说，这两种动物太接近人，所以多瓦悠人不吃。吃它们，等同饮食的乱伦或同性。

因此，你在资料泥淖中小心行走，不断犯错而后修正。不过我必须承认，今天我比较烦恼的是厨子的问题，如何才能摆脱他的服务。我终于想到妙招：我正打算盖新茅屋，可以聘他做工人。大家都不伤感情，而且他抹泥一定比烧菜好。

除了对仪式感兴趣外，这次的头颅祭也让我有机会再访卡潘老人，因为祭典就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举行。和平日一样，他被众多随从包围，有人为他打红色洋伞，他则痛饮啤酒。他迫不及待要比较我们的假牙，确定他的假牙比较高级后，他龙心大悦，邀请我一个月内再访，他会派人通知我。

雨季差不多结束了，未来五六个月都不会再下雨，真是一大安慰，我向来讨厌下雨。回程路上，我们却碰上可怕的暴风雨。先是山头传来小小的声响，接着变成闷雷巨响。天上出现巨大云层，在山头旋卷。我们显然来不及回到村子，就会碰上大雨。狂风奔过平原，斯扯绿草、拔下树叶。马修不认为这是普通暴风雨，而是祈雨酋长发威。我必须承认：如果我不是固执偏见的西方人，可能会同意他的看法。暴雨如鞭，不到两秒钟，我们便全身湿透了，瑟瑟发抖。狂风的摧残也非常惊人，连身上的钮扣都被扯掉，我们被迫在独木桥旁暂停。这座桥是剖开的树干，上面长满青苔，横跨四十英尺的峡谷。我们绝无法在狂风中穿行此桥，只能坐下来等待。马修害怕卡潘老人会指挥雷劈死我们。我告诉他白人不会被雷劈，他紧跟着我就没事。他马上接受我的说词。西非洲显然是全世界雷殛意外最多的地方。我还记得自己边躲雨边想，此地车子都有一个“摩拖

约”(motcujo)，他的工作就是专门捆绑车顶的行李，或者爬到车顶替乘客卸货，所以“我的马车夫被雷打死了”@这句话可能最适用于此地。

暴风雨终于逐渐停歇，我们回到村子。故事迅速传遍全村，一整个晚上，我都和人闲聊祈雨酋长种种。一夕间，他就成了村人可以和我公开讨论的话题。

有些多瓦悠人已经开始收割小米，虽然收割季尚早，但我该去田里

四处打转了。收割小米必须建打谷场，是在泥地上挖一个浅洞，棚上泥巴、牛粪和荆棘类植物，形成硬地。

为防妖巫作怪，必须使出尖刺物法宝：蓟、小米梗或竹梗上的芒刺，甚至豪猪毛。割下的小米稻穗至少要晒干数天，才能打谷。打谷非常辛苦，硬壳乱飞，颇伤皮肤，就连一身厚皮的多瓦悠人也刺痕累累。他们轮流打谷、喝啤酒，不顾体面大肆搔痒。我对打谷场特别感兴趣。打谷场在其他文化里，都是推敲象征体系的焦点，多瓦悠的打谷场也有许多复杂禁忌。我已经知道他们有所谓“真正耕耘者”的特殊阶级，负责打谷场的各种防范措施。两周后，其中一个“真正耕耘者”要收割小米，我安排好了去拜访他，届时就知道他在文化体系里的位置。我和村里女人混得颇熟，她们是不错的消息来源。据她们的说法，触犯禁忌将影响生育能力，怀孕妇女绝不能进入打谷场，这和我想的完全背道而驰。多瓦悠文化里，人的繁生与植物丰收交互影响，而且是好的影响。譬如女孩初经来潮，必须被隔离在小米磨坊。又譬如，惟有姻亲可互赠发芽的小米。铁匠阶级不能与一般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也不能踏人女人的小米田。换言之，小米的生长周期与女人的性发展有许多阶段性平行关系。据此，我认为生孩子与打谷应是对称关系。如果治疗难产是将产妇放到打谷场中央，那就完全符合我的模型。

怀孕妇女不能进入打谷场，着实令我困惑良久。约翰外出时，我甚至向他借了办公室一天，坐在里面端详我的笔记，试图找出哪里错了。如果我的模型不成立，我前面解开的多瓦悠“文化图像”必须重新来过。

我决定找我最喜欢的资料提供者玛丽约（Mariyo）聊聊，她是朱迪波的三老婆。自从我的药治愈酋长的弟弟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基于几个原因，我对她颇感兴趣。首先，她住在我的茅屋后面，我无法不注意到她的屋子入夜后便传出连串屁声、咳嗽与震天价响的打嗝声，对她深感同情，终于有个多瓦悠人的肠胃和我一样烂。一天我向马修提起此事，他放声尖笑，跑去和玛丽约分享我的最新蠢行。不到一分钟，她的茅屋传出尖声大笑，笑声从一间茅屋传到另一间茅屋，让我能掌握笑话的传播速度。马修终于回来，笑得眼泪都掉出来，几近虚脱。他带我去玛丽约的院落，指出正对我茅屋背面的小屋，里面养着一只山羊。我对山羊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排气的声音很像人。经此事件后，我和玛丽约便发展出戏谑关系，可以相互欺骗愚弄。多瓦悠社会有不少戏谑关系，对象可以是特定的亲属阶层，也可是互有好感的人。戏谑关系有时非常有趣，有时则十分乏味，因为它完全不考虑你的情绪。

因为我与玛丽约的戏谑关系,她成为较无防范心的资料提供者,也愿意接受我对“开玩笑”与“问问题”的严格区分。在我认识的多瓦悠人中,惟有她大约知道我在干什么。一次我问她女性死者的水瓮仪式里,死者的女亲属头发剪成星形,她们在其他场合也做这种打扮吗?她说不。其他多瓦悠人的回答一定到此为止,但是玛丽约却会主动加上:“男人有时会。”然后告诉我哪些场合男人会把头发剪成星形。因为多数多瓦悠女性仪式只能视为男性仪式的蜕变,这给了我一些解释线索,也打开新的探索领域——身体装饰与瓦瓮装饰的对称关系,以及哪些当地观念让女人被视为有缺陷的人。

我从别的女性资料提供者处听到怀孕妇女不能进入打谷场,我很好奇玛丽约的说法会是什么。我缓慢推进问题。打谷场用什么做的?在打谷场干什么?有什么禁忌吗?什么人不可以进入打谷场?她也回答说怀孕女人不可以,但是加了一句:“至少,胎儿还没有足月前不可以。”如此一来,观点完全不一样了。她继续解释,怀孕女人进入打谷场可能会早产。我的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终于保住了。人类学门外汉绝无法体会这么个小消息所带来的满足。多年的单调苦读、数个月的生病、孤寂与乏味、连续数小时的蠢问题,统统值得。人类学领域里,假设获得证实的机会很少,理论模型得以确立正是我亟需的士气提振。

但是一如非洲常态,秩序井然的工作必遭无数琐碎小事打断。我必须停工一天,对入侵茅屋的各种生物宣战。蜥蜴,我能忍受。它们在屋顶上奔跑,倏忽来去屋梁。惟一的不便是它们喜欢大便在你头上。山羊则是永恒的诅咒,你必须学会防范。我与一只公山羊长期对峙,它最爱在半夜两点溜进我的院落,在锅炉上跳来跳去。赶走它,只能保证一小时安静,之后它又溜回来,用后蹄踢翻我的煤气灯贮气瓶。最糟的是它一身骚臭。多瓦悠山羊臭到极点,如果你在森林里追踪山羊,根本无法凭气味判断它是否十分钟前才打此经过。靠着贿赂酋长的狗儿波尔斯,我终于打败这只山羊。波尔斯狂爱吃巧克力,每晚给它一小块,便足以诱惑它整晚守在我的茅屋前赶山羊。后来波尔斯招来老婆、小孩,变成家族事业,迅速消耗我的巧克力库存。多瓦悠人每次看到我的狗随从们浩浩荡荡跟我深入丛林,都觉得好笑,还给我取了“伟大猎人”的绰号。

白蚁也时时威胁纸张,它们有种狡猾习惯,会从书本里蛀起,吃光里面的纸张,直到整本书只剩薄饼般的外壳。小小的化学战便歼灭了它们。

老鼠比较恼人。它们固执拒绝我的食物。和多瓦悠人一样,此地老

鼠也只爱吃小米,此外就是我的橡皮管,一晚上便啃光滤水器管子。它们合力攻击我的相机。老鼠最讨人厌的一点是行动笨拙,冲翻碰撞东西。它们的命运终于在某个恐怖夜晚决定。那晚我在黑暗中突然惊醒,发现胸前有东西蠕动。我动也不敢动,深信躺在我心脏上方的正是致命的绿色非洲树蛇。我暗自估算它的大小。我该静躺不动,祈祷它走开吗?不幸,我睡相很差,万一不小心瞌睡着了,翻身压到它,岂不是致命大祸?最后,我决定上上策是默数到三,一跃而起摔掉它。我数到三,大叫一声,纵身往旁边一跳,膝盖狠狠打到床沿。我以自己都不敢置信的精确灵巧,一把抓起火炬照向我的攻击者。就在屋梁上,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老鼠瑟缩呆立。我觉得万分羞愧,直到第二天上午,我发现它居然企图啃食我的假牙。这个发现让我硬起心肠,到村里搜罗捕鼠器,一晚上就杀了十只老鼠,全进了村里孩子的肚子。

比老鼠更烦人的是蝉。多瓦悠山区有上千万只蝉,愉悦鸣叫,形成热带非洲的夜晚氛围。但如果只是一只蝉困在你家,准叫你发狂。它们有一种怪习惯,总是密藏在小缝隙里,光凭叫声,很难判断它的所在。白天,它们静默无声。晚上,便发出刺耳恼人的尖叫。惟一办法是用杀虫剂整片喷洒,过一会儿,或许会出现咳嗽不已的蟑螂、喘不过气来的苍蝇,以及晕头转向的蚊子。这也只能让它们逃出屏障,头晕目眩在地板上疾奔,你再用重物至少狠狠拍打十下,才能摧毁它们。连续数夜失眠后,执行死刑所需的暴力与怒气会自然涌生。

但是真正激怒我全面宣战的是发现蝎子藏在置放鞋子的茅屋墙角。毫不知情下,我拿起鞋子,大惊看到一只巨大的蝎子从鞋里冲出,朝我攻来。我完全不像男子汉,失声尖叫,退到门口。门外站着一个约莫六岁的多瓦悠孩子,挪揄地望着我。紧张让我失去语言能力,一时忘了蝎子要怎么说。我用类似旧约圣经的言语大叫:“里面有个刺辣的畜生!”那个孩子朝屋内望,深深鄙夷,赤足踏扁那只蝎子。(为了各位的福祉,我必须提醒大家:蝎子虽甚少使人致命,但是蝎螫十分刺痛。最好先用冷水浸泡患部,然后服用治疗花粉热的抗组织胺。)

多瓦悠人总是讶异我万分畏惧蛇与蝎,却不愿开车辗毙最恐怖的鸟一猫头鹰。他们还曾看到我抓起变色龙放到树上。众所周知,它含致命剧毒,好几个孩子因此患病,真是笨蛋行为。我惟一有用的愚行是敢触摸食蚁兽的爪子。多瓦悠人不能碰触食蚁兽的爪,碰了,终身阳具都会软瘫无力。食蚁兽的爪子也可用来杀人:放入面包树的果实里,喊出被害人的名字,果实成熟落地,对方就死了。如果有人猎到食蚁兽,便会公

开召唤我，当众将爪子交给我，以示对族人并无恶意。我必须将爪子带到山头，埋到人迹罕见处。

多瓦悠人颇感激我扮演的宇宙污染控制官的角色。我从旅人处得知“真正耕耘者”的小米尚未收割，所以我有喘息时间观赏最新娱乐——孔里的选举。副县长宣召所有村人于某一天、某一地点集合，他要向大家说明此次选举。结果，他根本没现身。让村人在那里呆等了两天，才陆续回到田里干活。数天后，村里来了一个“古米赫”。这些讨厌鬼是退役军人，受聘中央政府，负责压制宪兵无力维持秩序的顽强村落。每当“古米赫”光临一个村落，便长时间霸占民宅，白吃白喝，尽情指使主人。有些地方，民众不知道也不懂得珍视自身的权益，让“古米赫”为所欲为。这次，“古米赫”是来确保投开票所的设立。多瓦悠人对全国性政治不感兴趣，投票热情必须激发。

所有多瓦悠男女必须在指定时间去投票。酋长的责任是确保投票顺利，马尤谦卑地扛起责任，朱迪波则坐在阴凉处发号施令，指挥大家做事。我坐在他旁边，两人针对通奸有了一番精辟讨论。他说：“拿玛丽约来说好了，大家都说她和我弟弟上床。但是你看到我弟弟生病时，她多么焦急。这证明两人并无暧昧。”对多瓦悠人而言，性与爱毫不相关，甚至还互斥。我明智点头表示同意。向他解释性爱还有其他固向，是徒劳无功之事。

投票处，民主程序热烈展开。一个男人没把妻妾全带来投票，遭到斥责。“她们不肯来。”“你就该打她们一顿。”我问了几个人此次选举是干嘛？他们茫然以对，解释说：你带身份证来，把身份证交给那个官员，他在上面盖章，帮你投票。我知道，但选什么呢？他们又茫然以对，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带身份证来……。没人知道这次选举是干嘛，也不准投反对票。选了一天，官员觉得投票数不够，把大家叫来再投一遍。选举结果出炉那天，我正好在戏院看到新闻片，官方宣布喀国惟一政党推出的惟一候选人赢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戏院观众在黑暗的保护下发出嘲弄嘘声，我觉得这才是健康表现。

但是村里人人都把投票看得万分严重，一切照规定来。身分证细心查验，橡皮章一点不差地盖在身分证的投票格内，村人的投票率务必精确计算，选举人册从这个官员交给另一个官员，每一道关卡都得签收。大家似乎不觉得费力盯紧琐碎细节与明目张胆忽视民主原则之间有莫大矛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校。他们全部精力都花在一套不可思议的官僚标准，用以决定哪些学生可以升级，哪些要留级一年，哪些又该退

学。他们使用这套神秘公式计算学生平均成绩的时间，大约等于教学时间。但是到了学期尾，校长又独断决定学生成绩太差，统统加20分。或者收了家长的礼，擅自更改学生成绩。也有可能政府决定不需要这么多学生，宣布考试作废，变成大闹剧。看到宪兵背着轻机关枪守护考卷，你真会忍俊不住，因为几天前便有人打开试卷封套，偷偷将题目卖给出价最高的考生了。

结束选举插曲，该是我去探望“真正耕耘者”的时候了。到他那儿，必须步行20哩山径。天气一天热过一天，我徘徊在晚间出发比较凉快，还是等白天搭人便车。最后我选择搭便车，运气不错，碰到一个来往两个教会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他好心载我们一程，听他发表多瓦悠文化高论，旅途颇为愉快。这位神父的理论直攻“性压抑”，一切都和“性”有关。男人被杀后竖立的木叉，一边是阳具，另一边是阴道；割礼的紧张代表他们对阉割的深层疑虑；他们谎称割礼是用牛皮缝合肛门，显示这个民族有肛门妄想。看来，这位神父不仅读了心理学教科书，还读了一点人类学。仔细想想，他这番理论显示他读过一点有关多冈（Dc. m)人的文献。多冈是马利共和国里知识水准最高、最喜欢自我分析的民族。谈到多瓦悠人，他摇头叹息。他与多瓦悠人相处多年，至今他们仍不肯告诉他族人的神话和原初之蛋(primal。銘)，在他发现多冈人不似法国人后，简直无法接受多瓦悠人也不像多冈人。

他说，你无法否定这个论点，无所不在的潜伏性欲和非洲文化的性自制氛围绝对脱不了关系。或许过于仰赖圣经，会让人深信所有真理都在一本书里。对某些人来说，文化相对观(culturalrelativism。是很难接受的观念，尤其是信仰坚定者，不管他是神职人员、自满的拓荒者还是德国义工。一位德国义工曾一语道破他在喀国的三年真相：“如果原住民没法吃这个，干他的，他们可以卖给白人，我才不管。”

我们的目的地是个荒凉村落，位于坚硬的花岗岩山脚下。

这么薄而干炙的地面能种出植物，真是奇迹。这里的气温与“我们那儿”落差颇大，马修和我迫不及待跌坐树阴下凉快，村人则帮我们去找人。

“真正耕耘者”现身，是个枯干瘦小的男人，一身破烂。他根本喝得烂醉，现在才上午十点呢。我们行问候礼如仪，人们拿来草席让我们坐下c正如我畏惧的，他们开始准备食物。我颇能接受多瓦悠的怪诞膳食，包括山药、花生，甚至小米。不幸的是，当我拜访陌生村子，按照习俗，他

们必须招待我吃肉，以示尊敬。既然他们不会为了取悦我特地杀头牛，送上来的一定是那种吊在炉火上、断断续续不知熏了多少时日的肉。撒上酱后，便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

幸好,观看陌生人吃饭不礼貌,马修和我必须退到某间茅屋进食。我大可拒吃主人奉上的佳肴,不致得罪他们,躲到墙角思索其他事情,让马修一个人吃两份。

趁他们炮制熏肉大餐的时间,我开始与主人随口闲聊,问些我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正如我担心的,他的答案闪烁,半真半假。此外,他还不确定是不是马上要举行丰收祭。或许,他可以安排明天举行,或许不行。理想上,田野工作者应拒绝与这种人打交道,只与那些礼貌、友善、慷慨的人往来,他们会认为回答人类学调查员那些无意义、紧迫钉人的问题,是件有趣又有益的事。不幸,这种人很少。多数人不是有其他事要忙,就是很快便觉乏味,被问话人的愚蠢惹恼,或者倾向给你好听的答案而非实情。面对这些状况,最好的策略就是贿赂。一点点钱就可使人类学者的探索变成值得投入的活动,打开原本深锁的门。今天的状况亦如是。一点礼物便保障丰收祭会尽速举行,绝不拖延,而且我可以从头参观到尾,他现在就去准备。当他摇摇摆摆走开,他的某个老婆端来巨大一盘熏肉。

尚未吞下一口刺鼻熏肉,我们便听到挥舞镰刀的声音,开始收割小米了。马修小声透露“真正耕耘者”急着讨好我的原因。快要缴人头税了,他可以用我送的礼去缴税,省得,和那些有需要的亲属分享。

田里整天都在忙碌,我坐在一旁观看,急着想和工人说话。多数时候,我们都言语不通,显示我对多瓦悠语的了解非常区域化。我们的谈话经常陷入漫长尴尬的沉默,你无法对无言的陌生人大喊:“说点什么吧!”这有违多瓦悠的习俗,保证驱散所有谈话念头。

田里的男女工作一整天,弯腰割稻时,汗水像小河似地流下脸庞与胸膛。田里,小米梗飒飒翻腾,地面上,彩色稻穗堆积如山,约莫10到11英尺高。他们偶尔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或者和我一起抽烟。我的旁观并未带来困扰,他们反而担心太阳的方向是否让我不适,会不会太热了。大家都在猜测今年的收获量。收获就摆在眼前,估算有何困难?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以一种未来式谈论收成,好像缺乏精确实据足以判断。小米倒下的方向象征收成好坏,稻穗高及男人脚裸又代表什么。他们极担心妖巫会在最后一刻抢走收成,或者让好小米变坏,怎么吃都不

饱。为防破坏，堆放收割小米的地方竖起层层尖刺物，对付前来掠夺的妖巫。奇怪的是，两名工人踩到竹刺流血，却未被视为恶兆。“真正耕耘者”的数名兄弟在营火旁交头接耳，据我猜测，是在讨论深奥的巫术秘密。我派马修送上烟草，刺探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在讨论我的头发抹了什么药草，才这么直而细。

女人喜欢这样的头发吗？白人为什么不顺其自然，照上天打造我们的样子维持黑又卷的头发？

此次收成动用10到15名工人，全是“真正耕耘者”的兄弟与儿子。不到一天便收割完毕，工人退下去休息、吃饭。

远处传来歌声，我循声而往，来到几哩外的山头，看到女人的葬礼。死者已经用兽皮与尸布包裹，要从丈夫的村子送回父亲的村子下葬。出殡队伍必须经过山间小径，让害怕黑暗的多瓦悠人更添恐惧，急着在太阳下山前出发。马修跟我保证天亮前田里不会有事，我便放他跟随出殡队伍，履行亲属义务。我站在璀璨的红色夕阳下，肚皮因整天未进食而咕噜作响，看着出殡队伍高举临时做成的担架，边唱边跳，烟尘滚滚地出发。当他们爬上夕阳余晖的山头时，暮色悄然淹没村子。田里突然爆出一阵歌声。有事了。

我一直不知道是村人的狡猾、误解，还是马修搞鬼，我才被排除在这个仪式外。这种事情问得越多，越不可能得到答案。根据我先前参加的丰收祭经验判断，我尚未错过重头戏。男人全聚在打谷场，女人与小孩除外。各种预防妖巫的植物放在小米堆上，男人齐唱女人不准听的割礼歌曲。没人在乎我的现身。打谷仪式开始。男人全身赤裸，只着阴茎鞘，一边打谷一边缓慢舞动。他们右手高举一支木棍，左手握紧右手，用力挥打稻穗。然后往左移一步，重复同样的打谷动作。连续数小时，他们不停吟唱，伴随木棍敲打小米穗的齐声闷响。月儿浮现天空，打谷节奏仍不停歇，米糠四处飞扬，粘在汗湿的身体上。即使夜色已深，地面辐射出来的热气依然令人窒息。

接下来我便什么都知道了，张开眼已是天亮。男人还在工作、吟唱，靠大量啤酒撑精神。我则四仰八叉躺在石头上，屁股因靠到荆棘而疼痛不已。喝了大量啤酒的宿醉感好似一整晚畅游英吉利海峡。我被一只山羊惊醒，它已吃掉我带来打发时间的二次大战德国潜水艇舰长自传，又努力啃食我的田野笔记。幸好，我学会多瓦悠人将重要物品挂在树上的习惯，检查后，只有鞋带被啃掉一半。我断然赶走那只羊，回去加

人那些男人，现在仪式已进行下一个阶段，替打过的小米吹糠。男人们互相打趣说笑，显然不仅是亲戚，有的还是同一批接受割礼的人。一个男人大叫：“今天没风，我们要怎么吹糠？我们必须一起放屁。”他将小米穗高举过头倒人篮子里，糠皮四飞。他的话引起众人歇斯底里狂笑，连我都受感染。吹糠工作快速进行。有人剁下鸡头丢人小米堆，并煮了当地人称为“蝎子食物”的野山药，从四面八方丢人小米堆中。我的主人身穿庆典服饰，从村里被请了出来，抓起小米堆人篮子里，篮上挂着一顶红色的富来尼帽。他快步奔回村里。当第一批收成倒进高大、圆锥形的谷仓后，整批收成都安全了，不受巫术伤害。

我无法精确说自己是何时开始分析资料的，但是一点一滴，它们逐渐拼凑成形。我确信刚刚看到的那幕只能用割礼模型来理解。我听过不少割礼的事情，知道打谷过程是遵照“打死富来尼老妇”故事的结构。

一个富来尼老妇有个儿子，他生病了。他在斯克草中奔跑，割伤了自己。阴茎变得肿大，里面都是脓。富来尼老妇拿出一把刀割他的阴茎，他就好了。阴茎变得漂亮。她又割了第二个儿子。有一天，她散步经过多瓦悠村落，多瓦悠人看到割过的阴茎很美好，便将老妇打死，夺走了割礼。他们不准女人观看割。但是富来尼女人可以看。故事结束。

好几个场合会重复搬演“打死富来尼老妇”的故事，最重要的便是男孩割礼。扮演老妇者呻吟走在路上，多瓦悠人则潜伏突袭。她从他们身边走过两遍，第三遍时，多瓦悠人一跃而出，乱棒将她打死，割下她身上的叶子。男人堆起石头，上面挂着篮子与老妇的红帽，之后，他们便唱起割礼之歌。女人与小孩都不准在场。

“蝎子食物”点出其他连结，特别是祈雨酋长主持的繁生仪式。在每年的收成首度送人村子前，必须先举行某些仪式，否则蝎子会侵入茅屋攻击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蝎子跑进我的屋里，是因为我愚蠢触犯上述禁忌，将外面的食物带进村里。将“蝎子食物”丢到收成上，是让蝎子分心留在丛林里。正如头颅祭时泼洒山豪猪的排泄物，是让危险的祖灵远离村子。后来我才知道“蝎子食物”也和人的仪式有关，譬如女孩初经来潮与男孩割礼后。因为这个关连，我才能确定快要成年的男女被视为即将收成的作物。多瓦悠人会特意安排受完割礼的男孩与新收成同时进入村子，显示两个仪式模型相同。

我在村里又待了一天，确保没有仪式还要进行。我那任性的助理天黑才回来，衷心忏悔，为表歉意，他偷偷让我看可以让女人流产的巫术

石。怀孕妇女为求生产顺利，必须付钱给石头的主人。他的家族靠着这颗威力强大的石头，收入颇稳定，但不及前面那个人家，他们的石头可以让人下痢。多瓦悠人不敢让传教士知道这些石头，因为曾有一位法国副县长下令传教士摧毁巫术石。多瓦悠人相信这位副县长的真正目的是将石头据为己有，大发其财。

第二天我们跋涉回孔里。在这趟冗长乏味的旅程里，惟一的意外是我在渡河时失足，一头栽进深水裡，浸湿了所有我在丰收祭拍的底片。令我沮丧到极点。从物质角度来看，这趟探险并不成功：底片没了，笔记也完了。但是，照片与笔记不过是（也应该是）激发概念的工具，我脑中已有几个想法了。

为了犒赏自己，我走访教会，待了好几天，直到周五取信日。

数日不曾梳洗、天天睡在草地上，又吃得不好，此刻能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洗个真正淋浴、吃顿像样的饭，实在太棒最棒的是能够和人聊天，甚至还听到新闻。多瓦悠人过着几近“山中无甲子”的生活，从不知什么叫新闻。

副县长要滚蛋了！

消息指出，在副县长统治波利14年后，终于要改朝换代了。当我回到孔里，大家都对此条新闻兴奋震惊不已。村里弥漫一股嘉年华气氛，男人群聚狂饮庆祝“宿敌”终于滚蛋。这是收集闲言闲语的大好时机，他们迫不及待告诉我副县长过去的诸种恶行。村人决定派人前往波利打探最新消息。朱迪波说他愿意协助副县长搬家，甚至愿意帮他把家具扛到十字路口呢。我听说副县长听到调职命令后，曾到多瓦悠村落找人施法改变命运。村人甜蜜微笑，遗憾答说作法植物都死了，爱莫能助。另一个打城里来说，他曾和副县长的仆人隔着卧房窗子说话，他的主人一点东西都不肯留给这个年迈仆人呢。他穷得连件衬衫都没有，副县长还命令他烧掉所有拿不走的衣物。这段话引起公愤。我已预见将来告别孔里时，必先满足他们的期望。

访客川流抵达，不断增添珍贵的讯息。最后是奉朱迪波命令骑脚踏车去采买啤酒、打探消息的贾斯廷。他看来有点惊魂未定。多瓦悠人喜欢说故事，贾斯廷逮到了机会。大家全坐到营火堆旁，我则坐到远处。

贾斯廷说，波利镇人人喝得大醉（朱迪波顿时露出艳羡颜色），人事

不知。有人看到副县长在打包,他则到市场看看有没有新消息,谁知市场挤满从监狱出来的囚犯。波利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狱卒认定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就把他们放出来,自己好去喝酒钓鱼。贾斯廷骑车经过市场时,两个男人正在攻击一个多瓦悠女人。那个女人尖叫:“这下你们可好了,我丈夫来了!”两名恶棍放开她,扑向可怜的贾斯廷。那个女人趁势逃跑,放声大笑。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好笑极了,贾斯廷也为自己的倒楣遭遇捧腹不已。这个夜晚遂以狂欢骚闹收场。惟有朱迪波郁郁不乐,那两名歹徒偷走了他买的啤酒。

译注

①本章的原名为“RUes andWnmgs”,有双关语含义,“仪式”(rites)——字在发音上与“正确”(rights)相同,因此章名亦有“正确与错误”的意思,扣合本章所述:作者在探讨多瓦悠仪式所反映的宇宙观时,犯了许多错误,也有不少正确判断。

②chief一字,我们一般翻译为酋长,代表握有政治实权的人,但是在人类学里,chief有很多定义。根据芮逸夫主编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chief译为首领,它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土语称谓,此一名词可指(a)公认为保有惟一优越地位的人;(b)资格上具有社会所称许的优越成就之个人;(c)少数保有世袭阶级头衔的人;(d)具有头衔的元老,他们有优先规定头衔继承顺序以及处理争端的权力;(e)具有特殊但非惟一的祭仪职位者,譬如非洲努尔人的豹皮酋长;(f)凡被欧洲殖民政府授以行政权的人,通常都称为chief,不管他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何。

依据本书作者所述,多瓦悠社会并无一般定义中握有政治实权的酋长,孔里便至少有三位以上的首领级人物。一个是朱迪波,他原先在社会结构里是个Waari,也就是拥有许多牛只的人。另一个是卡潘老人,他是祈雨酋长。还有一个便是政府册封的马尤。

③经译者去信向作者奄询,此句话有典,语出老牌影星狄鲍加的自传第一册书名。狄鲍加回忆年幼时学外国语,曾在常用辞汇里读到“我的马车夫被雷打死了”,觉得这句话一点用处都没有,遂用作自传书名。

④许多神话论及万物起源,不少神话以万物系从原始的混沌演化而出,有时即以此混沌形如鸡蛋。

⑤文化相对观是一种伦理学的主张,强调文化是不同且各具特性的,包含了不同的期望与理想,因此只有从该文化本身的标准及价值才能了解及评量该文化。

第十一章 雨季与旱季

旱季真的降临,大地焦干,变成短草覆盖的荒地。多瓦悠人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除了有灌溉系统的高山区,其他地方都休耕,直到下个雨季来临。男人致力饮酒、编织、呆坐无事,偶尔出去狩猎;女人捕鱼、编篮、制陶。年轻男子则到城里寻找打工或干坏事的机会。

我脑中有几个计划,都得等圣诞过后再说。此刻正值岁时祭典的低潮期,留在多瓦悠实在太沮丧了,所以我约了约翰、珍妮到恩冈代雷教会共度佳节。我们过了简单清新的圣诞,比我印象中的圣诞更具宗教气氛,但是宁静与狂热交错跌宕。华特更是狂热,全副精力投入节日庆祝。我们肆无忌惮喝到烂醉,努力忘记窗外并无厚雪,空气并非凉爽。此次圣诞当然也有沉重时刻。某位魁梧的异乡客看到主人端出冰淇淋,居然感动落泪;目睹芒果干与香蕉干制成的圣诞蛋糕,另一个客人也大为感动。看了太多闪烁的圣诞灯火,我莫名其妙€疾发作。一星期后,我精神纒,满载粮食返回孔里,开始建屋工程。建屋麻烦得要命。一会儿地太湿,隔一周又变得太干。-会儿没有桶子可装水,接着铺屋顶的草还没好。监工不是生病、出外访客,就是要加价。

合约条件,包工已装模作样谈判过三回。如果我不多付一点,就必须为嗷嗷待哺的小孩、哭泣的老婆、哀伤的男人负责。如此数星期,我决定采用多瓦悠人的方式,请酋长召开法庭仲裁。

多瓦悠法庭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在长者面前,女人与小孩必须谨遵身分规矩。庭讯开始,村人便聚集村口圆形广场的大树下,随即展开冗长无意义的讨论。诉讼双方雄辩滔滔,倾诉自己的痛苦。接着传唤证人,围观者均可质询证人。酋长虽不能强制仲裁,当事者却能感受舆论压力,通常会接受酋长的调停。否则案子就得送到波利镇,接受外人的仲裁,还要蒙受骚扰地方官被判刑坐牢的风险。

基于多瓦悠语能力不足、对法庭程序陌生,我照着马修为我准备的讲词简单说明自己的告诉,讲词结尾是:“在多瓦悠人中,我不过是个小孩。我委请马尤替我解说事情原委。”马尤进行得很顺利,将我的对手勾勒成没良心的坏蛋,欺负我没亲没戚,看我天性善良就说诈我。辩论

你来我往,我则摇晃身躯,不时呢喃广就是如此。这样很好。”最后我答应付两倍价钱,大家都满意了。我必须强调这不代表我被敲诈。多瓦悠富人做什么都得付钱,否则便是对族人不义。有了这个经验,我都让马修采买东西,虽然我知道他会从中抽取回扣,结算下来还是划得来。新屋落成,连花园与遮阳台,共花了我14英镑。

当天另一个案子则呈现多瓦悠法庭的典型功能。一老者指控某年轻人偷了他一袋小米。老者说年轻人从他的谷仓里偷走小米,男孩矢口否认。老者遂破对方家门而入,没找到小米,只找到他宣称属于他的小米袋。开庭时两造互相侮辱,观众兴奋不已,加入侮辱阵容,口出更荒谬的谩骂。“你屁眼长刺。”“你老婆的屁闻起来像烂鱼。”最后大家忍不住大笑,诉讼双方亦是。

某男子声称看到男孩侵入老者的谷仓,但是他没出庭。酋长宣布休庭,下次要听证人证词。下次开庭,男孩与证人都来了,但是原告没来;证人说他什么也没看到。第三次开庭,有人提议神判:男孩将双手伸入滚水捞石头,随后包扎双手,一星期后,手伤如果痊愈,他便是清白的,老者必须赔偿他的损失。老者不接受此提议。男孩随即要求老者赔偿撞坏的门。老者否认破坏他的门,是男孩自己弄坏门,借此侮辱他。酋长宣布休庭,下次要宣证人。第四次开庭,证人来了,但是原告与被告都没出席。案子就此无疾而终。

自始至终,两造对对方似乎都无真正恶意。

对多瓦悠人而言,法庭是公共娱乐,因此不吝芝麻小事都要告上法庭。我另一次出庭机会是被当地人告上一状。人类学文献经常记载田野工作者不被当地人接受,直到某天他拿起锄头,开始辟菜园,境遇才获得改变。多瓦悠人可不是如此。每当我试图做点劳力工作,他们便大惊失色。如果我去提水,颤巍巍的虚弱老妇会连忙替我提水瓮。当我想要辟菜园子,朱迪波吓坏了。我干嘛要做这等事?他绝不碰锄头。他会找人帮我种菜。所以,我有了一个园丁。

这个男人的菜圃就在河边,旱季里也可以种菜。他拒绝讨论报酬,我应当等到收成后,再依他的工作好坏决定酬劳。这是多瓦悠人的常用伎俩,迫使主人出手慷慨。我给他一些朋友寄来的种子:番茄、小黄瓜、洋葱、莴苣等,要他每样种一点,看结果如何。

我差点忘了此事,直到一月底,园丁通知我菜园收成了,可以前去

一看。那天热气氤氲，即便以旱季而论都异常炎热，大地烤成棕焦色，深深龟裂。但是深入丛林步径两哩，就是一个绿色洼地。走近一看才发现是沿河岸辟建的梯田。显然这是艰难工程，雨季一来，梯田便会冲毁不见，第二年还得重来。园丁现身了，当着我的面给所有作物浇水一遍，一面夸张拭汗，确保我明白大热天工作的辛苦。他说他到处收集黑泥与羊粪送来此处，每天耐心给幼苗浇水三次，看守它们不被动物践踏。虽然红萝卜给螳虫吃了，富来尼人放养的牛只踏坏洋葱，但是保住了莴苣。横在我眼前的就是，整整三千棵，同一时间播种，再过一个星期便全部熟透。

他夸张比划：这些——全是您的。我必须承认，我被从天而降的“北喀麦隆莴苣大王”头衔吓得说不出话来。我绝无可能应付这么多绿色蔬菜，我连拌生菜的醋都没呢。

接下来几个星期，从未有人像我吃了那么多莴苣。我送了一些给教会，波利镇官员也大啖我的奉献。多瓦悠人收到我的赠礼，觉得十分有趣，拿去喂羊，因为不适合人吃。我说服园丁把莴苣拿到市场贩售，成绩不佳。最后我们因我该付他多少钱起了争执。原先我只想辟一小块经济实惠的菜园子丰富我的菜色，对此结果甚为不悦。我说要付他5000中非法朗买下我能吃的莴苣。他可以保留剩下的莴苣，卖到城里。他坚持我该付他两万法朗，毫不让步。

我们的争执闹上法庭，莴苣继续生长、熟透、腐烂。我依据马尤建议我的法律程序，给酋长送了六瓶啤酒，帮助他深思审议案件，我的对手也送了六瓶啤酒。

在广场的中央大树下，案件辩论许久。我坚持自己的论点，那些收成对我毫无用处，我从未叫他一口气种3000棵莴苣，而是不同种子各种一点。我的对手坚称无论如何，他做了多少工就应得到多少报酬。我们不断重复相同论点，直到力竭。最后酋长介入，裁定我应付一万法朗。根据以往经验，一个人不能轻易答应任何条件，我现出犹豫之色，终于点头同意，说我不希望园丁难过。园丁勉为其难接受，说他也不希望我难过，为了表示感激我的慷慨，他要退给我一半的报酬。所以他最后拿的就是我原先提议的金额。大家的尊严都保住了，皆大欢喜。我始终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能解释。

我与法庭的交手经验让我想到法律案例可能成为有用的历史资料。在英国时，我曾在古老的殖民地期刊里读过一些此地的法律案例，资料

相当有用。能找到这类资料的地方是波利。我好奇地想见新来的副县长，最好去拜访他，自我介绍一番。在村里校长的陪同下，我步行到波利镇。

这位年轻校长是巴米李克(Bamileke)人，他们有时被称为“喀麦隆犹太人”，充满爆发力与企业家精神，只要有企业、利润与生意的地方，就有他们。他们掌控许多行业，也是北方教师阵容的主干。他们派驻未开发地区，作为兵役替代。这位老师习惯在上午授课空档光临舍下，喝杯咖啡。他的谈话内容总是同一主题的变奏——北方的恐怖落后原始。他解释：“这些人就像小孩。你教他们洗澡、穿衣、分辨对错，当然他们觉得太难了，开始哭泣。但是到头来他们就会知道好处。这就是我们南方人在北方的工作。”

他会一连数小时滔滔解释为何需要教导北方人逻辑思考，想要逻辑思考，当然得学法语。有时我们静静啜饮咖啡，他会告诉我南方人对抗法国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帮助亲戚谋杀了一个白人老师。

新来的副县长矮小精悍，穿着富来尼长袍，两颊有深深的装饰留疤。多瓦悠人称他为“布威洛”，意指“黑皮肤的白人”。他才上台没多久，城里已展现新气象。办公大楼整修过了，新官邸有人居住。市场小贩被迫使用磅秤，货物必须标价。最惊人的改变是马路修好了，现在固定有巴士来往其他城镇。他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黑皮肤的白人”愉快迎接我，我们针对他的施政计划交谈许久。他说得一口流利法语，去过欧洲许多地方。他决定教化多瓦悠人，意指将他们变成法国人，像他经历的蜕变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富来尼人进来报告，打断谈话，副县长都坚持对他们说法语。他会找人帮我查阅法律案例，我还可以带走。我吃惊极了，从未有喀国官员如此愿意合作。

我们和善告别，他答应到我的村子探望我，因为他正在全县走动，视察辖区现况。我没把他的话当真，不期望任何官员会远离城里的舒适住所，但是我错了。他真的到孔里来看我，并巡视全村，提出尖锐问题。多瓦悠人震吓不已。富来尼官员光临就好像祖灵现身。当他离去时，以愉悦乐观的口吻指着村子说：“想想看，几年内，进步将取代这一切。

进步迹象已经出现。怎么说呢？今天我在市场居然买到莴苣。已经有人开始种了。”我喃喃不置可否。摧毁这种对未来的罕见信心，太不应该了。

西方人常讶异发现非洲人拥抱许多西方人早已丢弃的态度。40年代的殖民官员可能会同意那位巴米李克族校长或这位富来尼副县长的看法,但是这两位非洲人铁定不喜被相提并论。他们对何谓进步只有模糊观念,加上原住民常被刻划为固执、无知,为了原住民自身的好处,必须逼迫他们赶上时代,两者相加,就使这些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者连成一线。

不仅帝国主义的“优点”遗留下来,缺点也是,包括打着发展旗号实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全是这类场景的典型要件。这些帝国主义盟友也正是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我们不需全盘接受浪漫的自由派观点,认为非洲的所有优点都来自当地传统,所有缺点都是帝国主义遗毒。

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你可以是黑人又是种族主义者,虽然非洲部分地区仍保有奴隶制度,而且每当他们提及多瓦悠人,就朝地上吐口水,以免脏污了嘴。我曾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他的回答便是双重标准的例证。他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你看得出来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

富来尼人急着与周遭黑人划清界线。富来尼人又泛称恩博罗罗(Mbomra)人,他们听说南美洲有个民族叫博罗罗(BoroiD),因此认为自己与南美洲此民族有关,从南美洲播迁至此,统治殖民了此地的劣等民族。不少年轻人都向我提及这个类似海耶德(ThorHeyenlahl)?的播迁理论。他们说,这解释了他们的淡肤色、长而直的头发、挺直的鼻梁、薄嘴唇。他们痛苦指出我和他们一样,衣服遮盖处是白的,晒到太阳的部位呈棕色。

这个旱季里,最令多瓦悠人雀跃的发展是我的冰箱。我一直想买个煤油冰箱,每次进城都眼巴巴望着商店橱窗内的冰箱,可是我买不起,搬运也有困难,遂打消念头。但是荷兰语言学者废弃的研究站里就摆着一台煤油冰箱。一次我在恩冈代雷碰到他们,他们慷慨将冰箱借给我,真是鸿运当头。此后,我就有冰水可喝、新鲜肉可吃,终于可以减少对罐头食物的依赖,纾解我的经济困窘。我将冰箱放在刚铺好屋顶的漂亮茅屋外。我问工人为何我的屋顶没有尖刺物预防妖巫,他们觉得真是好笑,谁不知道白人不受巫术攻击,而且他的茅屋必须是方形而非圆形。我的便是方形,屋顶上没有尖刺物,只有空啤酒瓶。

约翰和珍妮前来庆祝,我们和兴奋的朱迪波一起喝冰啤酒。

我的“冰谷仓”是多瓦悠人眼中的奇观。煤油冰箱的原理令他们困惑(我也一样),为何“谷仓”里的火可以让东西变冷。我忍不住向他们炫耀冰块(只有见过世面的多瓦悠人才看过冰),他们怕极了。他们从未碰过这样的温度落差,坚称冰块看起来是“烫的”,摸它会烧伤手。我无法说服他们冰只是水的另一种形态。看到冰块在太阳下融化,他们会说:“冰东西跑掉了,只剩下里面的水。”连卡潘老人都因身为宇宙秘密的守护者,不得不前来观赏。

这使我和卡潘老人重新建立联系,提醒他曾答应让我去拜访。他说我可在下星期去找他,他会派儿子来带路。

出乎我意料,那个男孩居然准时到来,朱迪波坚持同行。

当我们首度抵达令人生畏的山麓时,在山径碰到不少山居多瓦悠人。我很吃惊此地女人都称我为“爱人”。打情骂俏是此地特有习俗。我们穿过漫长炎热、散布盐碱地的平原,牛儿和其他动物成排伫足舔食生存所需的盐巴。过了平原,我们开始攀高。每年这时候正午气温可达华氏110度(译注:约摄氏44度),马修和我汗流浹背。我随身携带的饮水,他拒绝喝;途中经过河,他也不能畅饮。我前面说过除非当地人奉水,平地多瓦悠人不能饮山地多瓦悠人的水。号称卡潘老人“儿子”者根本不是正牌儿子,只是远房侄子,无权奉水。山径穿过形形色色的树木,缓慢升高。无论哪个季节,走在这个山径上都有丧命或断手缺腿的危险。雨季时,攀爬岩石可以抓住草木,但是杂草覆盖地面,山径变成悬崖上的淡淡虚线,稍不小心便可能一脚踏空。

旱季时,你虽可看清地面,不致踏空,失足时却无草木可抓,修正致命错误。

沿途,狒狒在我们上方来回蹦跳,崩落的泥板岩不断掉到我们头上。脚下是惊悚的三百英尺的高悬崖,其下河水奔流绕过花岗岩大石,轰隆作响。朱迪波说他害怕失足,因为他不会游泳,我们都紧张发笑。数小时辛苦折腾,我们终于抵达一个景观优美的高原,可以鸟瞰整个多瓦悠以及远处的尼日利亚。正当我们以为步入坦途,山腹却开始出现深渊裂缝,惟有纵身跃过这些深坑,紧紧攀附对岸的泥地,才能维持身体平衡。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阴凉翠绿的山谷，山峰潺潺流下的溪河让山谷水源丰富。山峰底是一个相当大的院落，正是祈雨酋长的家。一群年轻女子出来迎接我们，全是卡潘老人的妻妾，围绕我们身边咯咯吵闹、大惊小怪。我们要坐在外面还是里面？要吃点东西吗？喝水还是啤酒？像白人一样喝冷啤酒，还是像多瓦悠人一样喝温啤酒？老人去远处田里治疗一位病妇，马上派人去找他回来。我们坐了约莫一小时，聊天、打瞌睡。传话人回来了，他去告诉卡潘老人我们来了，却发现他打另一条路去了波利镇。我们确信这是预谋行为，却只能以良好风度接受。在山区里，以我和马修脚程是万万追赶不上这位老人，也不必去找他了。朱迪波瞌睡醒来，说他梦到牛儿走失，必须赶回去看是不是真的，还是祖灵在他梦里作怪。我们只好下山回家。

从那时起，我开始大力结交祈雨巫师，说服他们与我分享秘密。所有专家——传教士、行政官员等——都深信多瓦悠人的无理顽固会让我一无所获。刚开始，我也这么想。

但是我发展出一套策略，一一拜访祈雨巫师，邀请他们路过孔里时到寒舍一坐，然后我无耻操弄他们之间的矛盾。我告诉蒙哥村的祈雨酋长：我之所以拜访他，是想知道有关“真正”祈雨酋长卡潘老人的事。当我见到卡潘老人，告诉他我搞错了，先前我以为他是真正的祈雨酋长，谁知道他对祈雨秘密所知甚少。或许他可以告诉我有关蒙哥村祈雨酋长的事？卡潘老人与蒙哥村祈雨酋长是死对头，我的矛盾手法正中要害。有一次卡潘老人经过我的村子，村人告诉他我去蒙哥村，已经两天没回来了。卡潘老人终于崩溃。我开始连续访问他。第一次访问，他说他的父亲也是祈雨巫师，为了我的问题，他四处探问，或许能回答其中一二个一般的技术问题。我刻意表现无尽感激，奉上丰厚之礼，虽然我的经济再度陷人窘况。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大约到山上拜访卡潘老人六到七次。

每次他都不全盘托出，只愿透露一点。我拿他透露的那一丁点去和村人查对，村人以为我知道很多，又脱口说出更多。当马尤与卡潘老人为了拖欠聘金起嫌隙，我逮到大好机会。马尤大大诋毁卡潘老人及他的工作，罗列他过去的种种恶行，譬如用闪电杀人、叫豪猪破坏田地等。就算卡潘老人降下旱灾，他也不怕。他告诉我哪几座山和祈雨有关，它们的不同重要性，以及用来制造不同雨的各色祈雨石。

到他和卡潘老人和好时，我已对整个结丛(complex)有了相当了解

重点是我必须证实这些资讯，亲眼目睹祈雨过程，因为它是关系繁生与死亡的数个象征领域的中心。几件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盛传卡潘老人拥有神奇植物扎布托，可以治疗阳痿。虽然他的13名妻妾在外喧腾抱怨他有不举之症，奥古斯丁在怨妇间的私下调查亦证明如此，大家还是无疑卡潘老人拥有扎布托。他问我白人是否有治疗阳痿的药草，我回说我听过此类疗方，但不知道是否有效。这个回答颇令他满意，直称我是“实话实说者”。通过伦敦的一家性用品店，我买到一些人参，放在缤纷彩绘的瓶子里送给卡潘老人，对他的不举，我只能帮这么多。结果卡潘老人腹泻不已。他不认为是生病，只说最好的药也有不灵的时候。他睿智地摇头叹息广无药可让老田回春。”

年底副县长光临，使卡潘老人与我的团结情谊更加巩固。副县长宣布牛只献祭必须禁止，男孩割礼只准在学校放假时举行。这些全是多瓦悠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一大群公务员与官僚搭乘汽车，从波利镇浩浩荡荡抵达孔里，在大树下召开法庭。官僚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演说，禁止这个、不准那个。多瓦悠人严肃点头，偷偷互扮鬼脸。不知谁通风报信，巴米李克族校长早有准备，借此场合痛批村人的懒怠与野蛮。多年来，他们一直承诺替他盖新校舍，却不断推拖。

每当他休假完回来，就发现校舍里的家具甚或部分建筑不翼而飞。听到这里，我不安扭动，知道我新屋的部分脱胎自他半毁的教室。蹲在一旁的卡潘老人突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朝山的方向点点头。此刻正是旱季尾声，天空到处可见云朵，但还未开始下雨，八九哩外的山头却开始飘雨。副县长口若悬河阐释教育的价值。多瓦悠人应抓住机会，利用政府给落后地区的优惠待遇接受教育。大雨越来越近。因上级的关爱鼓励，校长拿出一份名单，这是不让小孩上学的父母。接着掏出第二份名单，这些家长只给孩子准备传统午餐——啤酒，学童到了中午就酩酊然大醉。正当他把名单交给上级时，一阵狂烈无比的暴风吞噬所有人。边诅咒边抱怨，高官们迅速躲入汽车，消失回城里。我们都奔回茅屋。卡潘老人与校长躲到我的屋子里喝咖啡暖和身子。校长大叫说：“你看到没？这些人！里面铁定有巫师。作法起暴风阻止我。这些人真是无药可救。”

马修附耳卡潘老人，用多瓦悠语翻译刚才那段话。我与卡潘老人都笑了。我和校长展开一番长辩，我否定有人可以作法呼风唤雨，也没有巫规存在，巫术根本无效。他却坚定支持这些信仰。卡潘老人越笑越厉害，歇斯底里，脸儿胀得通红。

校长走了后，我问卡潘老人刚刚是不是他让老天下雨。他像只天真的老乌龟看着我广惟有神才能让天下雨。”他笑翻在地，太满意自己的杰作了：“但是下星期如果你来，我让你看我如何协助神造雨。”

目前为止，卡潘老人已告诉我造雨的大部分秘诀。最重要的是拥有某种特殊石头，它也用来维系牛只与植物的繁生。

但是直到数月后，我才在瀑布下方的神秘洞穴里看到这些石头。每次卡潘老人都说带我去看，每次都无法实现。一会儿是旱季尚未结束，接近那些石头会造成洪水。一会儿是雨季来临，我们可能会被雷劈死。要不然就是他某个老婆月经来了，此刻去看石头，对石头有不好影响。他有13个老婆，几乎天天都有人在排经。

现在他只能让我看随身携带的祈雨法器，一旦他以山上的石头正式启动雨季后，便可用放在羊角里的东西制造局部大雨。他带我进入森林，蹲在石头后面。我们夸张地眺望远方，四下张望是否有人。他从牛角拿出一撮未阉割的公羊毛，解释说：“这是起云用的。”然后将雨控制在局部地区的铁环，譬如他去参加头颅祭，可以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让天降雨，直到村人奉上啤酒为止。然后是最重要的法器，他从未让人看过这个伟大秘密。他弯下腰来，用力从牛角摇出一颗东西到手上，那是你到处都可买到、小孩玩的蓝色弹珠。我伸手去拿，卡潘老人面露惊色，急忙将手缩回去：“它会杀了你我问这个珠子是否来自白人国度？当然不是，它来自数千年前的祖先。这个石头怎么造雨？用公羊毛油脂抹它。这倒有趣，因为死者头颅也须用公羊毛油脂擦抹，才能摆到树林里。我开始怀疑头颅、瓦瓮、祈雨石都和同一个结丛有关。果真如此，祈雨酋长便是不同领域的转接点。祈雨酋长的头颅可以造雨，因此庆典时多半与水瓮放在一起，而置放祈雨石的山称为“男孩的头冠”。换言之，山被认为是“大地的头颅”。再度，以祈雨石与头颅为中心的单一模型被用来架构多个领域，让降雨与人类繁生产生关系。

我谢谢卡潘老人，并致上谢礼，在沉默中与马修下山。当我回到村子，煤油冰箱坏了，毁了我好几个月的肉品存粮。

此后它便不再正常运转，似乎知道我无能维系它的正常，只要我一转身，它便自动停止运转，吐出热气，数小时便让食物全部腐烂。好几次我远行返家，发现多瓦悠人站在我的“冰谷仓”前泫然欲泣，哀悼食物毁坏，无法让冰箱运转，又绝望不能取走食物，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东西。不久，我便将这个煤油冰箱列为无用的板箱废物。闻此，布朗牧师欣然

宣称：“西非洲又赢了。”

在祈雨酋长的山上,我想到一计。明天,约翰与珍妮要载我到恩冈代雷采购补给品,马上就可知道我的计策行不行得通。我回到家里,匆匆换件衬衫,丢掉腐臭的肉,出发前往教会。三天后我返回祈雨酋长的村子。怀里胜利揣着我从华特小孩处巧言哄骗、贿赂得来的蓝色弹珠。

“你记得上次给我看的石头吗?”

“记得。”

“我问过你那石头是否来自白人国度。”

“是的。”

“它是不是和这个一样?”我把蓝色弹珠递给他。他惊呼一声,拿起弹珠对着阳光审视。

“一样,这个石头里的云彩比较暗些。”

“它也能造雨吗?”

他惊讶地望着我,我怎么知道?我要试试看,才知道它行不行。没有亲身试过,我无法判断。”他摇摇头,惊讶我居然要他在未经实验前就发表毫无凭据的结论。

直到我在多瓦悠的最后一周,才获准前往参观造雨的神山。归期紧迫,我决定下注一赌解开造雨之谜。我告诉卡潘老人我将在哪天前往辞别,很高兴这是最后一次爬那个要命的山。当我们抵达时,村里静悄悄,女人全被打发出门。我们闲聊一会。当我返回家乡村子,我的妻妾已经替我播种小米了吗?我的父亲拥有许多牛只吗?雨季开始了没?这是我发动攻击的暗号。马修与我早就细心练就一篇简短的谢词,混合伤感谴责。我很感谢他告诉我许多事情,但是我心哀伤,因为我即将返回白人国度,却尚未看过祈雨石。这番感言必须词藻华丽,才能让多瓦悠人接受。我临场发挥,就像一个小男孩与父亲同行。父亲告诉他:‘不要喊累,等我们到了山边,我就背你。’他们到了山边,父亲并未实现诺言,只说:‘别难过,到了半山腰,我会背你。’但是到了半山腰,父亲还是不守诺言……。”卡潘老人明白我的意思,鼓掌打断我的表演。他早就猜想我

十分难过，决定带我去看祈雨石，也信任我不会笨到向女人张扬所见。我们现在就去。马修急得翻白眼，恳求我不要去：我会送命。我提醒他白人不会被雷打死。卡潘老人要我脱光衣服，他也一样。他开始咀嚼一种特殊植物，根据气味，我认出那是“基尔由”（geelyo）。卡潘老人将嚼烂的“基尔由”喷满我全身、涂抹我的胸膛。我还得戴上阴茎鞘，因为肌肤柔弱，特准穿上靴子。卡潘老人警告我不可出声，也不可乱动、乱摸。我们便出发了。

山坡极陡，我们不时从松动的岩石滑下。卡潘老人沿途咯咯笑，显然颇愉快。我没那么轻松，担心相机的安危，还不时被散布悬崖的荆棘刺痛屁股。终于我们抵达近山巅海拔2000米高处。冷极了。山峰处一条河流垂直而下，冰冷瀑布下有个大岩石，里面有个大洞，放置一些大而矮胖、看似水瓮的陶瓮，装着颜色不同的石头，分别用来祈求阴性雨和阳性雨。卡潘对着这些石头喷吐“基尔由”，将石头捧出给我看。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涉河而过，来到一个巨大的白色岩石旁。卡潘老人说，这是多瓦悠的最后防线，如果他移开白色大石，大水将淹没世界，所有人都会死亡。

我们急速奔回村子，享受温暖，洗澡，穿衣。卡潘老人回到自己的茅屋。他已经让我看了全部秘密，也解释了各种不同的雨，以及如何用红赭土涂抹镰刀制造彩虹，甚至让我看了祈雨瓮的地点。我满意了吧？我的确很满意，奉上丰富酬劳，酬谢他分享秘密。还有一件事，我从未看过他真正造雨。他可以示范一下吗？

他开心笑了。刚刚我没看到他朝祈雨石吐药草吗？待会，从这儿到波利镇之间会下雨。我们最好趁天未黑就下山。

他是不怕黑的，言下暗示他具有传说中在夜里变成豹子的能力。

下山途中，我们碰到超级大雨，又必须像山羊般纵跃深渊裂缝。下雨时，花岗岩石湿滑不堪，好几次，我几乎是四肢着地爬行。卡潘老人吃吃笑，指着天空说：“你看到了吗？”暴雨如盆，我们必须呐喊说话，我喊道“够了！叫雨停止。”他眼睛淘气地一闪，一个男人可不会在一天内结婚又离婚。”

马修与卡潘老人对此场大雨洋洋得意，至于我，没有更多证据，不会相信这种极端违背我文化背景的事。和他们一样，只是看到想看的事。田野场上，人类学者极少被周遭人的“假”信仰干扰，他只将它们一一

分类，然后看这些资料如何拼凑成图，学着以平常心面对这些信仰。

当我们返回孔里，玛丽约很高兴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卡潘老人的阳痿盛名加上妻妾成群，让她深信我勤于拜访老人，铁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尤其我去拜访时，卡潘老人常常不在。她染上高山多瓦悠女人的习惯，也称我为“爱人”。

为了让我的“卑劣情欲”有其他发泄渠道，她杜撰了一个胖大的富来尼女人，说她是养在加路亚的情妇，还穿有鼻环。我的情妇拥有神话般的壮硕身材，胖到必须用货车载运，如果没有仆人架着，根本无法走路。旱季时，我和亲人都可坐在她的阴影下乘凉。

我投桃报李，也捏造一个科玛(k_)老人，说他们暗渡陈仓。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鄙夷的民族，科玛人之于多瓦悠人便是如此。他们是异教民族，住在河对岸30哩外，语言是多瓦悠语的低劣变形，也是极端肮脏、恐怖原始的野蛮人。多瓦悠人常拿科玛人的丑恶开玩笑。

每当我送礼物给玛丽约，会假装那是她的科玛老情夫送的。虽然他的牙齿全掉光了，但我还是听得懂他的话，知道这些礼物是答谢玛丽约的性服务。我滔滔不绝描绘玛丽约为他缝制的寿衣，还嘲笑说科玛老人老得快死了，根本不必用裹尸布，直接丢进墓坑就好了。有一次，我抓到一只竹节虫，拿去给玛丽约看，打趣那是枯干萎瘦的科玛老人前来拜访她。每当玛丽约面露疲色，我就归咎于她借汲水与奸夫偷情，我们都知道这是她偷溜去树林密会情人的借口。这类打趣大大纾解村落生活的乏味，也是多瓦悠人逐渐“接纳”我的主因。

多瓦悠人性生活活跃，不解我为何能无性过活。男人直接问我如何生存？为何不会生病？在非洲，性关系只有两种基本模型。第一种模型里，女色会使男人孱弱，夺走他的元气，十分危险。第二种模型里，男人可采阴补阳，性交次数越多越强壮。

出乎我意料，多瓦悠割礼虽强调“男性隔离”，他们的性观念却倾向第二种模型。他们认为我没有老婆却能存活，十分神奇，拿我和神父相提并论，修女环伺却无性生活。

此地神父坚持不称修女为“姊妹”而叫“院

长”(mother, 译注: 同母亲),实在睿智。因为多瓦悠文化里,所有与自己年纪相当的女人都叫“姊妹”,但你万万不能与母亲发生性关系。没多久,我的进城之旅就被众口铄金成“荒淫探险”,更添玛丽约笑话的可信度。通常我进城都是为适应不了非洲混乱状态的器材购买更换零件,因此“进城买零件”这句话迅速变成我与约翰的黄色打趣语。可悲的是,我的真实进城之旅一点不似多瓦悠人的性狂欢集体幻想。在非洲,性接触非但不浪漫且本质粗暴,无法纾解田野工作者的苦闷,反而更添孤离,最好是避免。根据我与同僚的非正式交谈,发现以前并非如此。伴随西方性观念的改变,田野工作者对性接触的立场也大幅改变。

殖民时代,你不能与非我族类(包括社会阶级与信仰的不同)发生性关系,现在界线已逐渐模糊。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对象的图谱里。现在情况改变,单身女性田野工作者似乎有必要与田野对象发生性关系,以迎合“被接纳”的新观念。田野调查结束,却未与田野对象发生关系,会让同僚诧异甚至谴责,宝贵的研究机会白白浪费了。

至于男性田野工作者,他们有更多露水姻缘机会,通常都是金钱交易,较不引人侧目。和民族志学者的助理一样,这个话题也在人类学文献中完全缺席,但不代表人类学者没有这方面经验。有些田野工作者基于性接触可能为家庭及个人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极力避免,但是长时间放逐异文化,此类诱惑不可避免。以我而言,被多瓦悠人视为无性之人,反而是一大福气,使我享有多瓦悠男人所缺乏的自由。替如,孤男寡女共处一茅屋,这是通奸铁证,但是想象我与多瓦悠女性交合,却是闹剧,我很高兴他们如是想。

长期以来,我的真面目与身分颇令警方困扰。旱季尾声,危机终于爆发。先是直升机违规闯入。一个经费宽裕的瑞士教会自作聪明,认为感化山区异教徒最好的方式莫过借用快速的直升机空降牧师,效果一定惊人。一天,当我在教会时,直升机从天而降,在空中盘旋,发出巨大噪音,显然在召唤人们前往降落场。既然在场的只有我会开车,便借了一辆车前往降落场。直升机上有两个来自恩冈代雷、状似困惑的神职人员,他们要找一早便前往恩冈代雷的布朗牧师,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希望发现布朗牧师的车踪,一阵烟尘翻滚后升空而去。就在此刻,一卡车荷枪实弹的宪兵据线报前来缉捕刚降落的“尼日利亚走私犯”。我被拖出车外。直升机的降落许可、飞行计划、飞行执照在哪里?我困惑无知的抗议丝毫不起作用。我无法交代谁在直升机上,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与飞机编

号，甚至不愿发誓这辆直升机并未接近边界十哩，这些都是走私活动的如山铁证。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洗刷冤情，恢复我“无害白痴”的清誉。好不容易此事尘埃落定，我又陷入麻烦。一晚，我去波利镇医院探望被蛇咬的村民。不幸火把坏了，一下子便在城外迷宫般的路径迷途，在漆黑中跌跌撞撞半小时，幸好看到前头有灯光。我奔往灯光处，惊讶发现自己置身副县长助理家的后门。我停下来向门口一位懒洋洋的年轻人问路，随即找到大街。

两天后，当我正在访问制陶匠时，约翰与珍妮现身孔里——宪兵到处在找我。一份正式公文传唤我到警察局查对身分。我确定了明天前不会开始烧陶，便与他们出发前往波利镇。那位嘴里含针的司令官在办公室接见我，我们花了半小时确定我的身分，以及我到底在波利镇干什么。询问过程里，他的眼睛不时在头巾下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我开始紧张了。

有人指控我拍了副县长助理家后门的照片，这构成“战略消息”。目击证人指称我手拿相机，在那栋房子后面鬼鬼祟祟。我多久去尼日利亚一次？我的否认不被接受，他们有目击证人。有人看见我穿越边界，我不知道那是违法的吗？

他们反复质询许久，才将我释放，严厉警告此后会严加监视我的行动。第三世界国家对间谍的妄想执著常陷田野工作者于危境，惟一原因可能是的确有些感兴趣的单位赞助研究者到敏感地区做研究。我的问题是面对一个对纯研究一无所知的人，该如何解释外国政府为何对叛乱山区的一个孤立部族感兴趣。对警察头子而言，最合理的解释莫过邻近尼日利亚的地理之便。但我既不是走私犯，也不是替尼日利亚大军入侵打前锋的间谍，副县长助理住家后门的照片到底有何价值，没人跟我解释。

许久后，当我与副县长混得更熟，他才说他一直注意事情的发展，会保护我不受狂热宪兵伤害，他认为整件事是笑话。

我的反应却是忧心焦虑，尤其事件之后，警察不时突袭孔里探访我的行踪，更是雪上加霜。不知是巧合还是精心设计，我驻扎波利镇时拍的一批底片也离奇失踪。一如以往，约翰坚定支持我渡过难关，带我去教会猛灌啤酒，直到我好过点为止。

译注

①海耶德是挪威民族学苻,曾在1947年、1969年、1977年三度招募探险队,用仿古代的船只远渡重洋,企图证明古文明的传播路线。1947年那次他搭乘一种原始木筏Ko&Tiki,从南美洲的大西洋岸航行到波利尼西亚,企图证明波利尼西亚人源自南美洲。1969年,他与探险队员搭乘古希腊的Ra船,从摩洛哥横渡大西洋到中美洲,企图证明哥伦布以前的西方文明曾受到埃及文明影响。不过,海耶德的理论并未被人类学界接受。

②结丛是指文化特质的任何整合与模式体系,它在社会中如一个单位般行使功能,有时称为文化特质丛或仅称为特质结丛。详见朱岑楼主编:《社会学辞典》,台北,五南图书(1991),p,219。

第十二章 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

我离开英国快一年了,虽不敢说在多瓦悠宾至如归,但至少已进入所谓的“中间”阶段,样样事物都有种虚幻的熟悉假象。该是我开始整理笔记,并进攻我原本闲置一旁、打算等语言能力与人际关系更好时才研究的领域,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祈求繁生的农地仪式。部分仪式以卡潘老人为中心,有的则和他的亲戚有关,我们在早先几次头颅祭时便认识了。他们的任务包括以特殊药草涂抹神奇石头,以确保植物丰收。在卡潘地区,这个仪式和祈雨仪式同时举行:药草随雨降下,可使“大地复原”。在多瓦悠的另一头,此类仪式则是用石头在村尾排成一行,“阻挡饥谨入侵”。我开始抽冷子拜访这些地方,与仪式秘密的拥有者——掌地师——聊天。

我的车子仍未修好,再度仰赖约翰与珍妮的慷慨。亏了他们的帮忙,我才能免去跋涉十数哩之苦,经常拜访这些遥远的村子,与卡潘老人保持联系。出乎我意料,这些掌地师乐意展示仪式配备,知道我不会向女人泄密。大家都知道我和卡潘老人一起工作,他们也愿意信任我,尤其话已传开,大家都知道我乐意付钱。接连几个星期,我忙着从这个洞穴爬到那个山头,跋涉到头颅屋,又奔回卡潘那儿巧言哄骗卡潘老人透露秘密。同时间,蒙哥村的祈雨酋长也派人传话:他快启动雨季了。我又抽身冲去他的山头。这里的山地多瓦悠人施展老套,蒙骗我们兜圈子,希望我们厌倦了走开。打从政府在波利镇驻军以来,多瓦悠人使用这套方法保护自己。马修与我不为所动,聘用一位当地人做向导,坚决不准他半路丢弃我们,威胁说如果我们找不到祈雨酋长,便要睡在他的茅屋外,第二天他走到哪儿,我们便跟到哪儿。威胁奏效,我们很快便找到祈

雨酋长,他很高兴看到我们。在山里兜圈转显然是对付外来者的标准程序。奇怪的是,他居然听说我和司令官的摩擦,大表同情,显然他们也有了一番过节。

蒙哥村的祈雨酋长是个聪明开朗的年轻人,他很愿意马上宰杀一头黑山羊,为窖藏于头颅屋的祈雨瓮涂抹山羊血,正式启动雨季。他的顾问却大表反对。这位强盗般的老者是祈雨酋长的叔叔。他说,如何确定我没和月经来潮的女人接触?而且,村人认为雨季还要一个星期才来。直到他开始质疑让未受割礼者接近祈雨瓮是否明智时,我才确定他是故意找麻烦。外来者无须受过割礼就能参加多瓦悠仪式,连外国女人都可在场。我们开始讨论价码。整整一个小时我不断摇头,每当他提出一个价格,我便露出恐怖之色。最后我们谈妥价码。多瓦悠终极秘密的代价是8英镑,我并未受骗,因为我还可得到半只牲礼羊。仪式迅速进行,丝毫没有卡潘地区仪式的敬畏气息。一点都不戏剧化,就像寻常屠宰羊只一样,他们将羊儿翻倒在地,一脚踏住它的喉咙使其窒息。当羊儿昏了过去,他们便切开它的喉咙,用葫芦盛住鲜血。

我们连忙奔进树林中一个破烂的头颅屋。这个地方禁止外人进入,因此,我们全都得四肢着地,爬过满地刺人的短树丛,来到一块杂草丛生、阴暗的空地,那就是头颅屋所在。里面的祈雨瓮和我在卡潘老人处看到的一样。祈雨酋长敷衍喷洒羊血了事后,我们便回到村里,长谈数小时。

就在蒙哥村祈雨酋长处,我得到解释多瓦悠文化象征体系的最重要资讯。先前资料显示祈雨酋长与人类繁生、降雨有关,通过“打死富来尼老妇”这个仪式情节,“真正耕耘者”的收成则与植物繁生、割礼产生联系。擦拭祈雨石的那天是旱季的开始,是多瓦悠人开始焚山(山是“男孩的头冠”,而焚山会让山变干)的日子,也是第一批收成与刚受过割礼的男孩一起进入村子的日子。多瓦悠人鄙视包皮,它让男孩性器潮湿,发出女性阴部的气味,受过割礼的阴茎干燥且洁净。当男孩离开村子去接受割礼时,他们是“湿的”,必须跪在河里三天。男孩接受割礼后,雨便下个不停,直到他们慢慢离开河边营区往山里走,天空才开始放晴。旱季降临,接受割礼的男孩才能返回村子,到置放死牛头颅的圣坛前等待。同时,第一批收成准备送人村子。换言之,多瓦悠人用单一模型统合所有繁生面向,雨季到旱季的更迭则和未受割礼的“湿”男孩蜕变成受过割礼的“干”男孩连结起来。

我是在回到英国后,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与详细分析,才将这个象征

系统的细节全部搞定。可是那一天，先前在田野场上观察到的基本架构与辛苦记录的一切资讯突然间都有道理了。“我找到了！”的时刻总是令人兴奋，这的确是突如其来，发生在高山上，透露这个资讯的男人全然不知它对我的重要性，更增添我终于窥知多瓦悠仪式背后简单架构的快乐。下山途中，马修显然察觉我的飘然。狂喜中，我省略了过滤与加氯，直接饮用山泉水。我不知道这是上天对我自傲的惩罚，还是潜伏在我肝脏里的病毒作怪，我再度被肝炎击倒在床。

就在我病得最沮丧时，奥古斯丁与他的最新女友移驾拜访。他们熟知肝炎，觉得我病况严重。奥古斯丁笃定地说：“最好是吐。你必须大吐特吐。”他的女伴不同意：“应该灌肠。惟有强力灌肠才能驱除病魔。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死于肝炎。”

“灌肠不好。他必须吐。”“才不是。必须灌肠到出血才行。”他们来回争辩。我谢谢他们的建议，说很多东西都让我又拉又吐，保证他们满意。

恩冈代雷教会的一位好心人路过孔里，告诉我治疗肝炎的偏方一热水熬煮芭乐树叶。结果证明它比什么都有效。后来我才知道德国一家药厂也在试验类似成分的药。我派马修去找芭乐树叶，北方地区这种树很少。马修说他在5哩外河边看到过一棵芭乐树。我很怀疑我们说的是否同一种树，他却打败我，带回一整袋真的芭乐叶。

我的病况逐渐改善。多瓦悠人大感惊奇，也开始用芭乐叶治疗肝炎。所以，人类学者多少还是会改变他的研究对象。

我的另一大成就是“地名研究学”。我的菜园证实特别适合种植莴苣，数年后，他们改叫它“沙拉之地”c。

大约这个时候，今年的第一场大雨终于降下。在众人的欢乐声中，旱季的无情酷热瞬间消解。我则没那么亢奋，因为我的新屋顶整夜漏水。我被迫蜷缩墙角，浑身颤抖，皮箱颤巍巍摆在头顶上的平台遮雨，双手紧紧抓住笔记。第二天上午，铺屋顶的人说所有新屋顶都是这样，几天后就好了。

我并不相信他的话，但缺乏铺屋顶经验，无法反驳他的笃定。就像出租漏水船只给我，宣称木头下水后就会膨胀堵住漏洞的人，或者坚称我的牙床会缩小适应摇晃假牙的喀国牙医一样，他的说辞颇不可信。经

过一星期可悲的洪水泛滥后，该找铺屋顶的人履行保证了，他随即修理屋顶。令我吃惊的是，他只用一块木板敲打茅草屋顶，更令我吃惊的是，它居然奏效。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田野采集者在工作接近尾声时的精神病终于发作。我将笔记藏到教会，远离湿气、白蚁、山羊、小孩以及我幻想中的各种危害侵袭。

我送笔记到教会时，约翰与珍妮正好前往森林办事，一阵怒吼吸引我到门口。那是自封“黑鹿”、身材壮硕的焊工。他大叫：“喂，白人，你的车差点杀死我。”刚才，他正在焊接我的车子（我极想忘了它的存在），突然间，车身掉了一大块，差点砸死他。他似乎认为这全是我的错。我问广你还好吧？”

“还好？你看！”他从裤子里掏出巨大阴茎，对着我挥舞控诉。突如其来的暴露让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仔细检查后，才发现它有一小条“黑鹿”坚称必须“急救”的割伤。

老实说，我有点茫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品。翻箱倒柜后，只找到浓缩漂白剂。这恐怕不是好疗法，我建议他去找布朗牧师，他就住在山下，据我所知，他有各式急救药品。“黑鹿”犹带盛怒，跛行走开。

直到我回房继续给笔记分类时，才想起布朗牧师不在家，他去帮人修卡车了。他的老婆可是以神经紧张著名，我想像“黑鹿”缓缓走到她的门口露出下体。或许我该奔下山阻止此事？但是，审慎为勇敢之本。何况，我并未听到布朗太太的尖叫声，或许“黑鹿”也懂得审慎行事，不露出他的伤处。

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可以再度攀山越岭。马修和我最后一次出访，前往多瓦悠最西边参观扇椰子丰收祭。扇椰子是一种类似椰子的圆形水果，丰收祭里，扇椰子的角色类似头颅，被搁在摆放牛只头颅的圣坛，防止蝎子危害村庄。我从未见过扇椰子，迫不及待要品尝它的滋味。

当我们抵达掌地师的村落时，发现他端坐在一大堆扇椰子中，开怀大嚼。扇椰子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浸在水里，让它发芽，嫩枝的味道似芹菜。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吃，果肉橘红色，纤维很多，咬起来像擦鞋垫，味道似桃子。我雄赳赳大嚼一阵后，开始掌握诀窍，发现扇椰子颇

好吃。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显然发现我啃食扇椰子颇费力，端上一葫芦已经剥了皮的果肉给我。我和马修说，这软多了。

“当然。主人，”他回说，“她已经帮你嚼过了。”

我在多瓦悠的日子逐渐接近尾声，人们开始络绎拜访我，逡巡我的财产，提及他们迫切需要一条毯子，或者赞美我的炖锅多好等等。朱迪波说他十分想念我，细数我们一起做过的事，虽然我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他还是颇享受我们共处的时光。马修开始不经意提起买老婆的棘手事。他解释说：“你必须趁她们还小时就买过来，才能照意思打造她。”马修相中的对象为十二岁o“但是她们如果年轻，多半会要你出钱供她们念书。”他叹气。他认识的人中谁愿意借他钱供老婆念书呢？惟有玛丽约不把我当摇钱树。每当提及我即将离去，她总是掉下眼泪，说她将怀念与我聊天。

为了即将来临的国庆日，波利举镇沸腾，准备各式表演，多瓦悠必须派人表演割礼舞蹈。我没机会看到真正的割礼，对此极感兴趣。多瓦悠的年分为阳年与阴年，割礼只在阳年举行，我来的这年恰巧是阴年。此外，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长时间待在森林里，还要考虑小米收成是否足够所需。多瓦悠已经五年没举行割礼，快要变成一大耻辱。之前，我都仰赖当地人的描绘理解割礼过程，也通过割礼人口述了解仪式程序，割礼照片则搜罗自文献纪录与在多瓦悠多年的传教士。我的研究少了多瓦悠象征体系的中心部分，原本很严重，幸好许多仪式都翻拷自割礼仪式，一模一样复制。

我还是很庆幸有机会看到男孩行割礼前跳的舞。他们身着寿衣、豹皮，披挂动物角、厚重的袍子以及其他配饰。没时间教导年轻男孩表演，两名受过割礼的男孩被迫挑起这项讨厌、丢脸的任务。一开始，他们十分厌恶这项提议，拒绝接受任务。朱迪波承诺给他们钱与啤酒，才勉强上阵。第二天，朱迪波现身我的茅屋要求我付钱，他说整件事是为了满足我的兴趣而筹划的。

最后，朱迪波的好逸恶劳遭到严重威胁，因为副县长下令每人都得种一块自己的菜园子。朱迪波先是说菜园子要长得好，必须有仙人掌围篱挡住动物入侵，光是等仙人掌扎根就要一年，接着又说园里如果没有茅屋招待工人喝啤酒，又有何用？可惜现在不是盖屋季节，又得等一年。算算得等三年，朱迪波的锄头才会第一次翻土，但是，每天上午他都哀愁宣布“他要去田里”，然后坐在树下（通常有我作伴），随意漫谈。有

时我觉得自己像不收钱的心理医师,听他闲扯梦想、他所认识的女人,以及位居高职的压力。

庆典那天,所有地方重要人物齐聚足球场。卡潘老人身着富来尼袍子、配剑,我逮到机会又骚扰他一番。其他部族也派出歌舞队,顿足呐喊,尘土飞扬令人窒息。行政部门的高官全穿上最体面的制服,副县长看起来像极“法国航空”的空中少爷。人群大力挥舞旗子,宪兵配备强力武器,踱步巡视。

大家齐唱国歌。一架收音机庄严放在椅上,当总统的演讲伴随嘈杂的静电干扰声传出,所有人都举手敬礼。孩童表演进行曲与游戏。副县长尚未离席前,大家都不准离开,我们在大太阳下都快枯萎了。一大群跟着妈妈的小娃儿开始尖叫哭闹着要走,据说是妈妈故意掐哭他们。少数参加庆典的白人热烈讨论北边两个传教士被谋杀分尸。美国人十分紧张,法国人则夸张描绘尸体模样,乐得让美国人更不安。在场只有我一个英国人,有必要扮演板着脸孔的角色,虽然在老式电影里,这类角色根本撑不到第二幕就被谋杀了,到不了多瓦悠,更去不了偏远北方。

全城的啤酒与冷饮全被副县长征收使用,所以我漫步前往教会找约翰与珍妮,等着看晚上的余兴节目——选美比。。。

在这个特殊夜晚,波利镇陷人亢奋情绪之中。人们涌上街头,歇斯底里表达独立纪念日的快乐。受邀参加副县长派对的客人与一般庆祝民众略有不同——警察会不时冲向后者,殴打驱散他们。

大街上挤满人,唱歌、跳舞、呐喊致贺语。多数人早已烂醉。或许,这就是我的西装派上用场的时候,果真如此,我恐怕早就融化了。这是官方宴会,一切极为正式。场子里摆着一排排既硬又不舒服的椅子。座位安排显然有一套神秘系统,依据往例严格分配,总之,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医师与胖大的老婆在列。行政部门的人也在。警察局司令官恶狠狠瞪我,邮政局长则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显然因为我质问他为何从波利寄至英国的邮件,统统没有贴上邮票。负责核对邀请函的那个人则大批亲属统统在座。

筹办选美大赛极为简单,就是发函给各地酋长,规定他们在那一天送多少名女子进城。山上的人如何看待此事,我根本不敢想。早年,富来尼人有强征奴隶与女人的习惯,或许多瓦悠人认为旧习俗复辟了。总之,参赛的女人个个受迫模样。不少女子长途跋涉,一脸旅途劳顿。富

来尼人当然唾弃用这种方式展示女性同胞，却欣然有机会饱览他族女性。参赛女子被迫走台步，在一大圈观众面前无精打采地走动。她们有一种奴隶市场待售货品的仇恨表情，有的瞪着地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有的怒火瞪视折磨她们的观众，龇牙咆哮。面对此种情势，观众的反应令人“折服”，他们回报以嘲笑嘘声，间杂猥亵要求各种交合(结婚除外)的热烈话语。受邀客人与不请自来、不断涌人的观众起了冲突。有些观众爬到树上，希望看得更清楚；参加派对的官员用力摇晃树干，树上客纷纷跌落地面，痛得流泪，众人大乐。几经讨论，波利小姐诞生了，还有波利小姐第二名、波利小姐安慰奖。副县长的新任年轻助理负责颁奖，一一得体的拥抱得奖者，并与波利小姐第一名跳舞。夺得后冠的女孩显然来自偏远山区，被选美过程吓坏了。当高贵的年轻助理伸出纯洁的拥抱之手，她怕得蜷缩一团。当人们催促她跳舞，她泪眼汪汪紧握拳头，断然拒绝。官员先是尴尬微笑，进而低语威胁。她则趿着簇新的蓝色塑胶拖鞋，顿足不依。两名宪兵老鹰捉小鸡，将她扔出场外。观众高兴喝彩。安慰奖波利小姐不负头衔美名，挑起重担。派对开始。

舞会曲目融合最新西方流行乐与没完没了的尼日利亚流行歌曲。不幸，当我与医师太太跳舞时，演奏的正是尼日利亚歌曲，至少长达20分钟。我们独自绕着场子飞转，旁人不是热得发晕，就是为我们的优雅航行目眩结舌。医师太太是个超级胖女人，跳了十分钟便疲态毕露，不是时而撞翻椅子，就是不时踩到自己的脚。惟恐对方失面子，我们都不敢叫停，继续踉跄打转，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直到某个好心人递上啤酒。边跳舞边就着瓶口喝酒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办到了，令人敬佩地跳完一曲，开怀退场，博得观众喝彩。

我自觉已克尽喜庆义务，安静颓坐角落，医师频频叫我多喝点，他早就知道与老婆跳舞的滋味。庆祝派对继续，酒和烧烤内脏源源不断供应。午夜时，我和丛林来的两位老师——帕特里奇与休伯特聊天。帕特里奇有个怪癖，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折叠椅。据说他曾在佛科(Voko)住了一年，那里完全没有家具，令他沮丧万分，因此和朋友前往加路亚买了一张折叠椅，并发誓永远不与它分离。他甚至与这张椅子共舞，直到担任宪兵的表亲苦口相劝为止。因为这位表亲，他才受邀参加派对。现在啤酒快喝光了，不少人改喝红酒。根据经验，喝混酒可不妙，我只浅尝为止。其他人则说还要再喝酒。现在只剩波利镇偏远处一家非法酒厅还有啤酒，老板是个严肃的穆斯林。一位喝到下半身瘫软的男护士扛起重任，骑摩托车去买酒。他连路都走不动，被众人抬上车后，飞驰消失于夜色中。我看他连坐稳车上都有问题，遑论拿酒回来。但是五分钟后，他骑

着车子回来。再度，由众人扛他下车抬回座位,继续喝酒,真是英雄!帕特里奇、我和我的折叠椅一起去听几个多瓦悠人吟唱描写偷腥的歌曲。帕特里奇慷慨让出折叠椅给我。欢乐吟唱被打断，一个狱卒拿出录音机,打算录下他们的歌声，却忘了付钱,际遇叫我大吃一惊。男人一拥而上围殴(嘴里还在唱歌)，女人踏毁他的机器,小男孩咬他的腿,还打算用细棍子戳他的耳朵。

帕特里奇小心保护折叠椅,我则担心自己在某些田野场合的行为是否也和这位狱卒一样。我决定明日要问问朱迪波，我为何幸免此等待遇。在西非洲，成为犯罪事件目击者殊为不智,警察会传唤所有目击证人、被害人亲友，痛殴他们直到吐实为止。此种破案法效率奇高。帕特里奇、我和折叠椅迅速逃离现场。

我们回到副县长的派对，现在已全部被警察霸占,捉对跳舞。我与某位警官羞涩跳完一曲，觉得该走人了。清晨五点,我偷偷溜回教会，约翰窃笑迎接我，认定我的夜游铁定干坏事去了。

我的严肃研究接近尾声,该处理实际问题了。我听说离开喀国工程浩大,绝非到机场买票上飞机那么容易。我必须拥有离境许可，在拿到它之前,我是这个国家的囚犯。对此，我颇感愤怒。教会向我解释取得离境许可的流程。听起来颇不可思议,谁会认真执行这么刁难、无意义的行政流程？不久后,我便发现是真的。

奋斗的第一站是恩冈代雷。不幸，我的签证快要到期，所以我必须同时申请签证延期与离境许可。政府部门没人明白我为何两样都要：我要不就留下,要不就走。但是根据经验,我知道在喀国境内旅行，不时会碰到身分拦截，少了有效签证，麻烦可大了。他们叫我三天后再来。

下一步是去税务局。又有麻烦。他们不知道我该去恩冈代雷报税，还是去核准我研究许可的首都。我工作的地点在北方，归加路亚管辖，但是我最后的居留签证却是恩冈代雷签发的。他们要仔细研究。我必须填写缴税申报单，上面的问题包括“几个小孩？存活者数目？”，反映了喀国可悲的婴儿夭折率。我在税务局混了好几天，企图面见督察。终于获准。他答应处理我的报税问题。过去一年来，我都在英国缴所得税，这又是问题。英国与喀麦隆两国间有税务协定吗？我一无所知。他断然阖上我的公文夹。

很好，你必须去大使馆取得一份税务法的说明。我怀疑英国大使馆

愿意发出此类声明，此外，我也不想去雅温得。我将问题推回给他，但是他态度坚决。

我又继续混了几天，期盼居留签证下来。最后他们告诉我无线电坏了，已经坏了一个多月无法与首都通话，不能签发签证。

接下来一个月，我在加路亚、恩冈代雷、雅温得三地来回奔波，破财又伤身。后来我终于认清事实，我的事情牵涉三个行政区域，永远无法合法离开喀国。我与恩雅得的法国朋友讨论此事。身为法国人，他们较不受困扰，凭身分证便可自由来去。他们为我引介法国军需处的证件专家。他面带峻容聆听我的疑难杂症。没问题，他微笑解释，我必须采用大家都用的策略。我的说词将变成我抵达喀国后便一直待在首都。至于我的居住地址必须借用朋友的。因为我是白人，所以我雇用仆佣。既然我有佣人，便要有文件证明我至少付了他们喀国规定的最低薪资与社会保险。这些都可以借用我朋友的。又因为我与朋友共住一间公寓，为了简化作业，所有文件都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所以我的名字不在那些证件上。据说各种机构都沿用这套方法，以规避恐怖复杂的官僚作业。惟一的危险是对方可能要求查访我的住处。不算大危机，但必须先贿赂佣人照剧本说谎。

整套计划开始进行。接下来数星期，我牛步爬行各衙门，取得不可或缺的盖满章的九份文件，忍受了不少初来时所受的那种气，不过我已不再讶异或气愤。

我借来的文件好用得很。社会保险局的督察也的确打算造访我的住所，但是当他知道我没车载他，马上打消念头。

此时正是雨季，他拒绝步行。我收集所需印章后，继续吃力奋斗。

终于我抵达核发签证的警政署，再度被当成皮球，在各个办公室间踢来踢去，似乎没人知道核发签证是怎么一回事。

我早上九点便到警政署，直到下午三点才获准到署长办公室。惟有他才有权决定，因为我现在既无居留签证，又无离境许可。他带着一种厌烦的优越感聆听我的故事，然后大声对属下说：“给他签证！”没人要看我花了大钱、辛苦收集七星期的文件。我摇晃步出办公室，因难以置信而觉虚脱。当上帝将石板交给摩西时，他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

我开始分阶段搬离波利镇,再度仰赖教会帮我将器材搬到恩冈代雷。我与恩冈代雷行政官僚的一页拉奥孔

(Laocoön)角力史,已变成经典笑话。

参加了副县长的派对,再加上马修的敦促,我决定在村里举办自己的离别派对。为了这场派对,我们通过各种曲折渠道搞到40瓶啤酒,玛丽约也答应帮我酿些小米啤酒。不脱多瓦悠本色,酿啤酒也有大麻烦。我付小米的钱被某个男人拿走,因为他说朱迪波欠他兄弟一头牛。这个人的兄弟的岳家又欠他小米,所以他的兄弟要到老婆的叔叔家拿小米……。结局也颇有多瓦悠特色,小米最后一刻才到,开始酿酒。连续两天,整个村子兴奋沸腾。朱迪波忙着编织给客人坐的席子。玛丽约一边杵米,一边唱舂米歌。小孩忙着到处借葫芦、瓦瓮,碍手碍脚。村人尤其热衷掠取我打算丢掉的东西。喷雾杀虫剂摇身一变成乐器,火柴盒用来储存谷仓里的秘密东西,火柴盒上的标签条被仔细撕下做卷烟纸。空锡罐大受欢迎,被拿来当煮锅。我必须将多余的药品偷偷拿到树林掩埋,防止小孩搜去吃。男人不时光临寒舍,察看啤酒发酵程度,传布宴会消息。

整体而言,这场宴会超级成功。马修很烦恼我不肯像副县长一样发表演说,但很骄傲我托付他分发啤酒的重任。他要大家排成一列,并指派一名助手分发每位村民一瓶啤酒,仔细和他们解释啤酒是谁请的,为何请的。似乎只有我对此过程感到尴尬。没多久,全村人都酒醉喧闹。乐器上场,一个老人开始踏足舞蹈,另一个人跟上节奏。众人开始跳舞。暮色降临,田里干活的村民陆续回来,奇迹似的,啤酒供应居然足够。朱迪波的两个妻妾趴到我的脚边,哀伤哭泣;鼓手跪在我的面前,在摇曳的火光中固执打奏节拍;舞者不断绕圈,拍手顿足。显然我必须有所回应。我不可能发表演说;人墙拥挤,也无法加入舞蹈行列。此刻马修神奇现身背后,拿了一把百元中非法朗的铜板给我。他大声说:“在每个人的额头贴上一枚铜板,主人。”我照他吩咐做,融入情境中,边用铜板按住村人额头,一边赐福说“愿你的额头隆起”,这是多子多孙象征。

显然这就够了。多瓦悠人欢喜接受传统降福,舞着离开,继续进攻啤酒。

马修和我退回茅屋,朱迪波与其他大人物都等在那儿。我结结巴巴发表了感谢演说与道别,然后坐下来喝了数小时啤酒,虽然我渴望回到孤单的床上。有趣的是,我发现马修在这段与我共事的期间,从滴酒不沾变成颇爱喝酒,我则因为肝炎几乎戒酒了。屋外,派对热度不减,屋

内陷人沉寂，我们静听音乐。慢慢的，他们一一告退。最后只剩我一人，感激爬上床。下雨了，茅屋顶又开始漏水。

第二天毫无预警，我突然听说我几乎已经成功忘怀的车“差不多修好了”。检查后，我发现它的状况确有改善。四轮健在，虽然懒洋洋歪一边。可是从修车处开回村子，我总共发动了三次。有两次是引擎停止转动，第三次当我打开车灯，它突然冒出一阵白烟。比起搞到汽油，这些都算小问题。最后是通过奥古斯丁中介，我才自副县长车库的工人处买到汽油。至于他的汽油来自何处，奥古斯丁严禁我提问。

一切妥当，可以出发离去了。考虑发动机的状况，发动车子后最好不要熄火。一小群村人现身送行，淡淡微笑，磨蹭双脚，小狗巴尼摇着尾巴，约翰与珍妮评估我顺利抵达恩冈代雷的机会，极力忍笑。挥挥手，引擎轰然，我离开这个我为了奇怪目的一待数个月的山头。分离总带来空虚，一种淡淡的无边寂寞感触。很快你就忘记田野工作多数时候极端乏味、孤寂与身心崩解。金色薄雾降下，原始民族开始变得高贵，仪式变得更震撼，为了达成现在的某个伟大目标，过去无可避免被重组了。直到重读田野日记，我才明白当时的情绪主要是结束多瓦悠研究的歇斯底里狂喜。

旅途当然不是平平顺顺。我的车子有了崭新毛病，会把顺着车身流下的雨水吸到风管，喷得行人一身都是。但是我终于抵达恩冈代雷，又花了两星期企图寄回一卡车陶器到英国。这次我早有心理准备，知道此举势必挑战喀国尊严，必须与七个不同单位的官员交涉。

离开喀国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与教会里的朋友道别，没有他们的协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在马修开口向我最后一次贷款后，我爬上了飞机。

但是喀麦隆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我必须在杜阿拉港待一晚，简单的一顿晚餐便让我染上该城闻名遐迩的上吐下泻。惟一的安慰是旅馆房间里有马桶也有净身盆，让我免去英国浴室的痛苦折磨。第二天上午，我几乎是被扛上飞机的。

译注

①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城阿波罗神殿的祭司，特洛伊战争时，因识破木马屠城之计，遭雅典娜女神派遣海蛇绞死，后来此字被用来

形容苦斗。

来洗下身的坐式小澡盆。

第十三章 英国异乡人

飞行常常意味着漫长、不愉快与难过，我的田野之旅最后阶段更是如此。被迫坐得笔直，像个老姑婆啜饮瓶装矿泉水，全副注意力都放在我汹涌作呕的肠胃，同时间，飞机上以超大音量播放法国调情电影，供我取乐。撒哈拉沙漠消失于我的脚下。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出聪明点子，要在换机的罗马停留一晚。我眼前浮现美丽景象——安静凉快的房间，微微浆过的干净床单，绿叶繁茂的树影洒落床铺，或许还有宁静的喷泉。

下机后，我发现自己虚弱到无力提行李，只好放到寄放处。

我看着宝贵的田野笔记、相机消失于张大嘴的门后，怀疑它们还会现身，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疯狂到与它们分离。紧紧抓在我手上的是旅行而污损的衣物，牧师娘给我的裤子吸引优雅的罗马人好奇注视，狂野双眼与憔悴面容则招来轻骑兵行注目礼。

我找到房间，又热又吵，灯光闪烁嗡响，价格高到离谱。这正是渴望与现实的真正关系。我躺下睡觉。

一般人较少注意非洲村落与欧洲城市的最大差别在时间的流逝。对习惯农居生活规律节奏、脑袋里只有季节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而言，都市住民似乎以一种挫折疯狂的营营碌碌呼啸而过。漫步罗马街头，我觉得自己就像多瓦悠巫师，神秘的缓慢速度标示出我的仪式角色与身旁日常活动的差异。小餐馆的菜色太多，我无力应付：多瓦悠生活的别无选择使我失去决定能力。还在多瓦悠时，我成日幻想狂吃痛饮，眼前，却点了火腿三明治C

人们老是警告我在罗马免不了被抢、被打、惨遭当街劫掠，我特地只带足够买火腿三明治的钱。或许我对接下来的际遇不该吃惊，返回灯泡嗡嗡作响的旅馆房间，我发现门上铰链被撬开，东西被洗劫一空飞机票、护照、钱，甚至我从多瓦悠带回来的衣物也都不翼而飞。旅馆人员坚称他们不负行李保管责任，我的西非式愤怒尖叫能力虽令他们钦佩，

却于事无补。我火速检查口袋,全身只余一英镑。这种情形下,下一步很明显。我走进餐馆,省略火腿三明治,直接点了一杯啤酒,哀悼我的不幸。餐馆主人是个壮硕古怪的人,摸清我的国籍、职业、婚姻状态后,拿出一张翻到破烂的照片,上面是他的大群可爱孩子。他说曾在威尔斯做过战俘,略带腼腆说威尔斯女孩非常热情。不久,我也对他倾吐遭遇。

他以奇怪的罗马/克尔特口音说:“所以,你没钱、没机票、没身分证明。”我说是的。他说:“那我借你一万里拉。”他拿出一叠纸钞放在吧台上。我点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在我的困惑状态里,这种超乎寻常的慷慨似乎不比我先前的可悲遭遇更不可思议。我又摆荡回田野工作的换档心情。我的恩人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我则闷然不悦还要和官僚打交道,想像自己在罗马无止尽奔波,拿着公文四处盖章,还要挣脱小孩的包围纠缠,才能登上飞机。他和大使馆说好了。我先到警察局作笔录,然后大使馆会安排我遣送回国。“遣送”听起来好像上镣铐运回国。

警察局挤满愤怒、绝望、沮丧的各国观光客,全惨遭罗马青年的劫掠。一个烦闷冷淡的警察耐心将英国观光客一一挑出,与德国观光客放在同一房间。法国人则被安排到较大且凉快的房间,令我们愤怒不已。一个布拉福德(Brndfoid)口音的人对大家说:“我是替贝丽尔难过,她是我老婆。”他指着身穿斜纹软呢服的端庄太太说:“她不能离开露营地,他们还以为她在玩。男人跑来骚扰她,对着她大按喇叭。她只好拿李子丢其中一个痞子。”我们望着她思索。“后来又有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跟在我们后面,用铁锤打破后车窗,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抢走我们的行李。”

德国人要求翻译,深恐我们隐瞒极高机密。我试图解释却放弃,因为他们似乎来自提罗尔(Tynd,译注:奥地利一地),语言没有母音。

吃着火腿三明治,我遁回田野换档心情。许久之后,我终于被带到地下室深处的办公室,由一个警察询问。“你在火车站被抢?”“不是,在旅馆。”他哼了一声,记下来。“损失什么?”我一一列出丢掉的财物。“多少现金?”“大约一千英镑。”他蹒跚走开。

另一个警官出现,一言不发,将一个眼神狂乱、浑身毛发惊人、手带镣铐的男人安置在我对面椅上,转身离去。那名男子弯身向前,疯狂瞪视我。我们都知道如果此刻我转开眼神,他就会掐死我。他瞪着我,我也回瞪他。两人都不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询问我的警察终于回来,完全无视多毛男子,叫我签笔录。书写漂亮的意大利文并不难解,上面宣称我在火车站被抢了一千英镑。我可受过比这更不堪的官僚待遇,高高兴兴地签了名。

现在我该进攻大使馆了。那里又是大批惨遭蹂躏的观光客,由一个面容严厉、嘴角紧抿的领事馆女性人员发落。

她正对一个非常年轻、肮脏、穿着破牛仔裤的女孩说教。“这是你第三次在火车站被抢。我们没法一直补发护照给你。我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那位浪荡的流浪女嗤之以鼻:“他们在乎吗?”领事馆人员紧抿双唇表示不满:“这次又是谁?让我们看看那两个男孩……。”年轻女孩不同意,挥手打断她。“我要打电话给你父母,在这里等着。”她转身离去,留下我们面面相觑,对年轻女孩感到同情、难堪与好奇。女孩以挑战眼神望着我们。我前面的男人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开心笑了,一起走开,坐到窗边的椅上。我则再度掉入生命暂时停摆的状态。

终于那位一本正经的领事馆人员回来了。“过来。我已经和你的父母商量好,我们先预支一笔钱给你回英国,但是你不能继续留在意大利。明天就走。”

我们紧张了,觉得那位少女绝非含羞紫罗兰,肯乖乖接受安排。出我们意料,她甜蜜蜜笑道:“没关系,亲爱的。”

这个家伙,”她指指刚才和她说话的男人:“邀请我去住在他的游艇上。”说完,两人联袂在我们沉默的热烈喝彩中离去。

我的案件处理则属一般流程。她嫌恶地瞄了我的裤子一眼,撇嘴表示不满,便安排了我的遣返。我小心调整自己的陈述,以符合笔录所载。

阔别十八个月,我终于回到英国,身无长物,只有一件破裤子、七本记载西非洲笔记的破烂练习本、一架蒙了沙的相机,还有一份意大利文笔录。我瘦了40磅,黑得像炭,眼白发黄。我面对海关官员。“护月爲广

“我的护照掉了。”我将意大利文笔录交给他。他眯了眯双眼:“您是英国人,先生?”“噢……啊……,是的。”“您愿意签名保证所言为实,先生?”“当然。”

“好的。您可以走了。”他挥手叫我通关。不可能这么简单，我怀疑其中有诈，狡猾地望着他：“你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您可以走了，先生。”

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

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行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惟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一段时间。

世界少了 he 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人了。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锅。草坪下的刺槐依然长得很好。

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举凡和购物有关的事都变得非常困难。看到超级市场的货架沉重呻吟堆满食物，我不是作呕厌恶，就是无助发抖。我会连绕三圈仍无法决定买什么，或者疯狂大买奢侈商品，因害怕被人抢走而恐惧抽噎。

长期独处后，礼貌性谈话也变得非常艰难。对话间的沉默空档只要稍长，我就认为对方不高兴，街上行人则恐惧地看着我大声自言自语。适应互动规则殊属不易。有一天，送牛奶的人将我家并未订购的牛奶放门前，我循西非洲规矩大吼大叫追赶他，可能还扯住他的衣领。根据西非洲规则，我只是立场坚定，照英国标准，这可是难以忍受的粗人行为。突然看到自己变成这等模样，真是叫人谦卑的

经验。

一些小事则带来无限满足。我疯狂迷上奶油蛋糕，另一个从田野场回来的朋友则不可自抑大啖草莓。自来水、电力真是神奇。同时间我染上怪癖，百般不舍丢掉空瓶子或纸袋，它们在西非洲可是珍贵之物。一天里最棒的时刻莫过早上醒来，发现我已不在非洲，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穿过全身。我的笔记丢在书桌全没整理，连续好几个月，只要看到或碰到它们，我都感到恶心。

最奇怪的心理经验是目睹我数个月前从非洲寄出的瓦瓮抵达。当初，我细心用多瓦悠布匹包裹它们，装在铁制行李柜里，上面贴了四种语言的“易碎物品”警语标志。朱迪波震惊于我的鄙俗。我干嘛不把它们送给村民？大家都知道我很有钱，几乎和那些制陶的女人一样富有，大可购买尼日利亚产的富丽搪瓷器。我的老婆们看到我带回村落瓦瓮，可不会太高兴。

看到这个一度放在我茅屋里的行李柜此刻躺在伦敦的湿冷车库里，实在很怪。它完全变形。托运时，它是长方形的，现在几乎变成圆形。箱上的巨大皮靴印证实经手者将它变成这等神奇模样。我必须用装胎杠杆才能撬开盖子。接到自己寄的包裹本来就是奇怪经验，微带一种人格分裂的味道，尤其寄件的我对收件的我而言，已经逐渐变成陌生人。我的朋友一致赞美这些陶器的优美简朴造型。太可惜了，我干嘛拿它们去煮东西，我不能买些便宜进口盆盘，保留这些美得不该拿来用的东西吗？将我这些朋友介绍给朱迪波，让他们的不同观点大打一架，可能不错。返乡的田野工作者可以接受这两种不同立场，一个也不必认同。

此刻，你不可能不评估此行损益。我当然学知了西非洲某个无足轻重小民族的许多事情。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我可以继续待在多瓦悠五年，获致微小的研究成果，却仍无法穷尽“了解一个全然陌生民族”的研究目标。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有一般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资料不恰当或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我不可能有此能力。我的研究也让其他有兴趣的人类学者工作起来较轻松。我甚至认为我在解开多瓦悠宇宙观上的成果，验证了某些常用的解释模型与文化象征间的关连。整体而言，我的研究结论颇站得住脚，我很满意它们在整体人类学的地位。

至于我个人有了许多改变。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我的健康毁了

一阵子。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会阴险地让人成瘾。田野工作的宿醉头疼不比厌恶疗法更有效。返乡数周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当初鼓动我投入田野工作的朋友。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o但是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多瓦悠。

本书得以翻译问世，得感谢台湾大学江文瑜老师对“音调语言”与“哨叫语言”的释疑、作者奈杰尔·巴利的版权经纪人AdrewCribb热心居间转信，以及慈济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游谦老师为“头部巫术”一词解惑。更感谢好友慧贞与博学多闻的先生比尔不厌其烦帮我厘清复杂暧昧的原文。

最后谢谢黄道琳老师细心审阅译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翻译的《文化模式》为我打开人类学大门，看到美妙缤纷的世界。

Table of Contents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

[序 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

[第一章 原因何在](#)

[第二章 准备](#)

[第三章 上山](#)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第六章 你的天空清朗吗？](#)

[第七章 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

[第八章 跌到谷底](#)

[第九章 非洲总有新把戏](#)

[第十一章 雨季与旱季](#)

[第十二章 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

[第十三章 英国异乡人](#)